

通识教育通讯

GENERAL EDUCATION

北大·清华·复旦·中山

vol. 1

北京大学教务部

在文化日趋融合的全球化时代，传统对于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知识日新月异的信息化时代，真理对于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大学既是探索真理的地方，也是守护传统的地方。知识创新和观念更新往来源于大学，而创新的东西一旦过时就需要大学将其编织在知识传统中。大学既是激进的，也是保守的。人类只有吸收并继承前人创造的文化传统之后，才有可能做出一点点真正的创造。因此，大学必须在守正与创新之间保持平衡，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无疑是大学的两翼。专业教育强调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创新，通识教育更倾向于传承文明传统。但这并不意味着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就可以简单地对应于创新和守正，相反意味着要把创新和守正的精神同时贯穿到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之中。因此，通识教育绝不是脱离学科专业基础、降低专业水准、面对学科门外汉的通俗教育，这恰恰是目前国内大学推动通识教育需要努力避免的陷阱。相反，通识教育必须以专业为出发点，但又必须具有超越专业的视野，致力于探讨关于人的整全知识的可能性，致力于在理解外部世界的同时理解人本身，致力于提升专业技能同时提升人生境界。

创办《通识教育通讯》正是为了探讨通识教育的理念，交流通识教育的经验，培养通识教育的校园文化，推动通识教育的发展。由此，在一个急剧变迁时代，探讨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在一个文明竞争时代，思考中国文明复兴以及人类文明发展提供理想的愿景；在一个信息畅通的全球化时代，培养出对流行意见的鉴别能力和批判能力，从而摆脱束缚进行真正的知识创造；在一个日益功利化的时代，鼓励对精神的追求和服务社会大众的使命承担。

本刊编辑部

编辑部

执行主编 夏宇阳（北大）
文字编辑 王晨晨（北大）
方凯成（北大）
王丽萍（清华）
李会春（复旦）
吴海（中山）
美术编辑 刘清悳（北大）

编辑部信箱
tsjytongxun@126.com

目 录 Contents

通 识 经 典	1	第七届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开幕式致辞 高松 杨斌 黄达人 甘阳
	13	【专访】通识十年：从香山会议到四校联盟 甘阳
核 心 课 程	20	《莎士比亚与政治哲学》： 一次以经典细读和小班讨论为核心的通识课程试验 赵晓力 吴飞
	24	《中华文明通论》导言：中国之为中国 丁耘
博 雅 园 地	34	经典的阶梯——《西方思想经典》小班通识课感悟 强文玥
	36	巴黎的孤独——波德莱尔与“人群” 章丹晨
	40	复旦大学核心课程助教工作研究报告——《论法的精神》导读 姜涛
	43	青大学子的感想——关于第七届通识教育暑期讲习班 冯欢 杨啸尘 李航 周宇鹏
观 察 思 考	50	大学国际化就是英文课和洋面孔吗？ 秦春华
通 识 动 态	53	北京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简介
	56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走过一年历程 曹莉 王丽萍 杨媚 黄翟
	60	“科学与人文”通识教育名师讲坛——诗情画意的物理学 金晓峰

第七届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 开幕式致辞

高松副校长致辞

高松 北京大学副校长、教务长

尊敬的黄达人校长，杨斌副校长，丁光宏校长助理，尊敬的甘阳先生，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上午好！

由中国文化论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通识教育讲习班今天正式开幕。我没想到有这么多的同学参加。我想在这里首先代表北京大学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同时，也对精心组织这次讲习班的甘阳先生和所有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北大研讨通识教育，要从我们的老校长蔡元培校长谈起。蔡元培先生的教育理念大家都很熟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元培先生当时叫“普通教育”的宗旨，就是养成健全的人格。所谓健全的人格分有“四育”，即：体育、智育、德育、美育，蔡先生特别强调美育。实际上我理解蔡先生提倡并在他身上完美体现的就是融汇中西的“全人教育”，现在我们称之为“博雅教育”或者“通识教育”。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先生傅斯年先生曾经说过：“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了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二曰西欧自由博爱之思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观。”杜威先生也曾说过：与牛津、剑桥、哈佛、哥伦比亚等几所学校的校长相比，蔡的专业知识比不过他们，可在教育上他们比不过蔡。以一个校长身份，还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蔡先生在1919年的开学演说中指出，既然认定大学是研究学理的机构，对于纯粹学理的文、理科自当先做完全的建设。蔡先生在1934年《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谈到：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大学的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说有一个理想：

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从这些阐述我们可以看出蔡先生特别强调大学教育当中文理的基础地位和交融贯通。第二点，可以看出蔡先生开放包容，汲取世界最先进学说，同时又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并以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来研究。我想继承蔡先生的办学理念，我们也可以从中西文明的交汇碰撞、从人文与科学精神的交融等角度来审视和发展出我们今天的北大的通识教育之路。

我还想再说一下我们另外一位校长，在45年到48年，胡适先生做北大的校长。胡适先生对于教育的本质和教育的目的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我想还是挺有启发意义的。他说：“教育给人戴一副有光的眼镜，能明白观察，不是给人穿一件锦绣的衣服，在人前夸耀。教育是要人戴能看见从前看不见，并能看到人家看不见的眼镜。”他说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在看一件事时是用批判的和客观的态度，而且也要用适当知识学问为第一品。他这个是说给毕业生的：“四年的研究与实验工作已经教会你们独立思考、客观判断，有系统的推理和根据证据来相信某一件事的习惯。”我想他也阐述了我们大学教育的目的。

我们再看看美国这些年推行通识教育，美国高等教育协会他对通识教育给出的界定是这样的：一种能够增强并培养个体应对复杂性、多样性和变革的能力。它既强调关于更广阔范围的渊博知识，例如包括科学、文化、社会在内的知识，又强调在某一特殊领域内取得专业的成就。这一教育理念不仅帮助学生形成社会责任感，同样帮助他们获得宽广知识和相关知识领域所需的智能和技能。例如交际沟通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以及知识、智能及技能的运用能力。而且我想它是针对所有学生的教育。

北京大学一直致力于推动通识教育，早在 80 年代北大就确立了加强基础、淡化专业的教学目标，并率先推出了公共通选课。在 90 年代北大又率先推出了元培学院，探索通识教育的管理体制。从 2010 年开始我们又开始建设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采取大班授课、小班讨论的授课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想教育是一个长期的事业，需要的不是口号，也不是轰轰烈烈的改革，我们是需要扎扎实实的做出具体的改进和提高。从具体课程开始，逐步加以改善和完善，我们的思路是宁可要少一些，但是也要做的好一些。

我们现在的教育应该是面向未来的，而未来我们面临的是更复杂多变的世界。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借鉴国内外本科教育改革的一些思想、举措，传承北京大学的教育改革理念与实践，我们在 2013 年也概括了新时期北京大学本科教育的教学方针，就是“加强基础、促进交叉、尊重选择、卓越教学”。我想核心内容就是将教和学的重心真正转移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一切的政策措施是为了学生的成长与进步，通过教育使学生获得身心和智力上的自由，获得独立自主的思想和行动能力，成为对社会国家、对世界有理性认识和负责任的公民，从而能够应对复杂多变世界的挑战。

新十六字的方针其核心理念就是博雅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合作与融合。这里讲的加强基础一方面我们是强调加强文理通识教育的基础，“文理”的范围可能比蔡先生当时讲的有更广一些，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基础，同时也要加强专业教育的基础，并努力在专业教育当中来贯彻博雅教育的理念和思想。我想很多专业的课程实际上也是可以来发挥和贯穿博雅教育的一些理念。

包括从整体的和相互联系的角度，从不同的专业学科的角度、视角来认识和理解自然、社会和人本身。最近在看一本书——《三种文化：21 世纪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与人文科学》。我们需要从最基本的最根本的东西中来探求某种永恒。通识教育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在变化多端的社会生活中提供可以不变的东西，就是在物欲横流的现实生活中提供精神超拔的东西，就是在对人类思想经典的阅读、反思和践行中潜移默化的奠定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在多元化的时代奠定我们共同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信念。

我相信一个人不论他在事业上取得多大的成功，当他回忆大学的生活时留下印象深刻的肯定是那些激动人心的思想火花以及影响一生的精神动力，而对于经典的阅读和分享永远是校园生活中最动人的一部分。因此，我很赞赏中国文化论坛和甘阳先生今天来推动的以经典阅读为导向的通识教育，我想这也是北大通识教育的一个发展方向。我们希望建立一系列旨在推动经典阅读的核心课程，通过这些核心课程来重新塑造我们的文化传统。

当然，我想实现通识教育目标的途径应该也不止这一条，大家可以研讨。我们高兴的是北大有一大批致力于通识教育的老师来共同推动北大乃至全国的通识教育。我们的学生也非常积极地投入。我注意到在中国文化论坛历次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讲习班的教师名录当中有许多教师是来自北大。

过去这些年北京大学和中国文化论坛合作，成功举办了第四届、第五届全国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暑期讲习班，这一次与以往不同的是北京大学联合了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共同讨论成立通识教育的四校联盟。和中国文化论坛合作，共同举办第七届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暑期班，我们希望通过四校联盟的合作机制来推动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的繁荣和发展。最后我特别希望各位同学，尤其是外校来的同学能够度过短暂而难忘的时光，领略燕园的美丽和经典的魅力。我相信有了大家的努力，本届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一定能够取得圆满的成功。谢谢大家！■

杨斌副校长致辞

杨斌 清华大学副校长、教务长

高校长，还有各位北大各位老师，我们的论坛的发起人，我们讲习班的组织者甘阳老师和很多参与讲习班的同事们，以及讲习班的各位同学：

大家上午好！

刚才高校长已经代表讲习班的组织者讲了很好的一个致辞，描述了我们做通识教育的目的，特别也介绍了一下北京大学这方面长期以来的思考和实践。我想今天我也和

大家分享三个方面的情况。一个是清华大学在通识教育方面的一些情况。有过去的故事，也有现在的想法和初步的做法。第二个，我自己也做了一点通识教育方面的课程，我自己也在经管学院开了一门课，稍微跟大家汇报一下。第三，刚才高校长最后讲到，他说中国的通识教育之路可能会有多种形式，我也想谈谈我的一点看法。

第一，说说通识。一说清华，一般都会说到 52 年到 84 年，

这个阶段中清华基本上可以认为它是一个理工科甚至一个工科学院，这是它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这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跟当时的院校调整有关系，但是实际上对这一段历史回顾当中，大家从中间所接受的教训其实不同。有一些教训甚至会觉得，其实你看看1959级，1965届，中间出来什么样的领导人。其实这也是一种观察的角度，就是说在这样一个阶段当中单科性的非常专业性的教育，后来成果怎么样，今天有很多老师和同学在那，大家也可以做一些各自的评价。

两头说，在52年之前是什么样的情况？52年之前清华是一个相当看重通识的学校，这当然和它的一些渊源有关系，当时是外交部之下，不是教育开的学校。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是1923年的时候，清华的一批老师——其中有相当几个后来都是来到了北大，当时请了美国有传教士色彩的人写了清华的校歌，校歌有很强的竞争意识在里头，体育比赛的时候还是很鼓劲的。他们就鼓励说中国的老师应该自己来写校歌，于是就搞了一个校歌竞选，23年的时候有一首就入选了，这一首就是明天、后天清华本科毕业生毕业典礼要唱的。

这个词是90年前的词，但是90年前的词现在越听越觉得这个词非常的一针见血。比如说中间第一段里头就提到刚才高校长讲的，叫东西文化荟萃一堂，那个时候有非常重要的对于东西融合的看法。其中第三自然段当中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教育理念，两句话，叫“器识其先，文艺其从”。这个器不是我们今天经常批评的说培养学生不是制器，不是要培养一个工具的人，这个器指的是气度、是底蕴。“器识其先，文艺其从”，这儿的文艺可以宽泛的认为是技能性的东西。所以，当时的校歌反映出来的那些教育理念，指引着一九二、三十年代，也包括到47年的时候，当朱镕基进入到清华的时候，比较多的回忆中描述的都是他酷爱英文教材，那时候英文教材中有不少就是今天的经典的阅读，对他的影响很大。当时他去偷学了一门课，应该翻译成“经济学原理”，这一门课对朱镕基一生他在经济学方面的底子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有的时候就是一门课，未见得是一种很系统的学习。那个时候他还是电机系的学生。84年开始，清华当时的学校负责人希望能够恢复成一个综合性的大学，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经济管理学院是1984年成立的，是第一个成立的非工科类的学院，85年才是理学院，所以理学院比经济管理学院还要再晚一些。

这之后其实有好长一段时间，我自己说虽然我们说要建设一个综合性的大学，但是那个时候清华还是一个多科系的理工科为主的学校，这么说可能更准确一些。如果看今天毕业生的比例的话，工科还是要占到将近2/3左右的样子。但是最近一些年当中，关于到底清华的本科教育应该怎么做，就像刚才高校长讲到的2013年北大所确立的这

样一个方针，清华有非常实实在在的一些争论，这个争论到现在也没有结束。

在2001年左右的时候，那时候清华关掉夜大学，关掉了通过继续教育方式取得清华本科学位。所以那个阶段当中还是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到了09年的时候，上一次的教育工作讨论会的时候，提出了通识教育的基础上的专业教育，或者那个时候开始提“后基础”。但是其实看一看通识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教育的话，后来大家反复讨论的时候，透着一种非常重要的想法是：通识教育是给后面真正能派上用场的专业教育打一个基础。所以这一次在去年10月16号清华大学通过了教育工作讨论会最后的若干意见，第一次才提出了刚才高校长提到的通识与专业融合。中间也有一股激进的力量，特别代表人物是物理系以前的系主任，他强烈地建议整个的清华本科要提通识教育。这是个争论，有相当一批力量认为说你看看中国今天的现实、对于人才的需求，以及清华的底子，也许通专融合才更适合现在的这样一种实际情况。

教育处在推动前两年以更大的力度去推动通识，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元培学院这样的尝试，而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去年的改革纲领希望能够有的，但是到目前还没有能够推出一个在头两年当中没有专业设置的这样一个尝试，而我本人认为这样的尝试尽管是多种形式中的一种，但我觉得它非常的有必要，对清华大学来说。

这是通识在清华的一个大概的故事。清华做通识教育来说现在最缺的三样东西，我也因此特别感谢甘阳先生和我们这样一个持续举办的讲习班。第一还是缺老师，在这方面清华做通识教育实事求是的说底子很薄。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在进教师的时候在这方面有很多的投入，但是我们科系的设计相对偏文科，比如说哲学系是比较小的，在通识教育师资方面的支撑就会有一定的困难。这是第一。

第二，在整个的教育模式上需要一个比较大的改革。我们也想推书院制，但是怎么样能让清华一直以来非常看重的班级，包括一进来之后就比较强化的专业思想、专业教育能够和新的书院制有很好的融合，我觉得这事还真的是不破不立，目前破的挑战还是比较大的。这就牵扯到底到底认同于哪一个集体，能不能真正在非课程的生活中间接受通识教育，这是通识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包含所在。

第三，挺重要的一条，就是对通识要回答的一个根本问题缺少共识：就是你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或者你要培养什么样的清华人。每一回都觉得要通识，但是你看看45年哈佛红皮书和去年斯坦福大学本科教育的改革方案，中间都明确回答他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某种意义上拿我的专业来说，你得对通识中间的核心、包括经典哪些是经典细节化。

每当你需要把这些东西细节化的时候，事实上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那些其他的影响因素都还是在那。

所以，我觉得这三个困难实实在在的摆在那里，需要我们真正做事的人做起来，需要一个一个去解决这些困难。所以我也很感谢甘阳老师愿意一起和我们解决这些困难，也很感谢一直举办讲习班，为我们提升这一部分的认识，并且储备更好的师资打下基础。以上是第一。

第二，我自己开的课是03年开始开的，我在的学院虽然叫经济与管理学院，但是本科生最开始的时候是比较偏商科，现在逐渐的偏经济学。我的课原来是60人分两个课堂教，所以是30人的小班教学，那是我最喜欢的，一直教到了09年。之后由于这个课评的还不错，于是就被学院要求开成300人的大课。但是我们在开这个课的时候努力的把它做成300人的课堂，我们找了15—20个助教，其实就是高年级的学生或者研究生。他们在星期五下午一个人会带着15个人左右的讨论班做讨论。这和咱们讲习班的安排是非常接近的，但对我来说最大最大的一个挑战是新雅书院在通识之外得到最大赞许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不是赞许他的主义，而是赞许他解决了问题。大家都赞许说：你看开的这个课，你看老师教学的态度，你看学生的学业负担，挑战度，这些都明显的提升了。实话说不管是通识教育还是其他的任何教育你都得解决的问题。所以我说主义先放到一边，它解决了问题。而我在那个课程的实践中间，我感觉如果在这方面没有资源的保证的话，通识课三下五

除二的就容易沦为科普性的导论课，甚至是一个讲座课。这是非常容易的。

这里面花比较多的时间是老师和助教之间集体备课的时间，后来这也成为助教愿意加入这个课程的原因，因为那个阶段当中有好多不足为众人道的东西在一起探讨，这样以便他们在星期五的下午能够担任起助教的角色。大家都是一样，我也读到网上读到很多老师对讲习班执教的帖子，李猛老师是其中大家都很喜欢。不管是哪个老师，最好的老师我们都觉得机制有时候非常非常重要，他确实可以在很大的范围里有很好的传授，甚至对人有很大影响，但是通识教育机制中间，就是小班教育带有批判性思考的争论，这是不管多么好的名师都必须尊重的一个机制。这是我想讲的第二个。

第三个，多条道路的问题。我今天想提一个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我最近跟我们学校的老师探讨，有没有可能通识教育中间有一个小的程序，完全是教理科的东西，完全是理工科的东西。这其实是一个想法，看一看教什么和怎么教以及教中间那个调调，也许好多时候，通过赋予一个极值的情况，其实你才能体会到。通识教育有一些老师受制于必须覆盖的许多内容，可有有这么大的必要？还是我就教这6页纸，也许这6页纸也能很好的体会通识教育的目标。

我今天就想分享这么三件事，预祝讲习班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黄达人教授致辞

黄达人 原中山大学校长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今天我听了高校长和杨校长的讲话，我说我的发言用不着了。因为太精彩，而且我建议北大出的新杂志把两位的讲话放进去。通识教育为什么做，怎么做，两个人共同提出了一些问题，我觉得非常重要。

我今天讲大学通识教育的理念和想法，纯粹是一个偶然。为什么这么说？我从2011年底从中大校长的岗位上下来，到今年四年半的时间，走访了近40所直接属高校，20多所海外高校，7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和50多所高职学校。我手上有200多份录音，每次录音都超过2个多小时，都是跟校长、书记的谈话。谈了以后有很多的感想。我自己始终把跟大家的交流看作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特别喜欢用欣赏的眼光。现在和原来不一样，原来是看到别人怎么做回去就自己怎么做，现在只要欣赏、赞美就完了，不要说

回去怎么干，那是别人的事情。

我的副产品就是商务印书馆连续出了五本访谈录，一不经意就成了高产作家。《大学的声音》是“985”高校的校长和书记，《高职的前程》那是为全国人大提建议。《大学的治理》是海外高校的。《大学的转型》是去年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还有《大学的根本》，是讲本科教学，主要是讲“985”大学。

《大学的根本》是我半年多的时间重点访问的国内大概十几个一流大学的学院的院长，不是校长。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经历，是在国内国外都接受过教育，然后在国内跟国外都担任过老师。另外，还有几个校长，比方说上海交大的张杰、南京大学的陈骏，当时复旦的校长，当时浙江大学的校长，还有西北工大的校长。因为我自己当校长期间，对他们几位都非常钦佩，认为他们对教育问题、教学问题

有特别深的理解，也请他们谈谈对人才培养的理念。

今年年初我跟甘阳老师专门谈了一次，我们两个有共同的理念，他对于通识教育的理解使我很受益。其实当年我们从香港把甘阳老师从港大挖到我们学校来，而且工资是不到港大的1/3，由他担任负责人。我们当时下了决心，那是我说的话，我说甘阳老师来我们通识教育就开始，甘阳老师不到我们就不做，结果他来了，来了到现在一直在做。为什么我跟他每次谈都能够有很多受益，其实有一个出发点、一个基本点，就是他来是我请的，就是我认同他的，我才把他请来。如果我们两个意见不一致的话，我相信也不会走到今天。今天讲通识教育在座的各位老师我是不可能比他们讲的好，讲讲我自己的思考。

一、通识教育的定位

从我访问的情况来看，国内一流大学普遍强度宽口径、厚基础。清华大学原来的培养定位就是在通识教育基础上宽口径的专业人才培养。复旦大学提出的是坚持通识教育的培养理念，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尊重学生的自我管理，培养具有人文情怀、科学精神、国际视野、专业素养的人才。他们也是非常重视通识教育，而且连专业课程都开始用通识的理念去设计。

再看南大，南大的校长亲自动手。南大实行改革，一开始就把身材培养的目标重新做了调整。以前讲以各专业的专门人才作为培养的目标，现在把这个目标调整为各行各业的领军人才而不是专业人才，这个是很大的改变。是希望通过大类的培养，使学生的眼光更宽，所以南京大学的通识教育其实也是为这样一个目标而实现的。

为什么定位这么重要？定位以后才有课程体系的设计。我认为这些学校的人才培养定位由其大学的定位所决定。陈骏校长就认为，通识教育可能不一定适合所有大学，而且更加可能适合于某些一流大学。这是陈校长的说法。因为大多数高校主要是培养学生毕业以后的生存发展，就是学校的定位不一样，人才培养的目标不一样。所以，大部分学校是培养毕业以后干什么事，而一流高校承担的是为国家培养各行各业的研究型人才。所以不能以一个专业教育的思想来衡量对这些学校毕业学生的要求，我现在理解的通识教育讲的就是国内这些综合性大学的一些做法。

一流大学对人才的培养定位，都是要把眼光看得远一点。比如说我访问过北大工学院当时的院长陈十一，我专门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北大的工学院怎么定位你的人才？”我也问过张杰校长，我说：“21世纪的上海交大，你怎么定位你的工科人才？”陈十一跟我的说法是不仅我们要培养工程师，要更加关注工程科学家的培养，他的定位不是工程师，而是工程科学家。张杰校长的回答是：“把工科教育变成工

水平和定位是两回事。办学层次低不是低水平，关键你把定位做好，然后把定位实现了，你就是高水平。所以不同学校都可以做出各自的一流，而不要我们有统一的模式。

科科学的教育。”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学校对于人才的培养是要有定位的，有了定位才有措施。他们两个其实差不多，都提出了这一类大学人才培养上的定位，要不仅仅满足于工程师教育。

大连理工大学很明确的提出“精英教育”，现在社会教育都说已经到了大众化教育的时代，我们现在好像不敢提精英人才”，其实我们这一类学校就要提精英教育，要用学校所有优质学科、科研、教育教学资源来为培养这样的精英人才服务。我认为要把两件事情分开来讲，一个是中国高等教育整体上从精英教育发展到大众化教育，这是全面的评价。但是每一个大学自身的定位不能混为一谈，好像是大众教育前提下每个学校都是大众化教育，这个观点绝对不行。所以我认为这是整体和个体的辩证关系。在这个整体里不同的学校应该有不同的定位。

对于所有这些学校也不能用同样的指标去衡量这个学校是办得好还是办得差。比方说大家都要考虑就业问题，还有对口就业等等。清华大学的钱颖一院长，我专门去访问过他，他说不要用就业来衡量教育的成败。其实我想他的意思是不要让就业来衡量我们这类大学的办学成败。他认为全国两千多家大学，至少有1%的学校做的研究不是为了今天有用，这当中至少有清华。他说我们绝大多数人是需要工作、需要生活、需要家庭，但是像北大这样的学校要培养一些人敢于去冒险，敢于去做大事情。所以他也说，统计就业率，一般而言可以，但是应该有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不要考虑100%的就业，这对我们这样的学校是不好的。如果都讲就业率，反而会掩盖一些人才培养上的问题，不容易培养创新创业的人才。

我也去过上海财经大学，田国强院长他说：“这批不以就业率为主要目标的大学里面，要对学生进行通识教育。这两件事连在一起。开展这个意义上的通识教育，也就不要太强调就业率。”我是因为从“985”高校、“211”高校、地方高校、高职院校以及中专都去了，有几百所学校，你就会发现有规律。从“985”高校到“211”再到地方高校、再到高

职业院校，它的专业面向是越来越窄，这是个规律，看了以后你就会发现是这么回事。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就业的岗位越来越细。“985”大学为什么要强调通识教育基础上的专业人才培养，他强调的就是宽口径、厚基础，要按大类培养等等。但地方本科院校，特别是应用型本科，他是强调要面向通用专业。我还担任了教育部专业设计委员会的主任，我记得北大当年申报一个专业，文史哲合在一起是一个专业，但是你到地方院校去看不可能那么宽的口径。比方说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也是非常有悠久历史的，他也有金融专业，复旦也有金融专业，上海财大也有金融专业，究竟不同在哪里？可能复旦的金融要上一系列的基础课，上海立信他把一个金融专业分成四个，面向四个子行业，银行、证券期货、保险和信托，一个专业变成四个专业来培养。就是说对于通用专业他要考虑面向行业。

我看到的这些地方高校很多学校把着眼点放在专业教育上，以专业课作为课程改革的切入点，跟我们以通识作为切入点完全不一样。所以不同学校的定位它就应该有不同的改革方案，有不同的教育改革切入点。

再往下走到高职院校，高职院校不是面向行业的问题，而是面向行业里面的核心岗位。比方说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是大专学校，我就问他你的酒店管理跟本科有什么不一样，跟中专有什么不一样。他说比如说我只培养酒店的前台，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岗位，我就需要交际能力、外语能力等等。所以，我们的课程是按照这个岗位来设置的。再到中职学院，中职学院培养什么岗位，就是培养客房服务员。

我最近到山东潍坊的一所中职学校，这次到河南又去看了中职。他说我们这种学校不仅要强调就业率，还得强调对口就业率。因为我就学的这门技能，结果这门技能到

学校本位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部分学生身上，在乎量化指标。但是教育本位，我们真正以学生为出发点，关心每一个学生。

那里去不能用。所以这样的学校的定位是决定了我们对于通识教育的态度就应该是这样的。

当时中大的传播与新闻学院的院长胡舒立，他也说其实不同学校的人才培养定位是不一样的，他是站在传播的角度。他说一种是紧跟市场的，因为新闻专业作为职业教育，本身就强调上手要快，否则我们的新闻谁来做。但是我们也有一批大学要强调培养学生人才的养成，而不是人才的开发。同样的问题都在各个专业里面都存在，所以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人才培养定位，所以在做的时候都有不同的做法。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无论是哪个人才培养的定位都应该互相理解，不要说我们做的通识教育，你们做的就是不对，应该这么做，你们太强调技术技能培养，其实社会对各种人才都是需要的。所以一个重要的观点是不要因为别人的定位跟你不同而去批评别人，每个人站在自己学校的定位上有自己的做法，应该互相理解，互相尊重。

很多一流大学提开展通识教育，这是根据精英化人才培养的定位，但是不要以这个作为标准模式去指责另外一批学校——他们是培养面向职场、面向一线去培养人才的，我们同样应该尊重这些学校，同样尊重由这些学校培养的学生，不同的学校定位不一样。

我特别认同清华大学谢维和副校长所说的，高等学校办学层次的不同体现在服务对象的差异，而办学水平的差异则反映服务质量的高低。水平和定位是两回事。办学层次低不是低水平，关键你把定位做好，然后把定位实现了，你就是高水平。所以不同学校都可以做出各自的一流，而不要我们有统一的模式。

第二，通识教育应该面对每一个学生。去年中大搞了90周年的校庆，校庆的主题是“平等地对待每一位校友”。我认为这句话非常好，因为平等对待每一位校友的延伸是在大学里面要平等对待每一位学生。所以我们更加关注究竟是25%的学生还是部分学生，还是全体学生。南京大学陈道蓄教授说，有的老师认为一流学校只要把100个学生中的前25个培养好就足以把我们学校的名声撑起来，这其实是一个办学的理念问题，他说我们其实应该关注每一个人，因为他们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100%。杨玉良校长说，大学应该关注每一个学生，比如说复旦大学对于拔尖人才班的学生，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做法是始终不脱离原来的班级，不是单个组班，只是增加部分课程。华中科大也说，我们在探索一些特殊班教育的时候，不是为了这些特殊的学生，而是为了我们全校所有的学生能够享受这些资源，做一些探索；因为我们现在资源不够，但是我们认准一个方向，需要通过一些试点才能实现。

我们学校也是一样，中大为什么成立博雅学院，一届才30人。我们当年定的就是“三位一体”：人文高等研究院、

学可以把通识教育理解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侧重在“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那就是原来的素质教育；第二个阶段侧重在“通”，讲究融通，这个专业思考问题的方法你要学到手，看待问题的不同的视角你要有。

通识教育部、博雅学院，三个一把手由甘阳牵头。为什么甘阳老师做，其实在博雅教育、博雅学院对这些学生进行教育的同时，把我们的通识课能够对全校开放。博雅教育这30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探索通识教育的模式，目的要明确，不要认为我培养这30个人下去做榜样，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办学的指导思想一定要清楚。

为什么要谈这个事情，因为这是关于教育本质的问题，大学本质的问题。究竟我们是学校本位还是教育本位，学校本位出发他就会考虑我们只要有多少学生办好了我们这个学校的名次就够了，这是学校本位。所以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部分学生身上，在乎量化指标。但是教育本位，我们真正以学生为出发点，关心每一个学生。

四川大学的校长讲的一句话很有趣，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关注每一位同学，其他我们不说，他说我的看法：最优秀的同学以后就是院士，差一点就是我们的同事，最差的可能以后是我们的董事。中大真是这样，我们最终创业成功的那些都是书没念好的，但是现在对学校怀有无比的感激。所以我说我们对每一个学生我们尽力了没有，按照他的选择给他提供了条件没有。

二、通识教育的课程建设

现在一讲通识教育就容易联想到素质教育，有一个观点认为通识教育跟素质教育是不一样的，陈骏校长也说，他说：过去强调的素质教育跟现在强调的通识教育理念上是有所不同的。素质教育主要还是专业教育，作为专业教育的一个补充，它的核心是培养专业人才，是为了使专业人才的眼界更宽一点，技术更牢一点。通识教育并非是围绕专业人才，而是要培养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刚才两位校长讲的情况我是非常认同的，清华经管学院的院长钱颖一，他说在经管学院开设通识课，不仅仅是专业教育的补充，定位跟以前完全不同了，而是“三位一体”，包括价值塑造、能力培养、人类核心知识的获取。

我专门向甘阳老师请教，我觉得他的说法我比较接受。即我们国家最早由华中科技大学提出的素质教育与现在实行的通识教育在根本目标上还是一致的。根本目标都是为

了扩大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从这点上来看目标是一致的。当时推动的素质教育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确立了“985”这批学校里有十个学分是必须开设文化素质教育。要是没有当时的素质教育，今天这十个学分就没有地方来，使得现在开展通识教育才有可能有这十个学分可以拿来用。对杨叔子院士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推动当时的素质教育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他们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通识教育实际上是传统的综合性大学对于课程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识教育我们现在更加侧重于核心课程，特别侧重于课程质量，这是跟以前不一样的，对于课程质量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所以甘阳老师认为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名实之争其实没有必要，关键的是提高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教学质量提升，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要去争论那些事情。而且我们学校提的就是这样，通识课的教学要求，跟专业教育里面专业课核心课程的要求一样。至于叫通识课还是叫素质课，我说我们别去管别人，因为每个学校有自己的定位。

我到地方本科高校，到高职院校都去走过，走访以后很多校长都跟我们说，我们学校都在搞通识教育。我当时有一个印象，你这个通识教育肯定不是我们的那个通识教育，你讲的肯定是素质教育。我想我应该去批评他，去纠正他，我应该跟他去争论？完全没有必要，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们不应该争论是什么不是什么，我们各自关心自己做的。所以我说我们对通识教育的定义是不同的，其实有不同的学校对它有不同的定义，其实是不同的理解造成做法也不同。所以我说我理解的通识教育跟目前的综合性大学的做法是一致的，我更加关注核心课程，但是我认为没有必要认为你们做的就不是通识教育。

现在好多地方院校，甚至民办学校，他们其实也是提了很多通识教育，他们是对专业化教育的补充，有人文教育的特点。比如说我去过西安的西京学院，每个学生都要求选修一门艺术课程。另外，重庆邮电大学的移通学院，那个学校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就是按照学院制建设，每个学生都要学戏曲、电影、音乐，每人都要会一件乐器，

有室内游泳池，IMAX 电影院，统统有，为什么？他就认为学生应该接受综合教育，其实对于学生的教育，素质方面的培养是各个学校都在做的事情。所以，我说我们没有必要去批评别人。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这是个职业学校，他们就提我们学校要把志愿者的奉献精神作为我们学校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说这其实也是素质教育。其实这方面每个学校都在进行着努力，所以我说我们开展通识教育应该看到它的本质，我们讲的通识教育是什么，而不要纠结于名词。就像去年开展的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我说，其实我们要看到转型的实质是什么，实质就是要走应用型的道路，为国家的需求、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地方服务，强调应用型，而不要强调这究竟是不是职业教育，你何必让人家接受这是职业教育、那不是职业教育，弄的那些校长、书记非常的郁闷。我们要做的其实要抓问题的本质，而不要纠结于名词。所以不管是通识教育还是素质教育其实都应该重视大学文化对于学生的熏陶。

我到海外去访问，被访问者都是校长，都是 30 年前的学生，我就问他，我说 30 年前你做学生跟今天你做校长，我们的高等教育有什么变化，你认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他们就告诉我：互联网。因为获取知识的渠道变了。既然互联网作为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或者主要渠道，那么要我们大学干什么？他的回答很简单：我们认为对学生的培养 90% 在课堂以外，但是在校园以内。这就是大学存在的意义，我们大学文化对学生的熏陶。当然我是不赞成 90% 那么多，但是他的意思我明白，就是说大学文化对学生的熏陶这才是最重要的。

再讲一下通识教育与学分制的关系。

很多学校都在提完全学分制，而且到现在的改革方案里还是频繁出现我们实施的是彻底学分制、完全学分制，但是学分制的本质是什么完全没有搞清楚。学分制最关键的是学生的自主学习，自主选专业，哪个学校敢说我是让

学生自主选专业的？几乎没有。自主选课程、自主选老师、自主选进度，所以完全学分制的核心：供大于求。你有充分的优质的资源让别人选才是我们的要做的，不是计分的方法，不是拿到学分的手段，要在专业、课程跟老师跟学习阶段的数量上都是充裕的，而且你是高水平你才有可能实现学分制。所以，学分制的本质没有搞清楚，就讲我怎么计学分，那就是把本质丢掉了，在做游戏。

我们与世界一流大学主要的差距在哪里？我不认为是科研，当然部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大学能不能像国外一流大学那样提供充分多的高质量的课程，我认为这是我们大学不如别人的最核心的地方。所谓的内涵建设，最重要的是把课堂的质量提高，说到底把每一门课的质量提高。所以，要深化国内的通识教育首先不是增加通识课的数量，我们首先把质量搞上去，先把每一门通识课组织好、上好。甘阳老师在北大组织了《中西古典学》这门课，核心是精读，通过助教带着学生讨论，养成专业的思维习惯。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把通识教育理解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侧重在“识”，把识放在首位，通过传授专业课程以外的知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我认为那就是原来我们提的素质教育；第二个阶段侧重在“通”，通讲究融通，希望学生掌握你新学的这门课，其实是这个专业思考问题的方法你要学到手，看待问题的不同的视角你要有。我认为这对于我们人才的培养才是有用的，这是我理解的，把素质教育和我们现在推行的通识教育两个联系起来，是两个阶段。

清华大学的施一公教授就说，他说应该更加重视方法论的学习，他说三年不读《Science》、不读《Nature》，会缺这三年的知识，但是他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基本可以不受影响，因为我们接受的科研训练已经有了。所以，研究方法论的培养比知识的更新更加重要。

北大的饶毅和施一公分别在北大和清华开了一门关于方法论和逻辑思维的课，一个叫《生物学思想与概念》，一个叫《生命科学的逻辑与思维》。两个人都是想到方法论的学习才是重点。■

甘阳教授致辞

甘阳 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 博雅学院院长 通识教育总监

首先交代一下，前面停了两年暑期班，每年都有很多人问到底暑期班还办不办。今年首先感谢北大，做了大量的工作，适暑期班成为可能，今年是第七届。还要感谢三联书店，不仅为这次暑期班重印了论文集，而且免费赠送给所有的学员，非常慷慨。

我们可以从这本书看十年来大概发生了什么变化。这

本书最后的部分是请了当时清华、北大、人大的一些本科生参与了十年前的会。很大的成就是，十年过去，这些学生大部分都已经博士毕业，在高校任教，成为了通识教育的主力军。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年暑期班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开放给本科生的。其实最早办暑期班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比较明确，希望开成教师的培训班。但当时学

生的踊跃程度很高，本来只想开放很少一部分——比如10%——的名额给本科生，但以后本科生逐渐成为历年暑期班最主要的学员。

因为通识教育是一件非常长的事情，10年、20年左右才能真正见成效。以前我在不同的场合常常说，美国现代大学的通识教育一般归源于哥伦比亚大学，1920年左右。当时的通识教育并不是校方行为，仅仅是一两个教师自己开了这个课，然后大家都觉得好，大概到二十多年的情况下才成立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学校建制。芝加哥大学学校也是一样，整个通识教育辩论引起学校的分立，十年之久，校长和教授会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也是到二十年左右才成形。所以我们仍然期望，像今年我们又是把大部分的名额开放给本科生，我们希望这些本科生的学员十年以后你们都将成为主力军教师，都会很自觉的投入到通识教育中。这是第一点，对学员的期望。

第二点，十年以来发生的比较大的变化是什么？十年前我们这个会的名字叫“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并没有叫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其实我们当时在筹备会的时候一直都是用的通识教育，但是在正式召开之前，很多领导和我们打招呼，通识教育这个词在十年前，在05年的时候，仍然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词，甚至有政治不正确的嫌疑。所以，当时名誉主席建议我们避免争论，所以我们改用“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你如果去看里面谈到了通识教育，但是当时会议的题目是人文教育。十年以后不一样了，就像今天上午所有校长的致辞都是用的通识教育。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同时这一次是由四所学校联合主办，并且准备在这个期间四所学校可能会在通识教育上形成某种合作的机制。为什么这四所学校在这次会有一个比较高的共识，大家准备达成某种合作机制？因为我们认为这四所学校对通识教育的最基本做法都已经比较清楚，没有必要再纠缠一些很基本的什么是通识教育的问题。这些学校都已经经过比较长的实验，也都有相当的基础，所以可以在比较深入的情况下来做通识教育。这一点和其他一些学校可能会有一些差距。比如说四个学校的努力点全部都在于提高课程的具体质量。打个比方，清华大学新雅学院虽然成立仅仅一年，但这一年来课程的质量已经完全奠定下来。比如说所有的课程都是30人的小班，第二，所有的课程都有非常强的阅读、写作的要求，不会是一个泛泛的上课的要求，一定会有大量的阅读、大量的写作，包括大量的讨论。基本上这些通识课的要求和你要付出的时间都跟清华的最强的理工科的专业课完全一样，有时候甚至非常吃力。这些都表明在一些主要的大学通识教育已经基本上走出了早期还在讨论一些外延性问题的状态，已经到了非常具体的阶段：

经典阅读并不教给你任何直接的知识，我们希望通过经典阅读培养一种能够超越急功近利的心态，能够逐渐克服浮躁的心态。

到底这个课怎么上？每周阅读量多大？而不是泛泛的状态。全国来说肯定是不平衡的，很多学校由于师资的问题、各个方面的问题，不大能达到这样一个状态。

我也非常同意黄校长今天上午讲的，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定位，并不需要把它强制起来。但基本的共识是最好的“985”大学应该在通识教育作出比较大的努力，而且需要课程达到基本的要求，不需要增加课程的数量或者开什么课。其实开什么课一点都不重要，关键是谁来讲、怎么讲。所以如果没有适当的教师，光是做规划，光是想要开什么课没有多大用处。我们经常会发现七年来讲习班的学员，每年参加培训的学员回去的以后就成为这个学校通识教育的主力军。有的时候一个大学只要有一个老师在做通识教育，他就会凝聚一批学生投入进去。这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包括北大也是，十年前，虽然有通识课或者读书班等等，都不过是个别教师自己开的一个课，但逐渐逐渐得到大家的认同。

为什么通识教育到目前为止受到相当大的认同，包括出版社——通识教育的书同时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和三联书店同时出版，有国内版和香港版。到底是为什么，如果我们回去看《中国大学人文教育》这本书，这本书比较有意思的是不仅仅是正式的文章，包括所有的讨论的过程都有收录。当时参加会议的两百个教授，有一个普遍的忧虑，就是中国大学的功利化和浮躁化。通识教育很大的背景是大学扩招以后、整个社会市场化以后，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功利，越来越急功近利，大学跟社会不再有区别，大学不再是一个安静的读书的地方，而是极端的浮躁。这是几乎所有的教授，包括理工科的教授都普遍忧心所在。

严格来说通识教育应该包括很多很多的方面，比如说科学方面，或者比较新的时代方面的新的东西。但是这十年来，以暑期班为代表很多的教师重点都是在经典阅读上。其实一个目的，经典阅读并不教给你任何直接的知识，我

们希望通过经典阅读，就是培养一种能够超越急功近利的心态，能够逐渐的克服浮躁的心态。因为经典的阅读不可能是快餐型的阅读，不可能是很快的泛泛的读就给你有用的东西，它可以说完全没有用。读一个柏拉图、读一个孟子，有什么用，他能帮你找工作吗？没有用。但是我们比较提倡在大学里面要有一种无用的知识，不是强调有用的知识。所以并不是说通识教育仅仅是经典阅读，但是比较重要的是以经典阅读来凝聚一种新的读书的心态，这是到今天为止历届暑期班我们仍然在做经典阅读的原因。而且在大学里面，经典阅读在通识课里面比重也会越来越大。

我相信十年来通识教育的推动一个比较大的成果，实际上是通识教育的教学方式覆盖到了也影响到了特别是文科的教学方式，也就是专业课的教学方式受到了通识教育经典阅读非常大的影响。现在年轻老师上课不会跟十年前一样再是概论等等，所有的教学无一例外都会以经典为中心，都会有讨论班。我相信这是推动通识教育所带来的成果。

10年、15年前，大学上基本上充满了概论、导论性的课，我们的本科生绝大部分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经典。我曾经几次都讲，回国以后我在香港大学，我去参加博士生的面试，我非常吃惊这些国内很好的学校的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的学生，读的几乎都是二手材料。我当时非常吃惊，这都不是一个比较差的大学，是比较好的大学学生来报考博士。7年下来没有读过任何一本完整的哲学原典，都是道听途说，看的都是二手材料，这个情况在今天已经基本上完全改变了，已经不大可能。

以前很多原典本科都不接触，到研究生才开始读，这个现在变化比较大，我觉得这个大概是通识教育十年下来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实际上是影响到了专业课，在文科方面看的比较清楚。越是年轻的老师越是接受我们一直在提倡的经典阅读为中心的教学的讨论的方式，包括小班讨论课相当的普遍，只要有条件的地方。在比较好的“985”大学，讨论课相当常见，不像以前基本上不大有讨论，因为中国学生很多，三四百人怎么可能讨论。现在中山大学即使大

课我们也讨论，像杨斌教授说的，他在清华的课程，本来30人，到60人，到300人，同样也要进行小班讨论。所以我相信现在来说，十年下来，通识教育并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理念，包括一些基本的做法，比如说小班讨论的必要性，或每两周或者三周、四周一次作业而不是一篇集中论文，这些具体的做法已经比较普遍。在比较领先的“985”大学已经成为比较基本的共识。

但最主要的问题仍然完全没有解决，就是解决大学的浮躁和功利化。最近我和黄校长也说，我和好几个老师都说，我自己觉得“985”大学目前这些年，10年左右，6、7年以来是有明显的改善，中国大学实际上是越来越好，原因也很简单，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第一个，毋庸讳言，中国大学现在处于最有钱的阶段。有钱未必是好事，但是没有事是真做不了事，包括通识教育也是要有资金来推动；第二，师资的更新。大概可以说，“985”大学最近，不说10年，6、7年新晋的教师不可能是很差的，如果差，一般是进不来的。也就是说，现在大学里面，“985”大学，甚至一般地方院校进的师资都越来越好，而且这个师资基本上年轻的老师已经接受通识教育的观念，都非常投身于教学，对教学都是非常重视的。但是我们的印象中，包括媒体也好，社会也好，对大学的看法，仍然没有改变。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整体性学生人心向学、读书为贵的风气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大学的浮躁，急功近利，仍然是非常突出。

包括黄校长刚才报告里提到的他采访很多大学的校长，强调大学不要过分强调就业率，都是这个考虑。过分强调就业率必然导致一个学校以短期的功利化的目标来衡量大学，而不大能有一个从容的心态，从一个长远的心态来考虑大学氛围的建设。这些讨论仍然是我们十年前担心的问题：大学静不下来。当然，这些问题很复杂，并不仅仅是大学本身的问题，与中国整体社会发展阶段都有相当大的关系。但都在好转起来，现在中国大学里面接受通识教育的学生，潜心读书的学生越来越多。昨天晚上还有人传给我一个很长的帖子，说他对大学极端的失望，对整个大学的失望，仍然是十年前说的问题，进了大学极端的失

进入西方的原典，就从西方的背景进入；进入中国自己的原典，也要从当时的历史场景，做大规模的中西对比，我认为时候还没有到。

望,为什么?进入大学发现大家都不读书,都在混。这个话,在今天稍微有一点极端,在任何大学里面我们都发现越来越多的老师在非常认真的教书,也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在非常认真的读书。

顺便抱歉一下,今天我们录取的只有申请人数的1/4到1/3左右,不可能容纳那么多人,所以每个人都有充分的资格进入,只不过因为空间的关系,场地教室的关系,不能够容纳那么多人。

总之,中国大学的情况是在越来越好,黄校长报告的时候最后一部分他没有讲,实际上最后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他提出的是通识教育最关键的问题,通识教育最根本的问题实际上本科教育的一个方面,通识教育是整个本科教学改革的一个环节。中国大学,哪怕是最好的大学,包括北大、清华、复旦、中大,某种意义上通识教育都有瓶颈的麻烦,主要是整体本科教学改革并没有完全推动。

比如说在所有大学里面,像清华大学这个矛盾就非常突出,就是通识教育和专业课程的紧张度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矛盾。清华大学理工科学生的功课、专业功课极为沉重,实际上会导致他拿不出足够的时间来上通识。新雅书院是一个非常大的实验,就是要求专业和通识有一个平衡。实际上新雅学院的学生都非常的辛苦,包括建筑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等等,所有专业课程比一般的学生都要重得多。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他们拿出时间,以同样的时间精力投入到非专业的通识核心课程,这需要每个学生都做出很大的调整。所以,以后的问题可能就是本科的课程如果不做适当的调整,调整成比较合理的阶段,通识教育实际上是很难继续往下深入的。

几乎每次我们都会讲一个问题,美国哈佛大学所有这些一流大学他们每个学生一个学期平均是4门课,哈佛大学4年八个学期,32门课,多少年都如此。芝加哥大学平均每个学期3门课。我们中国所有大学,包括北大、清华、复旦、中大、人大、浙大全部都在内,每个学期都是12门课,12门课是最少,甚至有15门课。我们可以稍微想一想,一个学期上4门课,在每门课投入的时间精力就要充分得多,肯定学的就深入。相反一个学期12门课,都在疲于奔命,都在应付,又平均用力,必然每个课下的功夫都不重。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设立这么多课程,实际上很多美国的教授到北大、到复旦这些地方来教课,稍微了解他们都会发现:为什么中国的大学要上这么多专业课?他很不明白,同样的专业课一个学期有7、8门。这个是通识教育比较深层次的问题,也是中国大学下一步改革比较深层次的问题。

黄院长没有讲的那些内容里特别提出了一点,这些麻烦不是教育部能够解决的,甚至也不是校长能够解决的,

而完全是一个学科一个学科的院长。如果一个学科的院长他愿意做就有可能性,因为这涉及到每一个学科的专业课到底要怎么上,上多少的问题。

科学家,像施一公教授、饶毅教授等都意识到这一点,没有必要上这么多本科的专业课。讨论的时候我甚至提出一个看法,好几个国外的理工科教授在十年前都发现这个问题,中国的本科生相比他们在美国教的本科生都要优秀,但是研究生到博士生就不如。我现在有时候相当怀疑,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本科生的时候专业课上的太多,这样脑子就很不灵活,受到太多的僵化的束缚。而且上了太多以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他的基本治学观念是什么,他是以已知的知识作为最重要的知识,而不是以未知的知识作为最重要的知识。为什么要上那么多,都是已知的知识,这些已知的知识其实是没有用的。仍然是以灌输固定的知识为目的,而不是培养你真正的阅读能力与理解能力。

施一公教授讲他个人的经历。他到美国去发现突然来一个课,清华没上过,马上就会毛,因为我们的理解是所有的课程都上过。比如说我们的哲学八个专业,我都不知道八个专业的必要性何在,完全没有必要。什么伦理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科技哲学,不都是西方哲学吗?最多两个,一个中国哲学,一个外国哲学就完了。弄那么多,而且这些东西就导致很多学生学了不必要的课程,因为每个学期都有必修课,没有必要上。这些问题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因为它牵扯到利益,它不是理念。人们的理论上都承认没有必要上,但砍谁的课,就是砸你饭碗。这个问题究竟怎么解决,我不知道,我期望十年以后你们当教授的时候能够解决。

我们如果去检查中国的很多专业课,重合度非常高。理工科的教授他们自己跟我说,他们把所有的PPT放在一起,结果发现几乎所有的课前1/3都是相同的、相当接近。大家都认为要从头开始,从最基础的ABC开始然后推上去,实际上导致无穷的浪费时间,很多课是可以砍掉的。

我这里可能说的严厉一点,但是我感觉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本科专业课,如果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思维方式来设计来进行的话,通识教育很难有更大的发展。我希望这次四校组成联盟能够讨论的问题,需要像十年前一样凝聚比较大的共识,联合一些院长,黄校长说的很对,只有院长,要有威信的院长就可以做。我们可以试错,可以尝试,但至少没有必要按照任何一个已经规定的什么课程你必须上,那样就不好了。所以我把这个作为一个很大的期望,我认为这个问题最少要十年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不大可能一蹴而就。

另外一个问题是十年前就提出到今天为止仍然没有变化,但是我认为在人心当中,在共识方面是达到了。就是

我提出的，在中国大学里面的商学院和法学院，甚至包括新闻学院，我认为都应该转为后本科的职业学院。我仍然认为这是美国大学本科教育能够做到那么好的极为重要的因素，它的法学院、商学院、新闻学院都是没有本科的，甚至绝大多数医学院都是没有本科的。

我说如果美国的大学也像我们一样，商学院、法学院都是在本科就有，美国的通识教育肯定完蛋，因为每个中产阶级家庭都会计算，我如果直接18岁把小孩送进去，我就可以进商学院、进法学院，四年就可以进企业，我为什么让小孩接受四年的本科通识教育？美国的家长远比中国家长实际。就是因为所有的学校都是商学院、法学院包括新闻学院没有本科生，而且只有在本科通识教育阶段所有都做的最好才有可能进入最好的商学院、法学院，这样一来就一箭双雕。即使本科教育完全不受这些最功利的职业的、专业的学校的影响，同时恰恰以后这些法学院、商学院所收到的学生是在本科阶段受到四年最好的教育。也就是说，他如果不在所有的通识教育的各方面都取得比较好的成绩，不可能进入最好的商学院、法学院。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私下谈的时候很多院长都是同意的，之所以不能够推动，也都是因为很实际的一些原因。比如说北大的法学院，我跟他谈的时候，完全同意，但他说大家要一块干，否则我北大不合算。所以我当时说找几家最好的法学院，比如说北大、人大、清华，三家最顶尖的，你们处于无竞争地位，不怕招不到好生源，你就可以做成，然后风气就可以推下去，但是谁也没有勇气。所以，真正的特立独行是很难的。每个人都说独立思考，特立独行，我独来独往，其实大家都是 normal gay！每个人都在做每个人都会做的事情。我们几个真的有个性？很少，因为顾虑很多很多。不是说个人的事情，作为一个院长必须想他的学院的发展。

讲这些，特别的希望现在的学生，本科生和硕士等等，大学改革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要有足够的耐心。我仍然相信中国大学会越来越好，事实上我认为北大、清华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了，只不过大家心态反而没有认识到，大家老觉得自己不行。北大所有的理科都在世界的前三名，那不是世界一流的大学是什么，尤其中国“985”的北大、清华、复旦、中大的本科生是全世界最好的本科生，问题是在四年毕业的时候可能就不行了。刚进校一年级的的时候是全世界最好的，很多在国外来的教授都觉得清华、复旦的本科生远远超过他们教的本科生，但到研究生、博士阶段就不行。所以，这里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讨论。通识教育我仍然讲并不仅仅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我们也看到十年来它影响到本科教学的方式是最正面的，同时也暴露出来大学的很多矛盾，为什么我们要上那么多的专科课，有没

有存在一种可能，专业课上的太多了反而不灵光了。不是专业知识要学那么多，固有的、已有的知识不是那么重要。为什么我们强调学经典，经典让你能够学会比较深层的考虑问题，能够有一个思维方式的变化，这才是大学的真正目的。

这是今年暑期班我仍然会强调的几点。最后本届暑期班有两个问题稍微讲一下，今年暑期班有一些敏感的学员可能已经发现，确实我对今年暑期班的老师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今年的老师们讲课是两个文本，或者是跨两个时代，一古一今或者一中一西。特别想强调一下，包括我个人在内，包括所有五位主讲的教授在内，都无意要提倡现在每个人都进行中西的比较。我仍然认为中西比较是一个很复杂，很难做的事情，一个不好就会非常的肤浅。也就是说，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希望进入西方的原点，就从西方的背景进入；进入中国自己原点，也是从当时的历史场景。做大规模的中西对比，我认为时候还没有到。之所以这几个教授我们会请他们，是因为他们在教学、科研、等很多领域会有自己的想法。

我想强调一下，中西文明的差异很多是肉眼一看就知道的，但是从学理上，从深层的思想上去做是非常难的，非常高的境界。难度很大，你要有这方面的思考，但不宜轻易马上去做这个东西，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会流于肤浅。我觉得时机还没到，特别是我们对中国经典的研究，我认为其实到现在位置刚刚开始，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中国经典没有引起非常根本的重视。民国以后，晚清以后，基本上经典都被放在非常次要的地位，或者仅仅当做材料的地位，而不是把它当做仍然能给我们提供根本思考价值的地位。这是我特别希望避免的问题。

第二个，我想讲一下，跟部分的学员抱歉一下，今年小班讨论很多学员都报名了，但是最后小班讨论基本上限于本次学员里面的本科生为主，部分今年的硕士生。受到很多的限制，比如博士和本科生编在一个班里很难讨论，这是一个方面。当然也受制于教室、助教的限制。最近几年我感觉小班讨论的人数最合适的是8到10人，效果会比较好。所以，这次小班的编排——除了个别的情况，有些多一点，最多一个班15人——大部分是10到12人左右。没有编班的最好不要去讨论，如果你去的话，至少要跟小班讨论的主持人打个招呼。

总的来说，希望这次的讨论班效果会比较好。前几年最初的小班讨论都不是特别成功，今年把班编的小一点，我们期待着小班讨论比往年有比较大的成功，而且来的学生都有小班讨论的经验。这是希望和大家讲的。

最后，祝大家不要生病，能坚持完。谢谢大家！■

甘阳专访

通识十年：从香山会议到四校联盟

采访者 夏宇阳 段英子 王晨晨

通讯：这次专访，想结合讲习班、通识教育理念以及十年来的实践请您谈一谈。先从这一届讲习班说起吧，通识教育暑期讲习班已经办了7届，今年（2015年）的第7届大家都注意到与以往有些不同，一是今年讲习班是纪念香山会议十周年，似乎有检验通识教育十年发展的意思，二是这次讲习班由四家大学（北大，清华，复旦，中大）联合主办，预告这四家大学要结成通识联盟，三是今年讲习班主讲教授全部是70年代生的，似乎暗示了学界的某种代际更替，您能否先就这几点谈谈？

甘：国内近年的通识教育应该说是由官方和民间共同推动的。所谓官方是指教育部和大学行政部门的相关政策，民间则主要是教授们的讨论和教学实践。就官方而言，最重要的是1999年教育部建立32家大学作为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并由此建立了新的学分制度，这为国内重点大学开展通识课程提供了学分上的制度保证。就民间来说，2005年的香山会议即“中国文化论坛首届年会”是最重要的教授们凝聚共识的起点，这个会几乎所有重点大学都有专门的报告，200多位教授讨论了整整三天，对中国大学如何实际开设通识课程达致了一些基本共识。也是在这个共识基础上，中国文化论坛委托我开始筹办通识教育暑期讲习班。应该说，官方和民间的共同推动缺一不可，没有教育部规定的学分要求，通识课程就无从开展，但如果没有大学教授们自觉主动的通识教学实践和积极的思想交流，通识教育必然流于形式而且多半变成一堆水课。

通讯：这次形成的四校联盟和讲习班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是这四家大学？

甘：这四家大学都是历届讲习班的主要支持者。第一届讲习班是由清华大学主办的，第三届是由复旦大学主办的，第四五六届则是由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联合主办的，到这次第七届由这四家大学共同主办。承办通识教育暑期班本身就表明了这家大学高度重视通识教育，因为承办方大学暑假期间要提供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从教室饭堂到住宿都需要大量的工作，对通识教育不重视的大学就不会做这种事。

通讯：讲习班主要的目的是办给学生，还是给老师们做个示范？

甘：都有。所以学员主要有两批人，一批是年轻老师，还有一部分是学生，但目的都是培养今后的通识教育人才。十年前香山会议曾特别邀请了一些本科生参加，这些当年的本科生现在基本都已经博士毕业成为大学老师了，例如当时北大法学院的本科生刘晗，现在已经从耶鲁读完博士回到清华法学院教书了，我在清华大学主持新雅书院课程，他已经可以是主力教师之一。所以每年办暑期班，一个目的就是培养人才，很多学员都是在讲习班以后回到自己的学校开展通识教育实践的。比如青岛大学来的卢文丽老师，她当时刚刚研究生毕业，参加了第一届清华的讲习班，然后到青岛大学工作，在青岛办了一个浮山书院，做通识教育做的非常好。讲习班也开放少数名额给不在大学工作但可能在社会推广通识理念的，例如有一个工商银行的赵先生他在工商银行做银行系统的培训，在培训的时候就会把通识教育的理念加进去。所以讲习班的目的，一个是向整个社会普及通识教育的基本理念，另外一方面，各地来的本硕博师生回去会在学校推动通识教育。

通讯：这次的学员录取情况是怎样的？

甘：今年从录取来说，我本来录了 392 人，因为北大这个教室是 492 个座位，留了 100 个给旁听的，后来北大有点担心校园治安等方面压力太大，因此最后录了 300 左右正式学员，主要是由于场地限制和助教人数限制。很多没有正式录取的我都很抱歉，有很多很可惜，他们仍有一些来旁听，我都很不好意思。另外，今年有一点不一样，是第一次由四校联盟主办，理论上主办学校有优先权，所以这次四校的学生多一些。以后每年都是这四个学校联合主办，所以以后学员的平衡会比较头疼的问题，从前讲习班都很照顾地区平衡和学校平衡。还有一个考虑，是在北京办则通常北京各校的学生一般会录的多一点，因为这样不用解决住宿问题，如果都是来自外地院校，住宿特别适合学生的住宿就比较紧张，没有那么多床位。但这样很容易受到批评，我经常被批评精英主义严重，其实我是很平民化的。这些年好一些，以前有人批评通识教育本身就是精英主义的体现。

通讯：这也是我们想探讨的地方，大家一听“通识”就觉得跟全社会都有关，培养的是人人都应该具备的素养，但我们的实践只面对大学本科生，相对于全社会，这就已经是精英了。

甘：中国人口这么多，大学生人数比很多国家人口还多，能先把大学做好就很谢天谢地了。而实际上很多大学目前都缺乏基本条件，大部分地方院校师资根本不够，开展通识教育没有那么充分的条件。因此，实际上最有条件而且现在通识教育做的比较好的，就主要是中国最好的大学，即使 985 大学也有很多并不具备充分条件。但是，实际情况也并非全都如此，关键在于是否有几个有心人，有很多学校，条件未必很好，但因为特别有心的教师和校长，就仍然可以开展的很好。比如这次湛江师范学院有一个老师来，他们自己做了一个博雅学院，那个项目做的非常认真——所以很多地方院校也在做了。关键是看有没有一个有心人，只要有一个有心的老师，哪怕他只开一门课，他都能团结一部分学生而且往往是比较优秀的、想读书的学生。还有包括贵州大学等等，都是典型的例子。

通讯：那么您在录取过程当中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比如报名的人，或者他们写的内容让您印象深刻的？

甘：申请表有很多个人信息，我们不便透露，但每年看学员申请表都可以看出国内通识教育的发展。首届讲习班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还不明白通识教育。但这几年，已经大大不同。现在的学员从学生到教师都有专门在做通识教育调研的，今年学员中好几个本科生的本科科研题目在做很具体的通识调研；老师方面就更多了，除了上面谈到的湛江师范学院的，还有一个山西吕梁学院，也是在推动通识教育；昨天有一个浙江财经学院教务处的副处长来了，也在做通识教育，昨天还有一个湖南师大的找我……这些都是校方行为，湖南师大也要成立一个人文学院，以通识教育为主。这都和大学校长重视有关系，湛江师范学院比较典型也比较完整，虽然是比较小的地方性院校，但他们的博雅教育做得非常好，这样的案例比较多。还有北大附中的校长，北大附中已经办了博雅书院。现在和十年前很不一样，每年大概都有一些学员，来了以后回去做，或者来的时候已经做了，来看通识教育具体怎么做，这方面的效果相当明显。（通讯：录取的名单里还有中央美院的学生？）对，中央美院很多学生老师对通识教育特别关注的，每年暑假都会来人，他们学生自己也会推广，结成读书班等等。美术学院、艺术院校的通识教育怎么做是一个挺大的问题。（通讯：同济大学附中也有师生一起组团报名？）一个老师带了两个学生。这个老师他是北大毕业的学生，希望他的中学生也有机会听一下这些课，想来的人数很多，最后给了两个学生名额，是两个高中生。另外，录取里面还有名额给民办中小学，是校长和主要的老师。民间办学，包括办小学、中学和社会教育，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我们会特别照顾一下。我们想通过一两个案例来看一下民间办学的情况，他们主要是来接受我们阅读经典的理念。这个很有意思，像你刚刚问的问题，如果说通识教育并不只是在大学，还包括社会，这些就是一些案例。

通讯：就是说，通识教育这个概念也可以包括社会上的一些教育？

甘：通识教育从课程来说，肯定首先是大学的一些正规课程。但我们十年来比较突出强调的、通识教育更根本的含义，是阅读经典、回归中国文化主体性。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通识教育想达到的目标——达到文化自觉，使中国大学生能够明白自己是中国文化的传人而且对中国负有责任，而且要理解到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到底处在什么位置上。中国人希望中国复兴，这是很正当的要求，但隐含了一些复杂问题，中国的学生至少要考虑这些问题，然后要能够

重新认识中国。无论是认识中国还是西方，抓住经典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通识教育十年来比较大的成效是，我们提倡的教学方式——比如经典为主、小班教学、相当大量深入的阅读——目前已经比较普遍深入到文科专业的教学。这对今天的人文社会学科教学影响非常大，特别是一些年轻的老师，教学方法跟十年以前已经很不一样，他们基本上都会注重经典。

通讯：通识教育强调阅读经典，经典是怎么定义和选择的？

甘：这是个有趣问题。我每年都会收到不少邀请希望我开书单推荐阅读书目，我一般都推辞，因为现在搞书目推荐的媒体或大学往往比较盲目，一列数百种上千种，有什么意义？很多人不知道，教授推荐书，最容易的是推荐三百五百种或一千种，但真正难的是推荐十五种到三十种，那才见功力。推荐三百本、五百本，往往是自己都没看过的，天下有名的书都放进来；如果推荐十五本，难度就大了——为什么是这十五种书，你要说说看。所以，首先不可能有一个官方的标准来规定什么是经典，但是在教授里应该会形成一些基本共识，但中国目前的情况恐怕没有这种共识，这也是我们的文化现状。我从前经常说，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里有一个概念叫“神圣的十五种”，亦即虽然没有官方规定而且实际上每个学校都不一样，但美国大学通识教育对最基本必读的十五种左右经典著作的重合度非常高，也就是说，西方人对哪些是他们的最核心经典有一定的共识。中国从前也是如此，比方说最早是五经，宋以后是四书。但晚清特别五四以后中国经典和古典基本被打倒，最多作为研究资料，不再是中国人教育的经典。因此最近这些年的通识教育开展，实际上也是重新肯定中国经典在当代中国大学的基础教育地位的过程。每年的讲习班都中西经典并举，希望中国社会形成尊重经典的文化风气。但是有些经典并不适合本科的通识课，比如《尚书》，或康德，这类我认为都不适合本科生。所以经典是一个概念，适合本科阅读的经典是另一个问题。此外，经典也包括现代经典。我们有一年的讲习班专门讲中国现代经典，包括费孝通、鲁迅、梁漱溟、章太炎等，我们不断在探讨，并不仅仅是古典。清末民初的这一代中国人最早的受到西方冲击的那批人，我们非常重视。所以看我们讲习班历来的文本，大概能看出来一些范围。

但最基本的问题是，有没有合适的老师。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人基本否定中国经典的教育意义，很多人甚至认为再强调中国从前的经典就是反动要走回头路，因此中国经典在中国大学长期没有地位，最多不过是史料，所以今天如何在大学通识课给大学生讲中国经典需要大家从头摸索和相互交流。这些课程有相当一部分需要今天的老师自己去摸索，从前老师没教过，没有先例。比方说，我办中大博雅学院，要找一位老师能够教《史记》，这个要求不高吧，听上去应该很合理吧，但我要求这个课一周上三次6个学分，而且对象是大学新生，要求一个学期内把《史记》讲完而且要求学生能把《史记》原文通读一遍，至少也要读四分之三，这课就非常难了，这样的老师就难找了。事实上没有一个历史系毕业的博士作本科生时曾经上过这种课，至少本科阶段没有老师这么教过他们，因此这样的课必须自己从头摸索。《史记》对于现代很多人来说似乎主要只是有史料价值，但是《史记》这么伟大的著作只是史料吗？所谓史料往往是现代人根据现代人的视角，东挖一条西凑一条的来说明某种现代人眼里的的问题，但《史记》有自己的内在结构，有整体的思想，这些都没有被重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文明变得非常的薄，没有厚度。因为你的那些问题或看法无非都是靠学现代西方的观念来看中国的历史，好像中国古人没有思想一样，这都是有问题。并不是说这种方式不可以，但至少要充分地了解中国的整个文明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中国历代最厉害的圣人、思想家是怎么想问题的，但是因为以往一百多年我们太想变得现代，中国古人如何想问题如何思考历史好像都无足轻重，反而都被抛弃了，好像司马迁写史记仅仅是为了给后人提供所谓史料。相对来说我们教西方经典还比较容易一些，西方学者对西方经典怎么教，都有比较成熟的阐述，我们很多老师在西学方面受过很好的训练。反而中国经典在一百多年来没有当作事情，现在也很少有好的思路来讲。比如现在都在讲四书，四书的内容很多，取决于老师自己怎么样来把握，但是最低要求是让学生在这个学期内把四书认真地读一遍，但用什么方式来保证呢？如果通过某种方式让没读的学生在课上马上表现出来，很狼狈，那这个课就比较成功。我们前两年由中大和清华联合开过一次两岸四地的四书教学研讨会，大家都觉得相互交流非常有收获。这里面大量的工作要做，很多老师都在其中摸索，包括今年讲课的老师，都是讲了很多年的一线的老师，但仍然在摸索。

通讯：所以讲习班的课程设计也有给通识教育课程做示范的意思？这次大家都注意到，今年讲习班的主讲老师已经换成了几乎全都是70年代生的，不少人甚至把这次讲习班看成是学界代际更替的一个标志？

甘：在这样一个全国最高水准的讲习班，教师当然并不那么容易找，尤其如果每年办的话，你总不大希望今年是这五个人，明年又是这五个人，最好是每年有新面孔的，但是找哪五个人？能否达到我们要求的标准？讲习班最早是以我、刘小枫、陈来和汪晖等等这些五十年代生人为主加上个别我们的老师辈如李学勤先生等，再后来是五十年代人加上比较年轻的，例如今年的李猛、吴增定、吴飞其实以前都讲过，今年则确实是全部都由比较年轻的担任，今年五个老师年龄差不多，都是70年代的。所以时间过得很快，他们现在已经是资深教授了，是大学教授队伍中的主力了。现在各大学通识课很多已经是80年代生的年轻教师担任了。我个人相信，越是年轻教师，越是接受通识教育理念，越是愿意摸索如何开通识课，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应该是有后劲的。

通讯：从经典阅读的角度，通识课的难度和文史哲专业的专业课有什么区分？

甘：一个好的通识课，甚至应该是加强版的专业课。北大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比如吴飞等人的专业课，有一半是非哲学的学生，这种通选课不会根据你的专业是哲学还是非哲学采取深浅不同的讲法，反而一定会讲的更好，让非专业的学生都受到和专业学生一样的专业训练。主要目的，是希望讲无用的知识，不是今天教给你马上就能用的知识，而是比较偏理论一点。通识教育十年前最早做起来，主要是考虑中国的年轻人不读书，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反功利主义的倾向。这往往是我们和大学校长们的分歧，校长们更多从是否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的角度考虑，我们考虑的首先是：大学是否是一个书香社会？学生是把自己当作读书人，还是仅仅想做未来的小白领、公务员、企业人？我们希望他不管以后做什么，但在大学里，特别是中国最好的大学里，能够有一个读书人的心态和气质，这样长久以后，中国人的表现就会不一样。所有中国人“知书达理”之后，整个社会的文明就会有比较大的改变。现在几乎所有人都是大学生，无非是大学有好有坏，但问题是大学教育到底是什么目的？我觉得首先就是读书人的问题：有一个真正的自我，不是随波逐流的人。当然，每个人都要安身立命，都要有份工作，但除此之外，你内心还要有些东西，否则

就会很可怜地被外界推动着而完全没有自我。这就是通识教育的基本问题，要完成大学树人的目的。知识只是手段，通过读书使人达到比较高的境界，学土木也好，其他也罢，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跟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能一眼看出来，但现在看不出来了，受过高等教育而没有读书人的气质，这只能是大学教育的失败。

通讯：通识教育要通过知识来达到树人的目的，但目前的实践似乎是局限在人文学科？

甘：我们不是不重视科技，讲习班专门有过物理学家来讲。但是科学的课程在实际操作方面很困难，打个比方，最好的人文学者理论上一定是最好的通识教师，人文方面的如果不能讲很专业的课程，一定不是一流的学者，一流的学者自然会超出自己的领域，影响也会跨出自己的领域，会思考很基础很基本的问题，这不同于狭隘领域的专家。理工科有很多很细的专业分工，最好的理工科老师一定工作在前沿，但不一定是最好的讲师，而且他并不一定愿意去教很基础的东西——而适合通识教育的科学课应该是最基础的东西，这就是科学方面相当麻烦的问题，老师不好找。最理想的是杨振宁那样的大师，他回到清华第一次课据说是给大一新生的大学物理，这样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所以实际上有困难。即使美国方面，通识的科学课程其实也不很成功。哥伦比亚大学通识系列有《科学前沿》，但哥大的学生非常抱怨，四个星期物理，四个星期化学，学生说我刚刚进入物理，突然又到化学，刚刚进入化学，又生命了。而且这种课必然是好几个教授同时上，而教授水准是参差不齐的，有些老师比较适合讲，有些老师不大会讲。理工科方面往往会有一些特别厉害的牛人可以讲通识课，但这种人可遇不可求。香港中文大学原来的工学院院长，八九十岁的老头，和我关系很好，但他的通识教育理念和我截然相反：他认为什么是通识，通识就是一门课——从天上讲到地下、从史前讲到现在。这样的想法，是科学界的人对通识教育往往会有有的。我说你这个课麻烦在哪呢？你之后就没人能讲了，无法制度化，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像你一样人文理工都很好。实践上不宜提倡这样的课程要求，这会把所有教师都变成万金油，你达不到一定高度，那肤浅的谁不能讲？所以我们要求通识课的老师必须以自己的专业为基础来讲，我们是通过不同学科的老师给学生带来通识。我们讲习班突出的，仅仅是通识的一个方面，即经典阅读方面。但具体到学校的通识整体课程当然就不一样，每个主管大学通识教育的人一定要对课程有全面考虑。比如我主管中山大学全校的通识课，科学等等课程当

然都有安排。讲习班突出的是经典阅读，因为人文经典阅读比较容易把通识课的质量带起来。另外，我认为今天大学通识的科学方面不应该再是传统的数理化，我比较强调环境科学、生命科学还有和空间有关的科学，我觉得这些是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需要了解的——同时有些课不需要过多的前修要求。在中山大学，生命科学院提供的通识课程比较多，他们的教授特别多，学生反而没有那么多，所以他们比较愿意开通识课——这个要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来考虑。所以全面来讲，通识教育并不是只有经典，但讲习班，我不希望做得非常散，要有一个中心关键所在。

通讯：回到人文这方面，人文课程除了目前经典阅读和小班讨论的模式外，是否还可能其它模式？比如北大有一些很成功的通选课，像阎步克先生的课，并没有完整地读一部经典，而是在众多材料中找到一条线索的思路。

甘：步克的这个课我非常了解，这当然是非常好的通识课，因为这一门课上过之后，非历史专业的学生就能知道现代的历史学是什么、学者们是怎么从事历史研究的。有一年讲习班就请了步克来做了一个报告，讲他的课程是怎么安排的。这当然都是我们非常认同的、非常好的通识课，毫无疑问。而且他们实际上也会越来越多地用经典。现在在很多老师的课，名称未必叫经典阅读，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阅读要求都会越来越加大对原著的重视，而不是一个泛泛的通史或概论。比如现在仍然有中国哲学史，仍然有西方哲学史，课名没变，但老师的教法在变，都在加大对读原著的要求。这和十年前已经大不相同，十年前或更早我刚从美国回来还在香港大学工作时最惊讶的一点，就是我作为兼职博导参加国内博士考试面试，有些学生本科四年研究生三年一共七年下来，除了上过各种哲学史，完全没有真正读过哲学原著，这我就没法带了。但是现在已经大不一样，包括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更不用说，课名可能还叫概论或通史，但你看它的阅读材料，都加大了对经典的要求。但我们还是必须要强调，中国学生的阅读量仍然比美国最精英的学生少。美国学生有一点好，他比较傻——这是说以前的美国学生，现在他们也跟中国学生会偷工减料了，原来的美国学生特别实诚，你让他读多少他就读多少，懂不懂不知道——但他肯定按要求读了一遍，废寝忘食也会读完。（通讯：像郭靖一样。）是，像郭靖，人家读下来就是不一样。有很多没读懂，然后慢慢再讨论——所以小班讨论对他们特别重要。小班讨论往往是他们消化阅读材料的一个过程。同学之间相互的帮助马上体现出来。

通讯：这些方面确实需要向西方学习。但中国的通识教育也有中国自己的特点，这应当怎么体现？

甘：中国的特点，我们这些年做得已经非常明显。我们认为中国通识教育的最高目的，是中国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是为了让学生——特别是最好的大学的学生——拥有一个作为中国文化传人的自我意识，要有这样一个担当：你下一步，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要做什么贡献？这是我们希望，我们不会天天说这个，但我们希望潜移默化地让你变成一个有历史深度的人，不是一个仅仅生活在当下的人。人类和蚂蚁的区别就在于，蚂蚁生活在当下，它没有历史。人类有历史感，这个历史感同时是他的包袱、他的不幸，你去看尼采的《历史学的功用》，这也是人类区别于动物最根本的一点。这是我们通识课的目的，更清晰地了解自己，哪怕读西方经典也是。但除了这个目的以外，在教学方式等方面，我认为共通的。美国学校的本科教学要求比较严，有很多方面仍然是我们值得学的，他怎么组织一门课程，他们要求学生一周读多少页的材料，他怎么考核来确保教学过程达到了教学目的——而不是只是教师在讲而学生根本没有听，这是他们做得比较好的。他们为什么大多数都是小班，20人以下的小班，目的就是保证教学质量。中国特色未必就是好的特色，而是不得已罢了，中国的全部问题是人口太多，因此我们大学学生人数超级多，即使北京大学，目前都做不到我希望的一点：就是至少85%的课变为低于30人的小班教学，最好15至20人左右的小班教学。小班的道理很简单，我们假定有一个差的教师，他祸害也只祸害15人，要是大班，一祸害就是150人，这个差别就很大。现在假定有十个教师，比如你们中国文学史，为什么非要所有人一起上一个老师的课，不能15个人一个班，七八个老师同时上吗？那马上看出老师的水准来。清华新雅学院我就这么规定，每个班都29人，清华新雅的教室里只有29个位置，助教都要另外拖一个椅子进来坐。其实，北大按照师生比是完全做得到的。复旦招生比北大还少，但他们仍然谈的是大班教学、小班讨论。照理来说，我认为北大、清华、复旦，应该探索走向完全小班教学。像这些本是中外共通的，但我们做起来比较费劲，就是不好的中国特色，要想办法解决——所以要大量地让博士生、研究生去作助教。

通讯：在读西方经典的时候，是否会强调从中国的视角出发？

甘：我们比较强调先从西方的脉络进入阅读，不要上来就套中国的事，先要明白人家是怎么一回事。中国人读西方经典是很难的，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都会感觉到，中国学生进入中国经典相对比较容易，毕竟是自家传统。但对西方思想，泛泛而谈的非常多，真正深入要去了解，说实话不是那么容易，社会上媒体上很多说西方这样那样的都是非常肤浅不靠谱的东西。每一个西方经典的进入都需要很大的力气。文史哲三系，传统上实际上只有哲学系有比较强研究西方的实力，这是传统形成的。客观地说，中国大学历史系的世界史专业一向是比较弱的，并不像哲学系的西方哲学专业已经有自己的传统，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客观上受到很多局限；中文系的外国文学专业说实话大部分也都比较弱，从前读外国文学是在外文系，但现在外文系在外国文学上越来越衰弱，外文系学生基本没人读文学，因为多数学生读英语只想去作白领，所以英语系现在连就业都很差。所以，回到你的问题，我要强调一开始不宜强调中国的角度，先要对西方有深入的了解，否则就会容易歪曲人家，这是要避免的。现在有些人有过强的中国立场，但我们要避免以很低的水平去批评西方。如果批评西方，一定要懂西方，然后进行内在批评，而不是从外在突出人家的黑暗面。当然，中西文明的问题一定会越来越成为我们的问题，最后一定会中国人从中国自己的角度来看西方的问题，但前提是对西方要有比较深刻的了解。目前的阶段，仍然需要大幅度进入西方，我一再提“重新阅读西方”：从前中国人是从自己的幻想看西方，神化西方，好像西方人美国人都生活在月球上一样，其实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而现在可能出现另外一个情况，去丑化人家。这两种都要批评。任何一个文明，一定都有它的长处，一定都有它的短处。中西文明确实差异非常之大，这个毫无疑问，但怎么去理解？比如我01年写施特劳斯的那篇文章，什么叫“自然”？这是我们很多学者现在都关心的问题，中国人对自然也有自己的理解。因为自然意味着人的道德和文化是否有一个超越人的基础，神的基础也好，自然的基础也好；如果没有这些基础，一切都是人为的，那意味着人可以随意创造任何东西，随意毁灭任何东西。它是否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和标准呢？不同的人族群是否就只是不同的风俗呢？还是说所有的道德也好政治也好，有某种自然的基础。你们可以注意讲习班几乎所有老师的讨论和研究，比如李猛的《自然社会》，都是在思考讨论“自然”这个问题。中西文明在这样一个层面探讨就会比较有意思，而不是随意地歪曲。

通讯：在具体的教学上，是否可以请外国教师或者进行英语教学？

甘：当然可以啊，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这完全是技术性的问题：学校是否有钱——应该都有钱；还有人家是否有空。当然有一个选择问题，不是随随便便一个外国老师就可以，没这个事情，我们邀请的肯定是我们认为比较好的外国学者。但请外国老师教，完全没有问题。中大博雅学院每年都会有国外老师来教课。

通讯：那么后面回到宏观一点的问题，自从香山会议提出通识教育，十年以来在全国的实践，您认为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您对这些成就是否满意？

甘：首先一点，现在几乎所有大学校长都开始谈通识教育，不谈通识教育的校长就是比较差的校长，也是不懂教育或不抓教育的校长，这会让人看不起的。包括这次四校联盟的建立，都是四个校长大力支持的事情，这在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十年前香山会议谈通识教育的时候，大部分科学家也并不怎么关心，基本上是文科教授在提倡，但现在科学界的人参加的越来越多，李沉简、施一公……都对通识教育有相当深的认识，会把通识教育作为他们比较在乎的事情，而且他们明白困难在哪里。十年来，这个变化非常之大。另外，最重要的是，各个大学都有了一批教师，不仅仅认同，而且在实践。比如北大现在要组织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教师队伍已经比较成型。十年前，很多老师未必愿意教通识课——都愿意教专业课。我要着重强调一点，判断一个大学好坏的标准，就是看有多少著名教授在教通识。北大非常明显，最好最有名的老师往往愿意教通识课。复旦、清华，老师们也都非常投入，而稍微差一点的大学可能就没有。这也是十年来一个最大的变化，也就是师资开始成型。然后是学生方面，接受通识教育理念的已经比较普遍。所以，总体来说，十年下来，通识教育的理念已经广泛地被接受了，没有人再来谈有没有必要。现在倒反过来是另一个问题：某些地方性院校，通识教育目前未必最适合他们。这是比较实事求是说话，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的师资。传统的理工科大学，实际上也比较困难。但基本上，我还是比较乐观，当然还有非常非常长的路要走，至少还要一个十年，我希望你们到时候都是通识课的主力。下面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应该就是和专业课的平衡问题：专业课数量必须得砍下来。这方面李沉简做得很好，他砍课砍得很厉害，把专业必修课已经压到只有五门了，这很惊人。要把专业必修课压到只有最基本最核心的必须上的课，腾出时间来让学生有更宽广的发展。但同时，通识课本身一定得是有质量有要求的。

通讯：北大、清华、复旦、中大成立四校联盟无疑是中国大学通识教育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十年来的重要成果。这个联盟达成了什么样的共识，又有着怎样的目标呢？

甘：这四个学校，在通识教育方面都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相对来说在国内大学居于领先地位，而且四校通识教育在理念上都比较一致。成立这个联盟，我们希望给中国高校的通识教育有一个比较高的标准。现在每年通识教育的会议非常多，但有些往往都是空谈，会议水平很低，还在讨论最初级的问题，什么叫通识教育、为什么、有没有必要，等等，这等于把中国大学已经达到的较高的起点又拉到很低，很多人因为自己并没有真正教过货真价实的通识核心课，因此并不真正知道该怎么做，也不知道真正的困难在哪，因此就只是空谈。四校联盟希望给自己提出一个比较高的标准，同时也带动中国大学整体的通识教育水准。这四个学校基本上都是按照相近的标准、相近做法来做的。例如核心课程的建设，对课程都是有严格要求的：一个课程适合不适合开，不是仅仅报一个课名；每周进度是多少，阅读材料是什么，都要明确，然后尽可能的要有小班讨论。这些，四个学校已经不需要讨论，都已经非常明确而且实

践有年了。另一方面，四个学校之间我们也希望经常沟通交流，比如各自新开了什么样的课，可以相互有所促进。四校联盟实际达到的合作，我可以说超出了我的预期。四校联盟发起的通识教育年会将力戒空谈，最重要的是交流教学实践。通识教育很容易流于空谈，什么“文理贯通”、“全人教育”我很讨厌听这种泛泛的说法，我要问how,怎么做到，我要的是教课的人。目前看来，联盟得到了四校校长的全力支持，会进入非常实质的合作。大家都觉得互通有无非常重要，要互相支持，否则每个学校都觉得自己单打独斗，很吃力。四校联合起来，互相就会影响和帮助，也会刺激点竞争，你比我做的好，我就要更加努力了。这个四校联盟，可是说是十年民间和官方共同推动通识教育的结果。通识教育是以教授们为主的，但需要学校的官方支持，但事情如果变成单纯官方行政行为，未必做得好，归根结底是要教师、教授们自觉认同和投入才能真正做好。■

《莎士比亚与政治哲学》： 一次以经典细读和小班讨论为核心的通识课程试验

赵晓力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吴飞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莎士比亚与政治哲学》这门课尝试以经典阅读替代传统的概论与泛论，尝试以小班讨论加强教和学的衔接互动，改变通选课讲座化、泡沫化的趋势。本课程由清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基地聘请甘阳教授主讲。从2006年3月8日到4月26日，共上课8周，每次3小节，共24学时。选课学生限定50人。加上从北大、人大、中国政法大学、北师大等校来旁听的学生和教师，通常每次听课人数在100人左右。

本课主讲教师甘阳是研究西方政治哲学和西方思想史的著名专家，并对西方大学的同时教育理论和实践有深入研究，近年曾先后应邀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就大学通识教育问题发表演讲，致力于推动我国大学的通识教育。2005年6月18—20日，“中国文化论坛”以“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为主题在香山召开会议，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等20余所大学的学者就人文教育、通识教育进行了深入交流，甘阳先生是这次会议的执行主席。同时，甘阳先生近年一直在香港中文大学给本科生讲授古希腊历史和莎士比亚历史剧等课程，对于通识教育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莎士比亚与政治哲学》这门课不同于其他一些通选课的特点有两个：一是课堂讲授完全以文本细读为重点；二是在课程单元之间安排了小班导修。

一、经典细读

本课选取了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第二个四联剧，也就是《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上）、《亨利四世》（下）、《亨

利五世》，作为阅读的对象，“从政治哲学的角度阅读莎士比亚的英国政治剧，同时从莎士比亚的政治剧讨论英国政治传统与西方现代性的问题”（课程概要）。另外，还提供了若干阅读材料给选课的同学参考。甘阳先生上课以细致解读戏剧文本为主，其间穿插介绍学术界各家各派的解释。在第一次课上，甘阳先生就对紧扣文本上课做出了要求。文科3B的姚杏同学回忆道：“一开始，甘阳教授就有个规定，上他的课必须先读文本，上课的时候也必须携带着文本。没有文本，不读文本，你根本无法follow。所以说这个课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引领我们阅读，在阅读中体会莎士比亚的思想，在阅读中了解什么是政治哲学。”

对于这种解读的效果，英52的方晨同学说：“通过这门课程，我首先学会了深入阅读文本。说起来也许荒谬，寒窗十载，怎么不会读书呢？坦诚的说，我觉得在这样一个速食的年代里，对于选修课，能够全心全意地投入阅读，的确是需要同一种心态、一种氛围的。甘阳老师每节课的内容都紧紧贴近文本，也就是给课下的阅读一个方向，同时给了我一定压力。为了能跟上授课的进度，为了在三节课上得到最大的收获，我不由自主地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原文，阅读参考资料。”

据了解，大部分同学都能按照老师的要求，在上课之前通读一遍剧本，并在上课后或导修课后再读一遍甚至数遍。从课堂听讲反应和导修课讨论情况看，绝大部分同学都能很快熟悉文本，这一点比甘阳先生在香港教过的学生表现要好。当然熟悉的程度也有差别，大部分同学能很快熟悉人物、剧情。有些同学不满足于此，还按照上课时

只老师讲得很“简单”，但是却越来越让我觉得似乎莎士比亚的文字里面有无穷的东西可以挖掘，老师还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可以发挥得题目，我经常觉得这些题目有说不出的妙处，不仔细想是体会不到的，我常常感叹自己为什么就想不到如此精妙之处。

老师的提示深入考察剧本的结构、用典和用语等等。

直接阅读以领略经典的魅力，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只要引导得当，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自动化⁴⁶的苏俊杰同学描述了自己是如何进入经典的：“第一节课后布置了通读《理查二世》的作业，课后我大概花了将近半天的时间一口气把它看了下来，我觉得除了语言上有一些不同于我认识的其他一些文学作品，看起来比较吃力一点外，情节还算吸引人，然后也就没什么其他感觉了，这可以算得上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莎士比亚的作品。以后的课，甘阳老师会给我们分析文本，可能是考虑到有不少像我这样得工科学生来选修，老师讲得很‘简单’，但是却越来越让我觉得似乎莎士比亚的文字里面有无穷的东西可以挖掘，老师还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可以发挥得题目，我经常觉得这些题目有说不出的妙处，不仔细想是体会不到的，我常常感叹自己为什么就想不到如此精妙之处。原来所谓文学艺术并不是无聊的东西，而是人类智慧的凝结，有人说上帝花了双份的力气创造了莎士比亚’，这句话原来不假……”

这种紧贴文本的教授方法，对学文科的同学也是很好的训练。文科3A的刘月雯同学说：“虽然一直学习的是文科，但上课之前，我对莎士比亚并没有什么深刻的了解——只是稍稍知道他的一些作品——对于英国的政治哲学传统也缺乏整体上的了解。上了几次甘老师的课，最大的感受便是，原来文本也可以这样解读，历史剧也并不那么枯燥乏味。通过这门课，我的第一个收获便是真切地感受到了莎士比亚和经典文学的魅力。很惭愧，之前我甚至

没有完整的看过一部莎士比亚剧作，更不要说历史剧了。但在这个学期，循序渐进的阅读四联剧，再配合上老师的细致讲解和导读，到了最后，我几乎是要迫不及待地自己去翻开书本了。通过文本的阅读，我脑子里的‘好莱坞的莎士比亚’、‘专家的莎士比亚’变成了自己的莎士比亚。如果不亲自翻开书本，就永远不会知道经典是怎么回事。这一个学期回归文本的精读，帮我克服了对大部头的畏惧心理，发现了经典文献的恒久的魅力。”

一些同学通过这门课尝到读经典的甜头后，甚至对整个本科的人文教育提出了建议。法41的魏海涛同学说：“经典之研读，有甘老师的细致讲授，自然事半功倍，但是就算没有甘老师讲授，我们与别的老师一起研读经典，当然也比浮光掠影、只懂皮毛要好些，至少我们自己读过，思考过啊。经典研读是可以建构出来的，需要制度之支持，我斗胆提出建议，先从文科院系出发，开设专门的读书课，每学期研读一两本经典，收获不可谓不大。如果学生反映良好，亦可尝试将这种做法推广到全校本科生当中去。我们是年轻人，我们懂得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虚无，什么是意义，我们是渴求真理与知识的，我们也有意见要表达，读书课会为我们提供这样的机会，甘阳老师开设的这门课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这种机会。”这位同学还“特别希望有人能够讲解中国的经典”。

二、小班讨论

虽然小班讨论早已是国外大学通识教育的标准要求，但在我们现在的通选课中并不多见。《莎士比亚与政治哲学》为了保证小班讨论，限定了选课人数，并把选课同学分为两个班，每班不超过25人。导修课由甘阳先生的两位助教——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博士和清华大学法学院赵晓力副教授——主持。助教老师也和同学一样全程听课。

导修课不宜由主讲老师直接主持，因为这样学生很难讲出与老师不一样的观点。之所以请这两位老师担任助教，是因为吴飞曾在哈佛读博士期间就做过助教，赵晓力在哈佛访问时观察过那里的导修课。助教的责任并不复杂，普通博士生、研究生稍经培训也完全可以胜任。实际上，甘阳先生在香港开课时的助教都是来自大陆的研究生。

导修课的安排是这样的：在每部剧本讲完之后都会有一次导修；每次导修有不超过5位同学事先提出自己的发言提纲，发在“网络学堂”上，当导修课的时候，先由这些同学发言，其他人围绕他或她的发言进行讨论。助教老师主持并参加讨论，也适当做些点评。两个班的导修都结束后，

两位助教会与甘阳先生碰头一次，把导修课上发现的问题反馈给主讲老师。

导修课强化了教学环节中“学”的环节。水利水电工程系05级的戴必晶同学说：“我更想说的是这门课的授课形式不仅是非常新颖的，更是非常有效率和效果的。入学一年来所经历的选修课上课程序一般就是全周讲课，平时也没有什么强制性作业，大都只要求期末提交一篇论文。这其实是给了选课的同学很大的偷懒空间。上课的时候可以做其他任何作业，甚至有很多人不到期中期末根本就不去听课，到截止日期临近时才拼凑一篇论文交上去，其质量可想而知。一个学期下来感觉也没学到什么东西，没记住什么，说难听点就是去混个学分。而这门课就不是那么好说话了。就以要求我们必须阅读相关文本来讲，就是我所选择的其他选修课所没有的（大多只推荐参考书），而亲自去熟悉文本恰恰是学到知识的前提。在这门课上我第一次接触到导修课制度，深刻体会到这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集体学习方法。以小班的规模，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言，从而‘逼迫’大家不得不用心去寻找最适合的切入点，去周密地布置报告提纲，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思考能力的质的飞跃。除了要精心准备自己的报告，在导修课堂上我们还可以听到其他同学的见解，共同讨论，虽然见仁见智，得到的答案也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分享了彼此的智慧。刚开课的时候，这门课‘苛刻’的要求也让我犹豫过，但事实证明，我坚持下来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自己发现问题、独立思考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锻炼。”

从同学们的反应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课程单元之间设置导修课的做法打破了讲座式教学中“因为讲得随便，所以听得随便，因为听得随便，所以讲得更随便”的恶性循环，通过有引导的互相讨论甚至互相辩驳，不但复习了讲课内容，而且激发了同学进一步探讨的兴趣。生医5的张红伟同学说：“听完一节课之后我便感到我选这门课实在是明智之举，因为不只是上课时甘阳老师用自己独特的方法分析剧作，更重要的是增加了每隔一周的导修课，在课上同学们可以畅所欲言，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供大家鉴赏，将自己在阅读各种材料或在听甘阳老师讲课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完全在老师面前表达出来，大家讨论的过程就相当于又一遍的深入学习过程，不但可以使同学自己发言，锻炼自己的能力，更能使听发言的同学通过作评论来发表自己的意见，更重要的是，这种建议可以在老师面前提出，使同学们可以通过老师的监督或纠正找到最佳答案。”

当然，导修课并不是没有问题。首先，超过20人的小班仍然是太大了；如果每次都是五六个人发言，原定2个小时的导修肯定要大大超过时间，前一两次导修课两个班都出现了拖堂1个小时的现象，引起一些同学的抗议，

后来不得不限制同学们发言的时间。经过试验我们才知道，美国大学小班讨论一般不超过15人是有道理的，超过这个人数肯定会影响讨论的效率。法22的余婷同学说：“唯一不足的是，讨论课还是讨论得不够充分。一方面每次作报告的人太多，每个问题讨论的时间比较短；另一方面，还有一部分同学没有很主动地参与到讨论课中来。我想，导修课的组织形式还有可以改进之处：导修班的人数在15人左右为宜，控制作报告的时间，并想办法提高学生的参与性。”

导修课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学生课业负担繁重，无法化太多时间和精力投入。4次导修课等于在32个学时之外，又增添了8个小时，如果加上分班后和助教见面那一次，是10个小时，再算上拖堂的原因，大概每个班都超过了12个小时。最后一次导修课刚好遇到许多同学参加英语四级考试和专业课的期中考试，被迫推迟到五一之后进行。这些都表明，导修课好是好，但客观上加重了学生的负担。人文5班的程方毅同学认为，由于其他课业繁重，同学们很难在导修课上化很多时间，他说：“不管甘老师在课上如何夸学生水平高，但我认为讨论课是失败的，首先由于课堂的精彩，同学的注意力都只在课堂上，而只花很少的时间在讨论课上，同时由于别的课程作业的繁重，使我们很少有时间来对这门课花应有的时间。”

不过，课业繁重并不是本门课可以解决的。根据非正式的口头询问，很多学生一学期选课都在10门左右，但其中至少一半是应付的。倘若我们不挤掉课程设置中的水分，按照“少而精”而不是“多而滥”的原则设置课程，则小班讨论、建立教与学之间的良性循环很难普遍推广。

这门课最后共有9人退课，其中3人第一次上课时就没有来，4人在第一次导修课前退课，1人在第2次导修后退课，1人在第3次导修后退课。除了第一次上课就没有来的3人无法了解退课原因外，其他人的退课原因都是课太多、毕业找工作或者学生工作太忙。一些坚持下来的同学也曾经因为课程压力犹豫过要不要退课。比如水工51的许光卓就曾经犹豫过：“记得第一堂课甘阳老师在前面讲了一些课程介绍和考核方式，这让我们所有人都很吃惊。因为大家本以为这门课应该同其他的全校性选修课一样可以轻松通过，但这门课却与众不同。甘阳老师特别提倡课上发言，并且要求我们参加导修讨论课。起初我也有退掉这门课的想法，但是后来我觉得以前的课虽然很容易通过，但自己却没有真正学到过什么，我相信只要能坚持下去，一定会有收获。现在，这门课程结束了，我也很庆幸自己当初没有轻易退课，通过这8周的学习，我觉得自己受益匪浅。”

虽然压力很大，绝大部分选课同学还是坚持了下来，

设置导修课的做法打破了“因为讲得随便，所以听得随便，因为听得随便，所以讲得更随便”的恶性循环，通过有引导的互相讨论甚至互相辩驳，不但复习了讲课内容，而且激发了同学进一步探讨的兴趣。

法³¹的王捷同学说：“说实话在清华从未上过一门负担如此重的选修课，不过，这只能说明我们以前的情况不正常，而不能说这门课离经叛道。大量的对文本的阅读，加上老师上课的重点讲解，加上小班的师生互动讨论，应该说效果是非常好的。从我自己和我周围同学的情况来看，都认为这门课是很实在的，虽然讲述的东西比较玄，但在内容上却一点都不‘玄’。同学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压力。”

总之，经过《莎士比亚与政治哲学》这门课的试验，老师和同学们一道探索了一条如何通过经典细读和小班讨论推进大学通识教育的“新路”——实际上，这条路在美国的大学里并不新，是人家通识教育的常态。这一点，甘阳先生2005年6月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实际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通识教育并不是专业课之外可有可无、用来混学分的“甜点”，而应该是大学一二年级学习的“主菜”。我们的试验表明，通识教育里必不可少的“人文”这一块，通过经典阅读和小班讨论来重新构造课程，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要推广，则要逐步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最终按照“少而精”而非“多而滥”的原则设置课程。如果一时做不到，则可以在现有16周的课程安排中，挤出4周左右的时间安排小班讨论。而目前的很多概论、泛论、导论课，则应改造为经典细读课。

这次课还有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但作为课程的参与者，看到学生有这样的感受还是感到欣慰，因为这正是大学人文教育要达到的目的。一位理工科同学说：“9周的课下来，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懂得了如何去欣赏，我开始愿意在某个休息日的时候走进图书馆翻开一本莎士比亚的作品，然后很享受地靠在椅子上来读。我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一种提高，也是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必要素质，w如果真的要学习心得的话，我想也就在于此了，我想这一定也是老师所喜闻乐见的。”一位“热门专业”的同学说：“每周三晚上，那三个小时对于我来说都是一段幸福的时光，因为很难得能够排除一切干扰，虔诚地学习知识。现在的物质世界充满了诱惑，越来越多地渗入到大学校园，这四年的黄金时光很难说不会变成一个追逐物欲的跳板。可是，每当到了星期三，一切都变得那么奇怪。第5节下课后我会不顾吃晚饭就冲过来，占一个座位，因为听课的人很多，尽管选课人数只有50人，但是100人容量的教室会坐满。那股不顾一切的劲儿，真让人感到有点莫名其妙。在那个课堂中，我忘掉了所有的物质幻象。由此，我又体会到，在美国这样一个比我们物质化程度高得多的社会里，大学生能够一门心思读书，背后会是什么莫名其妙的劲儿呢！？而这股劲儿定然不会是物质的力量！”■

来源：《国外文学》2006年第4期

“中华文明通论”导言： 中国之为中国

丁耘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本课程的名称叫做“中华文明通论”。这是一门什么样的课程？为何要给大学生讲授这门课程？这门课程如何讲法？课程第一讲的任务就是回答这些问题。扼要地说，第一讲要解释“中华文明通论”这个名称，什么是“中国”和“中华”，什么是“文明”，以及，怎么一个“通论”法。

一、什么是中国？如何研究、了解中国？

（一）所谓“中华”，是合“中国”与“华夏”而言的。这里先解说“中国”，再解说“华夏”。

“中国”这个词出现得非常之早，它的内涵和外延都有其历史变化历程。但这种变化并非没有规律，也不是没有任何连续、持久和恒常的东西。

“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的铭文。全文122字，记载了周成王营建洛邑王城（“宅兹中国”）的历史事件。征服商之后，周出陕西，开始将统治权延伸到河南，营造新的都城。周以洛邑为大地中心（文献上称为“地中”、“土中”或“中土”），称其为中国。

这里提到的“中国”首先当然是地理概念，但又不等于普通的地理名称（如洛邑或阳城）。把洛邑称为中国，其背后是“中国”命名者的中心意识。有中心就有围绕中心的整体空间秩序。这种秩序不单是地理性的，更是政治或者文明上的。“国”是王都，是政治或文明中心。有“中国”，不仅是有一块地方，更重要的，是有了统辖这块地方的政权，和作为这个政权基础的文明秩序。称“中国”和单纯从地理出发称“中原”是不同的。

因此，“中国”这个词在地理涵义之外的更重要方面，是指大地之上文明空间秩序（天下秩序）的原点。此后的“中国”概念都有这样几层含义，一层是地理上的实义，指某个区域。第二层是政治涵义，指统辖这个区域的政权，第三层是精神含义，指这个区域的中心地位及其所属的整个文明空间秩序。

“中国”有时也混同于“中国人”。这可算衍生出的第四层的涵义。但“中国人”又是根据“中国”的诸多涵义来确定的。按照起源区域界定的，是“种族”意义上的中国人。按照政权和文明，则是政治身份和文化身份意义上的中国人。

“中国”这个词的第一、二层涵义，也就是区域及其政权，属于“中国”一词的外延。第三层是“中国”一词的内涵。外延的变化很明显，而内涵虽有变化，却相对稳定。外延上的“中国”只是天下的一部分，在地理上可以是中心地带，也可以

无论“中国”或“中华”，都具有区域、政权、种族、文明秩序四方面的涵义。在这四方面当中任何一个残缺，都可算有某种“亡国”之虞。

不是。但内涵上的“中国”只能是天下秩序的出发点了。

除出土文物外，最早的传世文献（如“诗”、“书”，也就是《诗经》和《尚书》）里也出现了“中国”这个词。《尚书·梓材》的年代和“何尊”接近，都属于西周早期。《诗经·大雅》中也有不止一首诗歌吟诵“中国”，但已属西周晚期。例如：

“惠此中国，以绥（sui，阳平）四方”（国家搞好京师富，安抚诸侯不费力）、“惠此中国，以为民逯（qiu，阳平）”（国家搞好京师富，人民才能心满意）、“惠此中国，俾民忧泄”（国家搞好京师富，使民消忧除怨气）。（《大雅·民劳》）

“哀恫（tong，去声）中国，具赘（zhui，去声）卒荒，靡有旅力，以念苍穹”（哀痛我们全中国，绵延田地一片荒。大家没有尽力干，怎能感动那上苍）。（《大雅·桑柔》）。

此时的“中国”，其实义仍指西周晚期的京师，但已处于不同的格局之中。甲骨文中提及的“四方”都是相对商而言的，而这里诗篇中的“四方”当然是以周的王都（“中国”）为中心确定的，其含义已是西周分封制下的诸侯国。这里的关系已超越了单纯的方位含义。此时“中国”和“四方”处在一种不可分割的政治与文化纽带之中，所以惠爱“中国”，是为了绥安“四方”，更是为了“民”的福祉。那么可以确定，在西周晚期，“中国”一词意味着，周王的京师、诸侯的“四方”和“民”一起构成了一个更广大、更紧密的政治共同体及其秩序。

除了“何尊”之外，还有一件著名的出土文物与“中国”有关，即西汉锦护臂（1995年出土于新疆和田地区尼雅遗址）上所绣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古代占星术用语，意为五颗行星同时出现于东方天空，利于中国的军国大事）。在传世文献中，《史记·天官书》也有类似记载。这里的“中国”指汉王朝的政权及其统辖的中心地带，其主导与经略的疆域范围则明显超越了西周时期。

在传世文献中，“中国”一词还有更为丰富的涵义。在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公羊氏为《春秋》经所作的权威解释，是《春秋》经传世的三种权威解释之一）的著名范例中，“中国”所指的对象是可以变化的。例如中国和夷狄本来的界限是清楚的，《公羊传》里常有“不与夷狄主中国”、“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不赞成夷狄主宰、操控中国）。但东汉经学家何休解释说：“中国者，礼义之国也。”这就倾向于不仅从地理出发，而且从文明秩序出发界定中国。

对中国的地理界定与文明界定在正常情况下是一致的，但在春秋以及一般的乱世，两种界定可以错位。例如，晋国是中原诸侯国，本属于典型的“中国”政权。楚、吴则是周王朝统治圈之外的“夷狄”。但随着三个国家各自表现的优劣，《春秋》逐渐将楚、吴提拔为“中国”，将晋贬斥为“夷狄”。《春秋公羊传》针对那些表现得不符合周礼的

中原诸侯国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亦新夷狄也”。后人据此总结道，“《春秋》之义，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为夷狄，则夷狄之。”¹（《春秋》大义，夷狄进步达到中国的文明标准，就把他看作中国人。中国人照夷狄的方式生活，就把他看作夷狄）。不难看出，这里的“中国”既有种族、区域及其政权的涵义，更有文明秩序的涵义。中国人身份的界定可以依据种族，更应当依据文明秩序。

“中华”一词的源流变化，和中国词义这种变化是相通的。“中华”一词合“中国”、“华夏”而言。无论“华”、“夏”两个字，还是“华夏”这个词，原都是指区域和种族，但最后也衍变为文明涵义：“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左传》孔颖达疏）

综上所述，无论“中国”或“中华”，都具有区域、政权、种族、文明秩序四方面的涵义。其中，文明秩序更基本些，因为种族依靠起源地（区域）命名，区域的定位源于自觉的文明体对空间的中心、亲近、疏远的划分方式（例如中央、腹地、边疆）。区域不能无政权，区域政权的合法性，在古代也依赖于是否符合文明秩序。

不过，一个完整的中国，应该同时兼具这四个方面的涵义，不能只看种族，也不能只看文明秩序。这四方面当中任何一个残缺，都可算有某种“亡国”之虞。作为中国人，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问题仅仅在于这四者之间的权重关系。这种权重关系会随着具体的历史情境有所不同。

（二）无论“中国”或“中华”的哪一方面涵义，都是在历史中不断变迁的。

拿区域来说，有的地方，在一定历史时期不属于当时的中国，但属于当代中国。有的地方正相反，在一定历史时期属于当时的中国，但现在属于外国²。

拿政权来说，“中国”这个地方，在很多历史时期，有时被当时的“夷狄”统治，有时也出现了两个以上的政权（分裂）。而政权兴替在历史中也是经常发生的。

拿种族来说，北方游牧民族在历史上多次大规模南下，使得中国人和周秦汉晋时期相比，其基因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拿文明秩序来说，殷周之间、周秦之间、唐宋之间都有大的变动，更不必说晚清所谓“三千年以来之大变局”了。

既然“中国”所有方面的涵义都在历史中发生了变迁，那么从整体上（而不仅仅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谈论“中国”是不是有意义呢？这个所谓整体无非就是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恒常持久的东西呢？这些问题，涉

¹ 参见杨树达，《春秋大义述》。

² 见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

这课程的研究方法，是基于体
会的观察，是基于同情的理解，
即是科学研究、知识介绍、更
是追根溯源、认祖归宗。

及到研究中国的方法。今天，中外历史学科中的不少学派正致力于瓦解一切稳固持久的存在。因而，确实有必要谈一谈，本课程用什么方法来研究和谈论中国。

可以先考虑下一般意义上的运动和过程。世界上的一切运动都是有前提和基础的。谈论变化，总有个主语。变化不是泛泛的，都是某种东西的变化。这个主语就是变化的基础或者主体，是变化的逻辑条件。变化只是这个基础上发生的东西。基础没有了，变化也就没有了。其次，运动总是连续的，因为时间本身是连续的。再次，正如衡量时间的基准是现代一样，衡量历史运动的基准是经过合适界定的当前时期³。最后，运动和变化是有规律可寻的。人类所有的科学追求，出发点无非是探索自然运动和历史运动的规律。人类有科学，就说明人类认定了变化是有规律的。至于所发现的规律是否要改动，是否符合实际的真规律，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这门课程研究的不是泛泛而论的什么运动变化。而是这门课程自身必然归属的历史运动。没有活生生的、延续至今并仍在发挥作用的中国历史，就不会有这门课。这门课程的参与者（无论是编写、讲授还是听讲者）都不是外在于中国历史的。这门课程对中国历史的研究立足点，不同于人类对自然现象的研究，也不同于外国人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这课程的研究方法，是基于体会的观察，是基于同情的理解，既是科学研究、知识介绍，更是追根溯源、认祖归宗。这门课程的建设本身就属于这门课程的对象：中华文明。这门课程归根结底是中华文明的自我表述。

本课程就在上述思路的指导下研究中国历史。中国的

历史不会取中国的同一性与连续性，正如个人自我介绍的简历不会取消个人的同一性，无缘无故地变成另一个人的简历一样。另一方面，“中国”这个词语的内容，首先也就是中国的历史。正如介绍自己或别人的恰当方法，无非是说简历或至少其中的某些信息。无论什么样的介绍，都是在同样的关系参数下（例如出生时间、地点、家庭关系、母语等等）介绍不同的内容或信息。介绍也不可能事无巨细，总是有所取舍。最终，对一个人比较深入的了解，仅仅掌握那些信息是不够的。一个懂得观察别人的人，总要在实际生活中有所接触，再结合那些历史信息，掌握此人的品格、脾气、习惯，判断这个人在未来会有什么发展，是否可靠，是否值得交往、信赖。

对中国这样的大事物，了解的方式和了解一个人也有相似之处。无非在同样的关系参数下（例如和自然界的关系、政治社会状况、生产方式、认知方式等等）寻找信息或数据。越是庞大的事物，其材料越要有所取舍，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最终，对中国的真正理性的判断，要通过我们在中国当下的实际生活，结合那些历史材料，上升到精神、气质、品格这些相对稳定的层面，才算比较完整。追溯的立足点和基准应该是现代中国所处的那个历史长时段⁴。

不过，一个宏大、漫长的历史存在，与个人最大的不同，是频繁的变化、复杂的差异和多层面的交织关系。但再复杂的东西也有规律可循。总的来说，中国的四方面涵义，在历史中的变化可如此概括：

在历史上，中国区域变化的总趋势是，以中心地带为核心向周边拓大。过程中当然有起伏，边疆或时有出入，但总的情况是拓大，达到前工业时代力所能及的自然边界为止。这些由大洋、大漠、寒带、热带与世界屋脊构成的边界，基本也就是交通、生产和生活能力的边界。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的中国，早就逾越了作为农耕人口边界的胡焕庸线（参见本课程第十讲的有关内容）。总的来说，中国疆域的拓大止于当前界限的诸多原因中，自然地理因素比政治/文化因素更多些。

在种族方面，历史变化的大趋势是融合。儒家道统谱系上的几位圣人：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公、孔子，并非出于同一部族。秦人、楚人、吴人彼此属于不同的族群，在西周也都不能数民族的血液。有的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已完全融入了汉族之中。“汉族”这个名称自有其起源与沿革（参见本教程第十讲）。而当前的汉族，本身就是历史上多民族融合的结果。要把历史中既有分别、又有融合的族群概念和当前产生于民族学识别、界限相对稳定的民族概念区分开来。历史上中国族群的总趋势，是彼此融合。无论当

³ 参见谭其骧，同上。

⁴ 参见谭其骧，同上。

代的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不可能保持起源上的单纯性，而是历史上不同的中国族群多次融合的结果。但这种融合的产物，与前人是有连续性的，分子人类学的遗传基因研究可以证明这一点。⁵融合不意味着基因消失，而恰恰是不同起源的基因在彼此结合中的扩大。

历史上，中国政权方面的改变无非是两种方式：合法的和平转交（例如尧舜禅让、清帝逊位），合理的暴力更替，包括“革命”（例如商汤和周武王的武力征伐获取政权）和统一战争。无论哪种方式，在中华文明的自我理解中，其背后都是同一个“天命”，而天命又同民心民意密不可分。政权腐朽（失去了“德”），所以天命的眷顾转移了，但天命本身并没有变化。不同王朝的政权背后是同一个天命。政权改易不等于天道改易。政权能够改易，正因为天道没有改易。几乎历代王朝都要为前朝修史，这些史书构成了一部关于天命的连续历史。修史、读史的目的就是了解、敬畏天命，警惕失德导致天命改易。因此，政权中国的兴替背后，揭示了一个连续的、天命意义上的中国。

“天命”是一种“观念”，用肉眼是观察不到的，只能用头脑构想，看起来不是“实在”的东西。但它恰恰在实在的历史中实实在在地起着作用。了解天命是非常困难的。以孔夫子的智慧、学识和勤奋，也要到五十岁才“知天命”。除了读经史外，古人有个方便的办法去猜测天命对政权的态度，就是看民心所向。伪古文《尚书》的《泰誓》篇说，“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而另外一部极为重要的儒家经典——《易经》，在一个权威解释（《系辞传》）中说过，关于“天道”，百姓是“日用而不知”的。把两条材料综合起来，可以比较全面地看到古人的意见：人民是依据天道生活、依据天道判断政权优劣的，但人民往往并不自觉到这一点。这就需要读书学道的“君子”，既要从人民的生活和心意中去观察天道，又要超越人民的自发性，把在人民那里观察到的天道，和圣人留下的经典相互印证，给出一个比较准确的理解。

“天道”云云，总让人觉得难以捉摸。那么，用比较通俗些的语言说，天道究竟是什么呢？在古人那里，天道就属于我们上面提到的“文明”。古人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是说无论在什么历史时期，什么具体制度下，中国之道、中华文明的基本内容（有的人把这个叫“道统”）都和自然规律一样，在历史中恒久不变的。

这样，在“中国”各个方面的历史涵义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中华文明以及代表此文明的中国人民。研究、了解中国，就是研究、了解中华文明、中国人民。研究和了解的立足点和基准，是现代中国。

⁵ 见姚大力，《谁来决定我们是谁》。

二、什么是文明？如何研究和理解文明？

说天道就是文明，也许会引起困惑。这种困惑源自“文明”一词在中文里有两个语境，因此基本涵义有两重性。第一个语境是中国古典，理解“文明”一词就应该从中文的内脉出发。另一语境是西方学术思想传统。在后一个语境中，“文明”一词是对 civilization 的翻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的城邦政制（politeia/civitas）。

与统领广袤国土、但实行君主专制的东方（例如波斯）相比，古希腊人及罗马人认为他们的城邦生活就是“文明”，前者就是“野蛮”。在古希腊罗马人那里，“文明”意味着以城邦共同体为核心的整体生活之道及其各方面内容（可以参考“世界文明通论”课程的有关章节）。

在古希腊罗马人的自我理解中，城邦制度可以追溯到神为他们制定的法律、习俗和规范。因此，“文明”的根基是神话，文明的创立源于神的意志和权威。神同时也创造和管理着自然。神并不是依照自然为人类制定法律的。城邦和自然是并列的关系，城邦和大地上的其他部族是敌友关系、“文明”与“野蛮”的关系。

现代科学和哲学兴起之后，除了少数学派，现代西学不再持神话立场和希腊罗马中心主义立场。而是从人的角度（无论是理性能力、风俗习惯还是生产方式）解释文明，并且把人类所有族群的生活方式都称为“文明”。只不过传承西方文明的学问是古典学，研究其他大文明的学问是历史学或语文学的分支（印度学、汉学等等），研究部落小文明的学问是人类学。西方学者通常把“文明”从精神方面特别是宗教加以划分，确定类型和种类。历史学家最少也能在人类历史中找到二十几个大的文明体系。受马克思主义方法影响的学者也倾向于用主导的生产方式，将文明在历史时间中区分为不同的阶段（例如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等）。

在中文语境中，“文明”一词的典故和权威解释都来自儒家传统：

《易经》里不止一处提到“文明”（或者“文”、“明”两字之一）。第一次出现是《易经·乾卦》之《文言》：“见（xian，去声，就是“现”）龙在田，天下文明”（龙出现在大地上，是天下文明的时候。藏起来是气，显现出来就是光。阴晦阳明，九二阳光显现，有天下文明之象）。另一处是《尚书·舜典》：“浚（jun，去声，深沉意）哲文明，温恭允塞（深邃的智慧临照四方，谦恭的美德溢满天地）。唐代大经学家孔颖达对前者的解释是：“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在田指在地上），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对后者的解释是“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

另外比较重要的一条，出自《易经》贲（bi，去声）

卦的《象》(tuán, 去声) 6: “刚柔交错, 天文也; 文明以止, 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刚与柔, 质与文相互补充, 质文相当, 是自有之理; 文明要有节制和限度, 而这个节制和限度要靠人来把握。观天象和卦象, 以便发现是否有过刚过柔, 过文过质的时候, 观察文明的节制和限度, 以教化天下, 成天下之礼仪制度。)

把这三条综合起来, 可以发现中文古典中“文明”的基本涵义。“文”这个字包括了整个天地以及其间的万物的规律理则(“经天纬地”、“天文”、“始生万物”)。万物当然包括人, 所以“文”这个字又特别包含了关于人的法则(“人文”)。人文不单单是关乎一国一族的, 而是周全普遍的、关乎天下; 照临“四方”的。

“天下”并不等于“四方”。上引《诗经·大雅》的诗篇已经提示, “四方”是对“中国”这个主体而言的。“天下”就是拥有“四方”的中国主体之大地秩序。“明”无非是照亮的能力, 能够象太阳那样“照临”四方的“人文”就是“文明”。照亮(用今天的话说, “启蒙”)就是“教化”。按照孔颖达的解释, “启蒙”无非就是按照《诗》、《书》、《礼》、《乐》这些儒家传承下来的中华文明的原典教化人, 观察时变、取法天道来教育人。他的原话是“用此文明之道, 截止于人, 是人之文德之教”。“文明以止”的主旨, 当然是说用文明教化让人有所依止、“止于至善”。教化当然不是用武力, 因此其特殊的方面是说“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⁷。则“文明”涵义则是于和平而非威武的观念的概念。

总起来看: 上述三条材料里包含的中文古典中的“文明”观有如下特征:

- 1) 天地性或宇宙性(这就是上文说的, “天道”之意包含在“文明”之内);
- 2) 天下性或普世性;
- 3) 中国的主体性;
- 4) 教化性;
- 5) 文教的和平性。

可以再以此对照一下西方语境中的 civilization 的特征。

- 1) civilization 首先和自然有界限。城邦生活基于神话, 不基于天道;
- 2) 城邦只是狭小的军事政治宗教组织;
- 3) 城邦以自己为中心;
- 4) 对外邦无非敌友关系。或政治军事结盟、或殖民、或侵略、或对峙。敌友关系可以通过征服发展为帝国与行

省之统治关系;

- 5) 对野蛮人天然可以征服和奴役;

可以看到, “中国主体性”与“城邦以自己为中心”是有表面接近的。任何自我表达的部族都是从自己开始的。但自己和别人的关系则可以有很大不同。拿上面的例子来说, “照临四方”和征服四方的不同是非常明显的。

(二) 既然中文“文明”与西语 civilization 有如此不同, 用“文明”一词统称两者, 合适吗? 又如何研究有双重脉络的“文明”呢? 应该说, 重要的学术思想术语有中西两重脉络或者中西印三重脉络, 是现代中文学术既定的基本处境。我们不可能摆脱这个处境, 只能对这个处境始终保持清醒的意识。中华文明和西语 civilization 即使涵义不全相同, 至少是对应的。即它们都对是人类全部生活之道自觉、完整和最高的表述。它们的差异和相通, 以及当代中国年轻人如何在这些同异之间运用真正的理智能力和生命力量来选择高尚、恰当的生活道路, 正是我们讲授这门课程及其相关课程的目的。而要了解中外文明的差异和相通, 就得从它们各自的基本内容开始了解。那么, 如何选择这些基本内容呢?

从概念涵义的比较可以看到, 西方文明的出发点是城邦政治。政治当然需要在伦理和法律方面的教化, 以求传承文明体内为人处世的基本规矩法度。而中华文明的到达点是“照临四方”和“化成天下”。换言之是普世的教化。但教化也需要有政治, 包括对应于希腊城邦政治那样的一国政治(参见第二讲所谓“方国”)。但一国政治只是中国人特别是儒家所谓“政治”中的关键一环, 既非教化的开端, 亦非教化的终点。儒家始终是以高于一国政治的目标(天下), 和低于一国的起点(修身齐家)来展开其政教之道的。和一切教育一样, 儒家的教育内容无非也是为人处世的原则。只是开端、次第、动力和最终的目的地不同(详见课程第八讲)。更重要的是, 中华文明涉及的范围虽极其广大, 但始终是一个原则(道)贯彻本末。这一点, 儒家看得最清楚: 从身心、家、国、天下直到宇宙, 就是那么一个活生生的道理, 彻上彻下。之所以说, “经天纬地”的“文”也能用来“照临四方”、教化天下, 那是因为“天文”、“天道”和家国天下的政教之道——“人文”本来就是一个道。所谓天不变, 道亦不变”,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 道并不是具体形态, 而是形态背后的东西。说道不变, 隐含的意思是: “形态”总是要变的。所谓历史, 无非就是文明形态的变化。能观察到的只是形态, 道则看不到, 是所谓“形而上”的。从今天的角度来看, “文明”有两层意思, 一层是形态, 一层是形态背后的道。上述中西古典中的“文明”涵义, 所说的都是形态背后的道、原则。而历史学研究的某个时期的“文明”, 例如“商代文明”、“唐代

6 《文言》和《象》都属于流传下来的《易经》权威解释(“易传”)。《文言》是对乾、坤两卦的解释。《象》分别解释了六十四卦的卦辞。

7 《易经·贲·象》, 孔颖达疏。

“中华文明通论”必定表现为“中华文明史”，而“中华文明史”的真实寓意，则是“中华文明通论”。“文明通论”与“文明史”的关系。无非就是“常”与“变”、“道”与“形”的关系。

文明”，属于文明的形态。研究的某个“文明体”的“文明”，例如古希腊文明、基督教文明、印度文明，则需要研究此“文明”的“精神”、“原则”、“道”。

本课程研究和讲授“中华文明”，归根结底，研究和讲授的是文明中不变的原则，是“文明”之道。但道不可见，不能直指，只能通过“形态”来了解。而具体“形态”必定是在历史中的、有历史性的。所以，讲授“中华文明”之道，必定要通过“中华文明史”。这门课的材料都是史学材料，但这门课的意图则不在于材料，而是通过解读材料中呈现的历史形态，了解形态后面的“道”。换句话说，“中华文明通论”必定表现为“中华文明史”，而“中华文明史”的真实寓意，则是“中华文明通论”。“文明通论”与“文明史”的关系，无非就是“常”与“变”、“道”与“形”的关系。

综上所述，本课所讲授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文明具体历史形态背后的原则、原理、“道”。历史形态是常变常新的，形态背后的道是亘古不变的。个人与民族都有安身立命问题，只有在道中，才能安、才能立。此课程的最终目的，不是讲授关于历史形态的历史知识，而是传承作为道的中华文明，让国人和民族都安于此道，乐于此道，明此道于天下。

(三) 在奠基于马克思主义原理之上的唯物史观看来，文明当然不仅仅关乎身心国家的政教方式，而应该是生产方式、认知方式与政教秩序-身心秩序的统一。用通俗的话说，也就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这样对文明的界定当然是完整的。换言之，文明可以界定为生产方式、认知方式与政教方式三者相互作用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物质生产、物质交往的方式（特别是生产关系的全部内容）是作为基础起作用的。唯物史观有其深刻之处，生产方式对文明的奠基性作用是无可否认的。本课程仍然是以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视野为指导的。

本课程力图将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基本洞见内在化、中国化。换言之，本课程并非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研究和解剖文明，而是站在文明自我认识的角度让年轻人参与进来。这门课程的总任务是通过了解中国、研究中国来学习如何

做中国人。精神传承是此课程的目的。这样就不得不有所偏重，即只讲授中华历史上的政教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认知方式。文明之道在政教及认知方式那里看得最清楚。举个例子，中国雇农和印度雇农在耕作和土地所有制状况方面没有本质差别。但中国人和印度人则有本质差别。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差别归根结底不在物质生产上，而在政教/认知方式，在生命对身心和外界的态度上。本课程只讲授中国人作为中国人的那个方面，不讲授中国农民作为农民的那个方面。讲授生产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认知方式，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经济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各专业课程的主要内容。本课程作为人文教育，目的是培养传承中华文明精神的中国人。作为中国人，首先要了解的是中华文明。作为科学技术人员以及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了解的东西，不属本课的讲授范围。

三、中华文明的整体特征与历史分期

这门课程是通过学习历史来解中华文明之道，那么先概括一下中华文明在整体上几个最明显的特征，再介绍一下中华文明的历史可以划分哪几个大的历史时期，中华文明经历过哪几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整部教程如何按此划分结构，应该是有所助益的。

(一) 在列举此这些特征之前，有必要先做几点说明。第一，所谓中华文明的“特征”，是在其整体历史的基础上表现出来的总特征，其中有的特征在各时代的中华文明形态中同样具有，有的则属于部分不具有，所有部分之整体才具有的特征。其次，这些特征是纵观历史概括出来的最显著、最重要的特点。一些比较次要的东西，留给史学研究的具体部类去叙述，这里只讲最重大的。第三，所谓特征，当然是指唯有这个文明体系才具备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文明所具备的属性是普遍的，中华文明是特殊的。任何文明都是个别的，它表现出来的性质也都是特殊的，普遍只是众多特殊之间共通的东西。第四，认识到特征并不是孤立封闭视野的产物，恰恰相反，能够把某些属性作为特征概括出来，正因为视野里有其它的大文明体做参照。

在综合、比照的基础上概括，中华文明有如下几个重大特点，必须全面了解和认真对待：

首先，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拥有连续的大一统政权的文明。这个特征包含了三个方面，大一统政权、大一统政权之间的连续性以及作为政权连续性基础的文明的连续性。这三个方面不是偶然凑到一起的，其关键方面正在于中华文明及其连续性。

有确切考古学证据的最早王朝是商代，这之前的历史属于文献中的传说时代。无论传说时代，还是有考古证据的“青铜时代”，都是有“大一统”政权的。虽然不同时代的“一统”方式不同、程度不同，但有一个万国拥戴的、掌握乃至垄断着权力正当性来源（天意）的“中央”政权，这一点是没有差别的。正因为处于政权的统一性之下，中国这个地方的各部分才能处于同一个格局、同一个秩序之中。这和欧洲的城邦列国格局完全不同。有学者称之为“中国规模的”秩序、“普遍王权”等等，无非说明大地方带来了大格局。因为天下秩序原来就是以中国为中心向外层层拓展的。地方拓展到更大之后，不会破坏这个机理、秩序和格局。中华文明无非是在政治统合的地理范围内所赋予的“天下”秩序。

正因为中华文明与中华政权的统一性无法分割，统一是中华文明的内在诉求，中国历史总是珍视统一、致力于统一，不会把分裂的局面正常化。诚然，只有列国纷争，才有百家争鸣。但诸子百家没有支持长期分裂的。他们都是要恢复一个统一的秩序，无非对这个统一的解释和取径不同（参见第五、六、七、八讲）。正因为中华文明在历代有连续性，历代中国才会在多次分裂中重新统一。统一政权的连续性的根据，在于连续的文明始终把统一作为政权的首要责任。

其次，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长期存在、不曾中断的文明。

文明是大一统的根基和秩序。它既是政治统一的动力和目标，也包含了政治统一的正确方式，和对此方式正确性的认证。文明秩序比政治秩序更为基本。不是任何统一方式都被文明认可的。政治统合的方式在历史中是有变化的，例如殷周是一变，东周秦汉是一变，晚清到当今又是一变。这些变化的成果都在历史上保留下来了。这是因为它们得到了文明的认可。在政治的变化中，文明自身也随着发生了相应的改变，获得了更为丰富的内容，从而保持了高度的连续性和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这一点与大一统政权相应，但具有更为深刻的内涵。文明的连续性是政权连续的根据。

第三，中华文明之所以保持长期连续的原因何在呢？这一点实际上需要进入中华文明内部，寻找中华文明之道，

其具体内容，在教程相关部分会展开。这里只点出大要。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持久、连续不断，与它包容、消化异质因素的能力分不开。儒家经典强调既强调自新（“日新”之谓盛德）、强调无所不包（至大无外、厚德载物），也强调自强不息。不息与日新都有连续性的意思，但这个连续性是在中华文明元气充沛的主体性（自强）之上的。以我为主、不断开新，是中华文明的首要精神。

文明体就象一个生命系统，既要新陈代谢，与外部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又会在此交换过程中保持自己的同一性。开放性和同一性这两点是相辅相成的。缺少任何一点，生命体就会灭亡。所谓生命力，就是在消化外物、对待外物中保持和扩大自己的能力。中华文明始终保有这样的生命力。一种有中心的包容、有原则的开放、有差序的拓展。这个中心、原则和差序，就是中华文明之道。

从历史上的主要时期看，中华文明兼具南北两大传统。南方主要与农耕文明有关，北方主要与游牧文明相关。中华文明的大传统，是以南方传统，特别儒家传统为主干，融合与吸收北方传统的精华。晚清之后，中华文明则处于东方传统与西方传统之间。这一次大融合的历史过程尚未完全结束，但其特征已经表露无遗：以中国传统为主体，消化、吸收西方传统的精华，同时将中华传统自身改善和提升到一个新的境地。

中华文明之长久，并不妨碍其活力。它既善变化，又善守成。唯善变化，才见活力；唯善守成，才能长久。中华文明之所以兼具此点，与它在形成时期即会通夏、商、周三代文明传统，获得在重要传统之间如何折中损益、与时进退的经验有关。同时，中华文明是古代大文明传统中最早自觉打通上下区隔，从低级贵族和平民中吸收统治者的，这点极其重要。可以说，中华文明的大特征有方方面面，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两条：自主地融合不同传统，通过教化和选拔从人民中汲取新鲜血液来担纲文明。这两条相当于文明的“源代码”。有这两条在，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吸收新东西、生成其它的强大特征。

以上所说，无非大、久、活、新四个意思。中华文明表现出来的特征就是大（大一统、中国规模）和久（连续、长久、同一），而产生这两条的能力就是活和新。能力中最重要的两条表现就是融合不同传统、贯通上下悬隔。从中华文明的形成期到各个危急关头的重建和调整，最终依赖的就是这两条。在不同时代，这两条可以不同的形态和名目出现。在现时代，中华文明的这两条能力特性可以叫做向外铺开的“世界性”和向下沉淀的“人民性”⁸。

总之，中华文明是中道文明，重视在具体的历史条件

⁸ 晚清部分以后的各讲，会解释这两点。

下折中损益、学习创新。有融合各传统、变革再造传统的传统，也有打通上下的传统，更有经纬天地、交通四方的传统。

(二) 中华文明的六大历史时刻与三大历史时期

西方进入 15 世纪之后，开创其早期现代。西方文明至今仍处于现代文明时期。因此西方人尤其重视 15 世纪前后的变化，名之为“古今之变”，将它看作西方历史头等重要的时刻。

也有西方的历史哲学家起来说，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人类文明的头等重要时刻不是 15 世纪的古今之变，而是公元前 800 年到公元前 200 年的这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希腊文明、中国古代文明和印度文明都从宗教主导的上古文明形态中突破出来，产生了某种意义上的理性精神。希腊、中国和印度几乎同时产生了他们各自的大思想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孔夫子、老庄、释迦摩尼等。这三处几乎同时爆发的大突破就叫做“轴心突破”，这个时代就叫做“轴心时代”⁹。轴心时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转变，其次才是 15 世纪的“古今之变”。但后面这次变化，只是在作为希腊文明苗裔的西方文明之内发生的。中国和印度自从轴心突破之后，历史就陷入某种停滞了，直到古今之变之后进入工业和科技时代的西方文明的殖民活动将它们再次卷入现代。

以上所有的叙述蕴含了当前不少中国历史研究者乐意采取的框架：中国历史的转变时刻很少，要么是晚清发生的一次被动的“古今之变”（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要么再加一次轴心时代主动的“突破”。在社会形态五阶段论指导下的中国历史分期学说中，得到重视的其实也只是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与“封建社会解体”或“资本主义萌芽”这样两个时刻。这两个时刻略同于轴心时代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无非对内容和意义的解释不同。

所有这些中国历史叙述都有这样两个相同的看法：在两大时刻之间，中国存在着漫长的近乎停滞的历史（要么是漫长的“封建社会”、“宗法社会”，要么是“超稳定结构”，要么是漫长的“中世纪”，等等）；后一个时刻直到当前，属于广义的“现代化”（包括近代化）或“革命”加“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时期。有的中国史研究者（特别一些日本学者），为了表明中国在其现代化历程中不完全是被动的，而是有着内在的资源，就在第二个时刻稍前，加上了“近世”时期，作为“近现代”的准备期。这看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中国历史“停滞”论，但仍然以发展出“现代”作为摆脱“停滞”的标志。

所有这些学说都是以某种目的为主导来叙述中国历史的。这个目的或者是某个高级的社会发展阶段，或者是“现代化”。这些叙述重视当前，自有其合理性。但这种对当前和现代的唯一重视导致这些叙述的主体都不是中华文明。从目的论的历史哲学看待中华文明，只能划出一两个类似“古今转变”的时刻，即使有所调整修饰，也不会改变“现代目的为主，中华文明为宾”的基本状况。

本课程既以中华文明为叙述主体，那么就无法采用简单的“古今转变”方式，而只能依靠内在的、以中国释中国的方式来叙述中国历史。换言之，在以上的历史叙述都高度重视的两个时刻之外，还必须加上其它的时刻。这些时刻不是依照与“现代”的亲疏远近确认的，而是来自中华文明的内在流变。更重要的是，本课程对这些时刻的讲述，会丰富和改善对“古今转变”的认识，如果不是彻底改写它的话。

总的来说，本课程会按照三大历史时期来划分整个中华文明史。这三大历史时期就其包含的转变而言，又可细分为以下六大时刻：

- 一、分开上古文明与宗周礼乐文明的殷周之际；
- 二、分开封建制文明与郡县制文明的周秦之际；
- 三、融合北方传统和佛教因素、重建大一统的晋唐之际；
- 四、从三教会通到儒家重建道统、新的教化与选拔方式带来新的统治集团的唐宋之际；
- 五、开始全面整合南北传统、儒佛传统与汉藏传统，并且奠定现代中国基本地理与文化版图的明清之际；
- 六、晚清以来，开始融合西方传统和现代西学因素，

中华文明表现出来的特征就是大(大一统、中国规模)和久(连续、长久、同一)，而产生这两条的能力就是活和新。

⁹ 参见雅思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0-35页。

人民、国家与精英之间关系又一次产生革命性变革的时代。

时刻是转变和划分的概念，从持续和合并的角度，以中华文明自身为主体，可以将以上六大时刻再做归并。中华文明自起源以来，可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时期：

中华文明的第一期是从上古直到魏晋南北朝（第二时刻）；

第二期是从唐代直到清代（第五时刻）；

第三期是晚清以来，仍处于开创时期，远未完成。

每一个时期都有其自己的开创-拓大-调整时期。第一期的大事是中华文明原型的奠基和拓展，第二期的大事是文明原型的重建、变形和拓展。第三期正处于重建过程中。每一期之间的时刻属于调整期，六大时刻中的第一、二、三、六就分属于文明三大时期的调整期。

中华文明的第一期的主要事件是作为一个统一区域的中国雏形初现，中华文明原型的奠基（考古学的术语是“文明形成”，参见课程第一讲）与中华文明的初步拓大。在这一时期，上古满天星斗的各文明起源点开始彼此交往、融合，出现了隐然有一中心（这个中心就是区域“中国”的最初形态）的“重瓣花朵”的文明形态，进而形成了几大部族的礼法习俗（如夏人、商人、周人、楚人等等），最终融合为以周文明为主干、吸收夏商文明形成的文明原型。

在文明的自我阐释传统中，形成了以儒家经学为主干，吸收先秦诸子思想的教化原型。在制度方面，除了糅合周秦制度的汉代制度。在种族方面，汉族的原型开始初步形成。在区域上，“中国”的范围从黄河中上游向黄河下游以及长江流域拓展，并在和北方游牧民族的拉锯战中占据主动，势力范围达到了西域。

这一期有其内在曲折。政教上的曲折是轴心突破以及殷周之变、先秦诸子出现。制度上的曲折是周秦之变，特别是作为这一转变结果的政治大一统秩序。这个秩序也作为中华文明根深蒂固的理想影响后世。无论中国分裂的实际时间有多长，作为一个理想的“大一统”一直是中国历史上起作用的现实力量。这一期文明出现了以王道为正的王霸杂用、以儒家为宗的儒法合流。也就是在制度文明形态上以王道为理想，吸收霸道的治理方式。在教化形态上以儒家经学为正统，扬弃与吸收法家道家等因素。在选拔和政体形态上以贵族制及其在皇帝制度下的变种——门阀制为主。

中华文明第二期的大事是南北传统的艰难融合、儒家以及道教对印度、西域思想的吸收。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华文明原型的再次奠基或者说重建。在这一时期，北方各游牧民族多次南下，与农耕地区的早期汉族在种族上有大规模的融合。不同的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过中国的一部乃至整部。以王霸杂用为主干的皇帝制度逐渐吸收了一定程度

的北朝政治因素。这在明清两朝尤其突出。例如，清代对不同区域和民族成功地采用了多元化的治理方式。但这一期政治文明的治理、教化的基础仍是秦汉制度与官方儒学。历史证明，在此基础上吸收北朝政治因素的政权是成功的，而违背这一制度的政权是不会长久的。

中华文明第二期精神文明方面的大事是儒家对来自西域或印度的佛教传统的吸收和批判。正如第一期儒家吸收了三代文明、秦汉制度与先秦诸子的思想一样，这一期儒家也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传统。这一期儒家的教化形态是理学。在选拔精英的方式方面，基于理学标准的科举制成熟了。制度方面以进一步加强的皇权与经科举选拔的官僚士大夫的合治为主。

这一期的中国，范围比第一期更辽阔了。在其极盛时期，中国将势力范围延伸到了中亚、东北亚、东南亚以及太平洋中的岛国，更不用说蒙藏满洲了。在这一时期，中国各民族的分野也逐渐清晰起来。总之，这一时期的中国奠定了现代中国领土状况和民族状况的基础。

这一期的内在曲折是唐宋转型和明清之际。前者是中华文明全面重建的历史时刻。后者是第二期中华制度完全成熟，获得统治多民族、多宗教、多区域的广阔地带的经验的时刻。前者是在思想文化上解决了东亚传统与南亚以及中亚传统的冲突。后者是在政治上解决了东亚传统与中亚传统的冲突。这一期的中华文明重建和拓展了第一期的文明原型，实现了被胡焕庸线分割开的南北传统在版图、政治、思想、文化和人种上的大融合。

第三期的中国，正面临着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其基本处境是遭遇西方现代文明，包括工业、科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人民主权、政党政治、现代革命以及民族国家的条约体系。其曲折是清帝国的崩溃和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重建。其世界视野已从亚太与中亚拓展到全球七大洲。中华文明的在地理上的世界图景，在第一期是九州，第二期是亚太与中亚，第三期是七大洲。这都是不同时代的可经验范围内最大的人世图景。

每一期的中华文明，其共同点都是以文明原型（儒家）的革新形态融合不同传统，产生了新的人民教化与精英选拔机制，都拓展到了地理世界的可经验范围中。前两期的结果就是中华文明及其世界秩序之自我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第三期正出现这个趋势。

可以用更简略的、关键词的方式总结中华文明的全部三期。第一期：中国与中华文明奠基。封建中国郡县化，礼乐中国礼法化，贵族文化的去贵族化（与再贵族化也就是门阀化）。

第二期，南北传统的形成。多元帝国，佛教的中国化、平民化与儒家的平民化、平民的宗族化。

中华文明史非但没有“停滞”，而且呈现出比西方历史更加丰富、更加具有意义的变化，既无法用单纯的轴心文明说，也无法用简单的古今两分说来解释。

第三期，东西融合的开始。帝制中国的共和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人民化、平民的人民化、政治精英的政党化、人民文化的兴起与传统的再生。

可以将以上的三大时期与六大时刻与西方以及印度的历史做一个对照。西方与印度的“轴心突破”时期（包括马其顿帝国的建立），只相当于中华文明的第二时刻。西方历史中对于这里第一时刻的只能是前“轴心时代”的黑暗的上古神话时代。中华文明史的第三时刻与第四时刻，西方都是蛮族入侵、帝国解体、领主林立、教会独尊的中世纪。后一时刻是伊斯兰教兴盛的时代。第五个时刻，欧洲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已经完成，绝对主义王权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条约体系正在形成。科学与哲学革命正在发生，即将进入启蒙时代。第六个时刻，西方是帝国崛起、殖民贸易、霸权更替的时代。这是西方文明从极盛到危机的时代。

通过这个对照可以看到，中华文明史非但没有“停滞”，而且呈现出比西方历史更加丰富、更加有意义的变化。这六个时刻说明，中华文明史既无法用单纯的轴心文明说，也无法用简单的古今两分说来解释。这并不是拒绝轴心文明学说，而是要点出，只有中华文明在其悠久的历史中，自觉地学习其它两个轴心突破所带来的东西；这也不是拒绝承认“现代”，而是说，既然中国的“大转变”发生过多次，那么中国的所谓“古今之变”势必拥有更为曲折、更为丰富的意涵，既然与“现代”对应的中国“古代”并非铁板一块，那么对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就可以有更加深远、更加中国化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对于正在展开的历史实践也是富于意义的。

本课程对文明史的划分，仍然尊重通常历史学研究的那个结论，即“轴心突破时期”与“三千年大变局”是中国历史

上最重要的两个时刻。但我们得出这个结论的方法不是目的论的，而是内在于历史的。正是历史中的行动者提出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说法本身就暗示了中华文明奠基的“轴心时代”和晚清才是最重要的两个时刻。提出其它四个时刻不为别的，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两个最重要时刻之间的历史。因为正是这段活泼泼的历史，塑造和传承着中华文明最重要的那些东西。

我们现在仍处在那个大变局之中。与晚清时代不同的是，我们应当意识到，其实整个人类都处在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人类要在这场变局中赢得未来、赢得自己，就要了解自己、了解天命。而要了解和天命，没有什么比学习本国的文明史更好的起点了。人类之所以有历史，本就为了知道天命、成就自己。

四、本教程的大体安排与学习方法

本教程分上下两部，凡六十四讲（含导论、结论）。适用于两个学期授课。本教程由多人合力编撰而成。各讲编者，都是一时之选，对于所负责的相关部分有多年研究和教学的心得。为保持讲义的统一和连贯性，教程在编撰期间，编撰人员彼此多有研讨。且有专门人员，进行统稿。

讲义虽由多人合力撰写，但本教程是一个整体，其指导思想是首尾一贯，本末一致的。本教程适用于大学一年级学生的通识教育。教师在授课时，除了这部讲义教程，也要注意每部分后附的阅读文本和参考材料。对于教师授课来说，讲义的思路是重要的。对于学生的学习来说，最好在阅读文本和参考材料上付出更多的精力。讲义的初衷，是为这些文本阅读提供一个历史叙述的框架。■

经典的阶梯

——《西方思想经典》小班通识课感悟

强文玥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11 本)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外国语学院希伯来语专业的大四本科生强文玥，今年保研到哲学系宗教学专业，很高兴在这里向大家谈谈关于小班教学的体会。可以说，我的大学本科就是在小班通识教育中度过的，小班教学是我接受启蒙教育、找到人生兴趣的开始，对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此讲一下我个人对小班教学的感受，与大家分享一些经验。

在刚入学之时，我只是一个懵懵懂懂的新生，对大学生活充满了憧憬，却并不知道该如何规划这四年，只是延续了高中死板的学习习惯，重视考试成绩、绩点，选课也集中在给分高的、学习压力小的、老师“厚道”的大课，关注的是知识的吸纳、记忆和积累，并没有真正开发自我的思维和心灵空间，更说不清楚北大的精神意义何在，于我有何用。奉行实用主义的我在进入北大后不久就做出了离开大学之后的规划，计划着学最热门的经济学双学位，急于投入职业化的培养，以保证将来的就业。

然而这一切都在我接触小班讨论课之后发生了改变。我第一次接触小班通识教学并不是在北大，而是在大一暑假去耶鲁大学进行暑期交换之时，参加英语机构的部分课程——阅读、写作、听力以及英美文化的相关选修。我们在课堂上讨论文学经典、哲学、社会问题，讨论电影、文化，我渐渐地发现这种开放、自由的学习环境真正把我带入到课堂参与当中，产生思维的碰撞与互动，并且在这其中慢慢发现了自己对思考的兴趣。正是有了小班通识教育的经历，回到北大之后，大学的精神意义才真正向我彰显，我才意识到，我的大学不能在理性化的职业规划与利益权衡中度过，而是要在大学中寻求精神的滋养和心灵的提升，这样在大学毕业之后我才能自豪的宣称——我得到了北大

最精华的教育。这时我才将目光投向了各式各样的通识教育课程，而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吴飞老师的“西方思想经典”，这门课程真正激发了我对哲学的兴趣，并使我决定以学术为业。下面我就来谈谈自己对这门课的体会。

首先，这门课最吸引我的是回归文本、回归经典。我们都知道经典的魅力，但却很少有人能够真正读懂经典，因此经典就逐渐成为一种远离我们生活方式的、触不可及的、高高在上的事物。这门课给了我们一个把握经典的方式，可以在充分理解文本的基础上不断挖掘其中的内涵，去思考一些永恒的大问题。我相信，无论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无论之前有没有哲学的基础，在面对最基本的问题之时，都有着相同的困惑与探求的渴望。而经典恰恰是把握住了人性中的种种可能性，给了我们最深刻的回答。因此，这门课传授的，并不仅仅是我们可以去把握、记忆的知识，而是打开了一扇自由的门，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窥见真理之光，获得启蒙。

课程的文本是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英对照，并有注释详解，同时以 BBC 翻拍的四部电影作为参考，内容充实丰富且生动有趣，十分受欢迎。老师以文本细读的方式，逐幕解读，以深刻的眼光和细致的剖析让我们看到剧本背后的问题与思想，真正看到了莎剧的厚度与多层次。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单词却有着厚重的文化背景，或是出自圣经，或是源自古典意象，这种文本细读的方式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莎剧，让我们发现了莎剧的分量与耐人寻味之处，也使我渐渐发现了学术研究的魅力所在。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有着史诗般的厚重感，“国王”的主题贯穿始终，上演着朝代交替，社会变迁的种种，为我们

呈现出人生百态。大到政治纷争、篡位夺权，小到酒馆、闹市的平民生活，各个阶层、不同身份之间的纵横交错呈现出一个复杂的社会网络。我们从人物的独白、交谈中看到的人真实的内心世界，灵动又丰富的戏剧形式更牵动着我们的情感。在莎剧中，我们受到了最好的情感教育，这不仅仅是学习，更是参与、体验，是将自己代入到戏剧情景的过程。

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次，恐怕经典并不能给予我们长久的滋养。经典唤起的是人性中最柔软的情感，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用理性的思维去把握，这也是大课讲授中最核心的部分。每每当我们沉浸在剧中情节的时候，吴老师总是能够站到经典之上的、一个更高的视角去解读、发问，从一个更为根本的、内在的角度剖析这些主题，贯穿始终的哲思给我们了无穷的启发。莎剧为我们展现的不仅仅是故事，更是故事背后的哲学命题，如奥古斯丁的心灵秩序问题、柏拉图的爱欲问题，马基雅维利式的现代政治问题、基督教的罪恶与救赎问题、王位的合法性问题等等。

因此，在吴飞老师的课堂上，我们获得的是情感教育、丰富的知识，以及对哲学问题的把握。而在课后的小班讨论中，在助教的带领下，我们得以深入挖掘文本，更加细致地思考、探讨，尝试回答大课上未解决的问题，以深化对一些重要哲学问题的理解，并逐渐形成自己的一些想法。大课与小班的结合形成良好的授课模式，使我们获得了全方位的训练，然而这并不是全部，此门课使我受益最大的，更是充分、系统的写作训练，每半个月写一次小论文，经过一个学期的集训，论文质量与写作能力逐步提升，而助教细致认真的批改与同学之间的批评鼓励成为我重要的写作动力。更让我意外的是，写论文成为了一种享受，我逐渐爱上了读书、思考、写作的过程，不同于过去漫长且痛苦的论文“拼凑”过程，这门课的哲思、老师的启发与同学的讨论引起了我对一些问题的关注，真正地唤醒了我的创作激情，因此创作的过程成为灵感的迸发与心灵的写作，使得我在思考、写作中确立了一种根植在灵魂中的价值与意义，相信很多同学都有相似的感觉。

同时，写作的激情与对知识的渴求使得我不断拓宽视野、去读更多的书，我搜罗了各种与莎士比亚、政治哲学相关的书籍，对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学会了如何去读书，读书是为了思考，只有带着问题意识进入到书本当中，书本才由看似与我无关的

知识成为形成思考的重要线索，这也拉近了我与书本的距离。我也渐渐发现，经典成为了我进入哲学世界的途径，一些历史故事性的主题具有了哲学意涵，而同时，哲学的概念也不再是枯燥无味的知识，而成为了有血有肉的莎剧形象。甚至直至现在，其中的一些问题也贯穿着我的思考，让我在之后的学习当中不断地回到莎剧中的主题，从各个角度去印证、更新当初的想法，从而对莎剧的理解越发深刻。

而最重要的是，这个学期的不断探寻让我发现了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我逐渐确立了自己以后学习的方向——宗教学，希伯来语这门古老又神秘的语言于我不仅是用以谋生的工具，更是一把进入《圣经》世界的钥匙，一个有研究价值的领域。大三一年，我获得了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交换学习的机会，而正是有了在北大哲学系小班通识教育所训练的学术基础，令我很快适应了希伯来大学的小班教学风格，在阅读、讨论和写作方面都得以应用自如，并真正开启了学术之路，开始尝试更为哲学化的论文写作。而这次出国的经历也让我认识到，英文的讨论课堂和中文的讨论课堂并没有什么区别，语言只是承载思想的工具，而北大的小班通识课程对学生的培养和塑造是全面、系统、成熟的。

“西方思想经典”这门课对我的训练和培养如同阶梯式的，从情感教育、知识的丰富、到哲思的触发、讨论的思维碰撞，形成思想的结晶，并最终发现自己的兴趣。这阶梯式的过程，也是一步步打开心灵，塑造人格，走向哲学的过程。可以说，正是窥探到了经典中的真理之光，看到了真正的美本身，才引发了我不断向上攀升的愿望。而只有处于这不断努力，对知识本身的不断渴求中，我才真正领悟了什么是北大的自由，这份自由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而是一种向上的指引，是精神的启蒙与心灵的开发，帮助我们寻找到自己内心深处向某种更为广阔、更为纯粹、更为真实的事物的激情。因此，感谢北大的小班通识教育，感谢吴飞老师的“西方思想经典”，挖掘了我的潜能，帮助我发现了真正的兴趣，引领我走出柏拉图的“洞穴”，朝向真理之光。这是小班通识教育对我的启蒙，也是我眼中的真实的北大精神。

谢谢大家！■

来源：2014年北京大学本科课程经验交流会上的发言

巴黎的孤独 ——波德莱尔与“人群”

章丹晨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

美学课上读到波德莱尔的文章《现代生活的画家》时，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作者对现代艺术的礼赞和对现代生活的陶醉。他用来作例子的作家康斯坦丁·吉斯就是这样一个热爱生活、与现代生活中的人群融为一体的画家，是一个“人群中的人”。然而读了本雅明这本关于波德莱尔的论著后，我意识到波德莱尔的这番话只是一个十分抽象、笼统的论述。而《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这本书以第二帝国时代的巴黎作为研究的重点，揭示了波德莱尔对于时代的感受。在其中，“人群”对于波德莱尔，并不是一个他真心热爱并且愿意融为一体的概念，反而，在许多方面，可以从中看出大都市的“人群”是怎样反映了诗人在现代生活中的孤独。

波德莱尔自己在一首题为《人群》的散文诗中说：“人群，孤独，对于勤勉而多产的诗人，是两个相等而可以对调的字眼。不懂得把自己的孤独跟群众结合的人，也不会懂得在忙碌的群众中保持自己的孤独。”¹在本雅明的观点中，一方面，波德莱尔从人群中抽离出来，在人群中发现了现代主义的“英雄”，另一方面，却又生活在无处不在的人群中，审视并且屈从着它无限的、令人不安的强大能力。而结合自己独创的“光韵”概念以及大都市人的“惊颤”体验，本雅明发现“人群”正是波德莱尔用以反思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凭藉。

一、“人群”与现代英雄

1 《恶之花 巴黎的忧郁》，【法】波德莱尔著，钱春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p401。

在《现代生活的画家》这篇文章中，波德莱尔是以一种非凡的热情来赞颂现代生活的，并且指出现代艺术必须对身处这种生活的人群有所观察。在《人群》中他接着写道：“诗人享受着这种无比的特权，他可以随意保持自己的本色或化为他人。他可以随心所欲，附在任何人的身上，像那些寻求肉体的灵魂一样。只有对于他，到处都是虚席以待的。”这里的“诗人”，应该就是《现代生活的画家》中提到的“闲逛者”，他们穿行在人群中，观察着都市的各色人等，同时收获着巨大的快乐。

然而，在转而去读《巴黎的忧郁》以及《恶之花》中的《巴黎风光》组诗时，很难从波德莱尔所描绘的各种人物中发现前面所说的那种诗人内心的快乐。他所描绘的多数是社会底层的人，总是带有可怜或丑恶的一面，而诗人经常对他们满含同情。比如《小丑和维纳斯》，诗人在万象欢欣之中发现了伤心的小丑，对着巨大的维纳斯雕像，为自己没有资格领会不朽的美而伤感。“女神！请怜悯我的哀伤和狂妄吧！”²又如《年老的街头卖艺者》，背景依旧是欢度节日的人群，而那位卖艺的老人在其中却是格格不入、令人厌恶的。面对这种反差，诗人感受到了强烈的怜悯和痛苦：“我感到我的脖子被歇斯底里的可怕的手掐住，我的眼睛仿佛被那些不肯滴落的反抗的泪水掩蔽得模糊起来。”³诗人对这些平凡甚至令人生厌的小人物，有一种独特的关心。

2 《恶之花 巴黎的忧郁》，p389。

3 《恶之花 巴黎的忧郁》，p408。

因此本雅明在书中提出，波德莱尔笔下的休闲逛街者并非如人们所想像的是诗人的自画像。⁴而波德莱尔笔下的小人物，很多时候都带有一种诗人对现代英雄的想像。本雅明援引波德莱尔在《论现代生活的英雄》中说的话来分析波德莱尔的观点：“可是，在私人生活中存在着一些更富有英雄意味的题材。上流社会以及生活在大都市底层的成千上万未登记居民——罪犯和过寄生生活的女人——的生活场景，法庭公报和判决，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只需睁开眼睛就能发现我们自己的英雄主义。”⁵波德莱尔笔下的这些人身处社会底层，总是与“人群”格格不入，他们有着波德莱尔自身孤独的特质：“一种顽固的皮肤溃疡，一种个体坚守其特异性的固执”⁶。也就是在这种与群体抽离的孤独中，在这种应对一无所有的生活的勇气中，波德莱尔得到了他对于现代主义的英雄的定义。在这本书的有关章节中，本雅明还列举了其他出现在波德莱尔笔下的“英雄形象”：社会底层的渣滓、女同性恋者、花花公子、密谋者，当然还有作家自己。作者在谈到波德莱尔与雨果的区别时说：“雨果将人群作为现代英雄史诗去赞赏，而波德莱尔为他的主人公在人群中找到了避难所；雨果把自己作为公民放在人群中，而波德莱尔却把自己作为一名英雄从人群中分离了出来。”⁷从这个角度看，波德莱尔从对人群的审视中发现了超越“人群”的现代英雄的形象，而他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员。

二、“人群”与都市的罪恶

然而在这里，波德莱尔对于“人群”的视角并不是自上而下的、完全抽离的，他的“英雄”永远需要“人群”作为背景。而在这种观察中，作为现代英雄的背景的“人群”总是一种隐隐令人不安的因素。本雅明利用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提到的爱伦坡的小说《人群中的人》来说明了这一点。小说的前半部分，叙述者在咖啡馆的窗边观察着夜间窗外的人群，后来，他看到一个令他好奇的陌生人，他跟踪着这个神秘的老人，老人引着他走遍了半个伦敦，穿过各色人群，最终我发现，他只是需要在人群中隐匿自己，而无法独立行走。“我再跟下去也将毫无结果，因为我既不会对他了解得更多，也不会知道他的罪孽。”

在这里，这位观察者的所见并不是人们平常印象中美

好而丰富的都市生活，相反，窗外随着夜色加深而展现出来的都市的罪恶，使人隐隐地感觉到人群的威胁性。更重要的是，这里的“人群中的人”并不是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里提到的那种概念。本雅明就认为，“人群中的人并不是休闲逛街者。在人群中的人身上，沉静让位给了躁动，因而一旦他被剥夺了他所属的环境，在他身上消失的更会是一个休闲逛街者必然具有的东西。”⁸这种带着罪孽的“人群中的人”是以一种急切地寻求庇护的心理依附于人群的，人群是这种人的避难所。在爱伦坡和同时代作家对这种“避难所”的观察中，就产生了侦探小说。本雅明认为，侦探小说最初的社会内涵是使个人痕迹在大都市人群中变得模糊。⁹确实，这是侦探小说与犯罪小说的不同所在。犯罪小说重视对人的心理分析，始终关注和追踪着人的自我存在和心理活动，当《罪与罚》里的人物开始长篇的说话或思考时，似乎整个时间都为它们静止了。然而侦探小说还是和犯罪分不开的。本雅明在讲到它的兴起时举了一些例子，提到一些作家在作品中展现的野蛮的恐怖，似乎这种行为离文明很遥远。那时的作家已经隐隐感觉到人群具有一种无限的可能性和包容的能力，一切都能在其中容身，这种恐怖的力量与蛮荒的大自然确实有一种相似之处。

而在这种环境下生活和写作的波德莱尔，也由此形成了对人群的若即若离的理解。“如果他屈从人群展现的那种力量而被拉进他们中去，并像一个休闲逛街者那样完全成为其中的一员，那么他就摆脱不了对人群那种非人性的感觉。他使自己成为他们的同类人，但几乎在同一瞬间又将自己同他们区分开来。他使自己与他人保持一定距离地走进人群中，只是为了用轻蔑的一眼把他们突然忘却。他谨慎地承认了这种矛盾心理，其中有某种强迫性的东西。”作为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他必须身处人群中，然而对人群又有一种戒备。而另一方面，波德莱尔自己也经常经历小说中“人群中的人”的那种隐匿和逃离。本雅明说到，诗人晚期的生活极端穷困，为了躲避债主，经常不断地更换住所，对于科技发展和行政管理水平提高所带来的现代身份确认方式深恶痛绝。在《巴黎的忧郁》中有一首诗《在这世界以外的任何地方》，其中说道：“我觉得，如果我换个其它地方住住，就会常常感到舒服，这个迁居问题乃是我跟我的灵魂不断讨论的问题之一。”¹⁰而这种不断迁居的需要，在波德莱尔的诗中也以一种浪游者的形象体现了出来：“我常常觉得，我的乐趣就在于永远一直往前走，不知道往何处去，不要有任何人对此担心，永远去看看一些新的国土。不管

4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德】瓦尔特·本雅明著，王才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p68。

5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p78。

6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p79，引自加布里埃·布努尔《维克多·雨果的深渊》。

7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p56。

8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p131。

9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p40。

10 《恶之花 巴黎的忧郁》，p495。

在哪里，我总感到不舒服，到任何一处地方去，总会感到更自在些。”¹¹这里，波德莱尔对人群的感觉已经很淡了，他笔下那个孩子的愿望更接近一种开辟无人之境的愿望。

三、人群的内化与爱的远离

然而在当时繁华的巴黎，是不可能有无人之境的。波德莱尔对于人群的观察，也一直是在身处人群的同时进行的，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关于波德莱尔几个主题》中，本雅明强调，人群一直是内化于波德莱尔的东西。“不管他与人群保持多大的距离，不管他想在人群中获得多少自我空间，他总是会被它侵染，因此他们无法像恩格斯那样站在它之外来看它。就波德莱尔而言，人群很少是外在于他的东西。”¹²关于这一点在波德莱尔创作中的体现，本雅明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描述：

在《巴黎风光》中几乎到处都可以演示出大众的隐秘存在。当波德莱尔把黎明当做主题时，无人的街道就具有了一点雨果在夜巴黎觉察到的‘无声的人群’的味道。当波德莱尔观看满布尘埃的塞纳河岸上待售的解剖学图册里的插图时，死去的大众便隐秘地出现在那些演示单个骨架的页面上。拥挤的大众就在这‘死神之舞’的形象里向前走。组诗《小老太婆》所描写的干瘪老女人的英雄主义就体现在她们游离出成群的大众，不再能保持它的步态，不再让思想参与当前的事情。大众是一幅移动的面纱，波德莱尔透过它认识了巴黎。大众的存在决定了《恶之花》中最为著名的一部分作品的意义。”¹³

波德莱尔很少直接把大众当作主题，不过经常在其他主题的诗中蕴含大众的影子。在早一些时期的俄罗斯诗篇中，是很少有这种大众的痕迹的，可能这与俄罗斯当时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也有关系。而在波德莱尔这里，一切都以一个大都市作为背景，人群的出现似乎是一种甩不脱的存在，是一种不得已的带入，很难直接感受波德莱尔对他们的感情是怎样的，但是，在他对主题抒发的情感中也能间接地看到大众是怎样地影响了主题。《给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就是一个很好的典型。

大街在我的周围震耳欲聋地喧嚷。
走出一位穿重孝、显出严峻的哀愁、
瘦长苗条的妇女，用一只美丽的手
摇摇地撩起她那饰有花边的裙裳：

11 引自《天资》一诗，《恶之花 巴黎的忧郁》，p460。

12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p124。

13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p124。

轻捷而高贵，露出宛如雕像的小腿。

从她那孕育着风暴的铅色天空
一样的眼中，我像狂妄者浑身颤动，
畅饮销魂的欢乐和那迷人的优美。

电光一闪……随后是黑夜！—— 用你的一瞥
突然使我如获重生的、消逝的丽人，
难道除了在来世，就不能再见到你？

去了！远了！太迟了！也许永远不可能！
因为，今后的我们，彼此都行踪不明，
尽管你已经知道我曾经对你钟情！

在这里，人群是诗人和那位女子萍水相逢的背景，但也是作为爱离诗人远去的场所出现的。前面所说的《人群中的人》以及侦探小说的兴起证明了人群的强大功能，人群能轻易地掩藏罪恶，也就能轻易地冲刷走爱的萌芽。诗人在惊颤体验的瞬间看清了自己的孤独和心底无处安放的热烈感情，但在这一瞬过去之后，那位女子早已被人群推搡着远离了他，再也不可能相遇。在第二部分“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中，也讲到了这首诗和这种感情。“使大都市人着迷的形象恰恰来自于大众，他们在大众那里感受到的绝非只是那些不自在、令人反感的東西。使大都市人着迷的东西并不是那来自第一瞥的爱，而是那在最后一瞥中产生的爱。这是一种再也不会重逢的别离，这种别离就发生在这首诗中出现着迷的一瞬间。”¹⁴人群瞬息万变的本质使得这种爱成为了不可能。一切都在不断流动。在诗人心中发生的着迷和痛苦的感情都来自于这种奇特的都市体验。

四、光韵的消失和对现代性的反思

在这种都市体验中，已经体现出了发生在诗人身上的那种“惊颤”效应。它是面对一种不断变化的事物时受到的神经上的刺激，这种刺激在大都市变化无常的本质中处处都能得到。面对这种“惊颤”，都市人似乎也找到了一种抵御方法。齐美尔在他的《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中就说：“都市人的典型——当然它呈现出成千上百种个人变体——创造出一种保护机制，来抵御对之构成威胁的、外部环境的波动和断裂所带来的极度混乱。”这是都市人群应对纷至沓来的变化所产生的一种疲倦的对策。而在本雅明的论述中，“惊颤的概念是和柏格森、普鲁斯特、弗洛伊德等人的学说联系在一起的。弗洛伊德

14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p126。

认为，人的意识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抵御刺激，“它首先要做的是：必须在外部世界超大能量同化性，即摧毁性的侵入面前极力保护内部能量转换的特有形式”。¹⁵ 对于波德莱尔而言，“对惊颤的抵御就像一场搏斗”¹⁶。本雅明在此回溯了同时代人对于波德莱尔的印象，他的外貌特征、脸部表情经常说明他受到了精神刺激，而惊颤的意象在波德莱尔诗中也大量出现，而且经常是与置身大都市的人群联系在一起。波德莱尔与一般的大众在应对“惊颤”这个都市现象上的不同，似乎也可以解释之前提到的那首诗，为什么在流动的人群中，唯有波德莱尔这样敏感的诗人的灵魂能够体会到与那位女子擦肩而过永不相遇给他带来的无穷痛苦。

根据本雅明的理论，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带来的“惊颤”效应最终导致“光韵”的消失。根据这本书的译者的观点，“光韵”事实上更应称为“灵韵”，指的是对象引发感受上的不可复得性，体现在时间、空间的距离上。¹⁷ 而随着工业发展，摄影等技术相继出现，机械复制的时代在不断地抹去这种灵韵”。本雅明在他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一文中也提到了电影给人们带来的“惊颤效应”：电影的不断推进的本质使得观众在逐帧变化的影像中得到惊颤的体会。然而观众群体在欣赏电影的过程中也形成了一种抵御惊颤的能力，转而以一种消遣的方式，而不是沉思的方式欣赏艺术。技术的进步和大众的这种反应都加速了艺术作品“光韵”的消散。在波德莱尔的诗中，已经很少出现“艺术将美从时间的深处召唤出来”的情形了¹⁸，相反，“目光所克服的荒芜越深，它的魅力也就越强”。波德莱尔似乎大大方方地接受了这种

光韵的消失，本雅明距离认为，波德莱尔相反还认为那种僵直的、对远方一无所知的眼神富有魅力。在《光环的失落》这篇散文中，波德莱尔还对那种对失落的光环耿耿于怀的传统抒情诗人进行了嘲笑。但这个失落了光环的人，也有着深深的遗憾和迷茫。就像后文说的那样，他感觉自己有朝一日会被大众推攘着向前走，在他面前，只有一场骚动，而没有启示和痛苦。在这里，光韵的消失是令他心痛的，他预见到了人群中英雄主义，以及永恒的美终将消失，从而体会到了一种困惑和孤独。光韵在惊颤体验中的消失是他的诗的法则，这是他对于现代性的承认。然而不能忘记他的艺术二分法——他将艺术分为永恒的部分和流动的、现代的部分，前者在他的诗作中实际上没有消失过，他的诗作常常从与古典主义互相渗透的角度去谈现代主义¹⁹。从本雅明这最后一段话里，也可以看出他对现代性的无可奈何的抗拒。

因此，在波德莱尔那里，人群并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意象，而是一个他永远身处其中，又永远在心灵中拥有其影子的存在，而在这人群的背后，是一种之前的抒情诗人没有过的都市体验。实际上，这本书的三个部分，都属于本雅明未完成的“巴黎拱廊街计划”，本雅明从波德莱尔的视角出发，重点并不在探求波德莱尔的美学观点，而是以一种唯物主义的立场，从他的都市体验中观察现代生活如何影响巴黎人的心理变化和精神状态。所以事实上每一个人的心里，都会有那种面对人群的不安和孤独，对于消逝的美的留恋和对现代生活的迷茫和反思，这是因为时代在推进，一切都处于变动之中。这也许就是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的。■

来源：《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课外阅读报告

15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p114。

16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p118。

17 《灵韵、人群与现代性批判——本雅明的现代性经验》，王才勇，《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

18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p154。

19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p83。

复旦大学核心课程助教工作研究报告

——《论法的精神》导读

姜涛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讨论课的意义是什么

在思考“怎么提高学生兴趣和积极性”之前，有必要先反思一下讨论课的意义。“通识教育”本身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理想概念，情怀有余而缺少操作意义。对于绝大多数本科生来说，核心课程究竟能提供什么实际价值、起到什么实际作用（而不仅仅是泛泛而谈的“自由无用”），这是施教者（学校机构、任课老师、助教）必须反思的问题，也是吸引大多数学生、维持和激发其学习热情的关键。

以笔者充任助教职务的课程（《论法的精神》导读）¹为例说明。该课程属哲学人文类别，学习内容为18世纪初期西方启蒙思想著作，相对当代中国大学生普遍的知识背景而言比较陌生隔膜。在选课的约一百名学生中，理工医科生比例超过大半（70余人），哲学专业学生仅1人。这里存在的困境是：首先，大多数学生对讨论题目感到无从下手，显然也不容易产生兴趣，因为甚至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其次，在其本专业要求的深度学习之余，分出精力在全然陌生的领域进行探索，确实存在一定压力，浮躁和应付了事也是常见心态。根据笔者在日常接触中了解，选课学生动机无外以下三种：

1. 补足学分。

2. 付出较少精力获得尽可能高的绩点。

3. 提高一些自身“人文素养”。

而“人文素养”这一概念本身相当模糊，按照这种想象，课程所获可能仅仅是增添一些饭局谈资，无益个人能力提升。前人有云“教育的真谛就是当你忘记一切所学到的东西之后所剩下的东西”，那么我们的核心课程究竟能“剩下”什么东西？在笔者看来，首先，严谨的逻辑思考能力、准确的书面语言表达能力、流畅的口头语言表达能力、对他人意见的倾听和对话能力，这些能力是可以在核心课上获得训练的，尤其应当成为讨论课的核心价值。课程结束后，作为知识的内容可能被渐渐遗忘（绝大多数学生并不会以本课程的学术研究作为志业），但上述能力则能保证学生在绝大多数职业领域终身受益。其次，对于悬隔遥远的经典原著来说，必须在一种互动式的、将理论置入我们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对话中，才能获得真切体会。《中庸》有云：“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对大多数人文学术的学术理论而言，其生命力都是根植于每个普通人都能接触、能领会的日常情境的；其意义也都是通过与我们自己的知识语境产生对话才得以呈现的。也正是这种与每个人切己体验相通的联系，才能保证思想讨论的热情，保证言之有物的对话和争鸣。

照此理解，笔者认为，在讨论课的主题设置和讨论引导中，应当尽量引导学生同我们的社会文化语境、知识语境联系起来，触及每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都能接触的思想

¹ “《论法的精神》导读”课程属于复旦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第二模块“哲学智慧与批判性思维”，选课序号 PHIL119014.01。需要说明的是，对其他课程、尤其是理工模块课程而言，基于本课程特质的探讨也许没有直接的普适性，但笔者希望至少能有一定类比和参考价值。

材料，才能保证学生有话可说，而不是照本宣科、凌空蹈虚地搬运书本上的学术概念。

下降与上升：助教对主题的引导

以笔者所在课程五次讨论题目为例，包括：

1. 启蒙精神
2. 人的局限性及其弥补 / 共和国公民的政治品德
3. 平等
4. 死刑 / 政治自由
5. 权力腐败

在大框架下，一方面我们可以深入到各种文本里，做一个历史性考察。但此工作已经有卷帙浩繁的前例，若想在此领域有所寸进，需要大量对一手文本的阅读掌握才有可能。初入门径的本科学生只能对别人东西的归纳或者摘录，然后照本宣科读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要求学生做出自己的思考、对话，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讨论对象和他们自己现实的生活世界不相连。作为助教，此时可以尽量将主题朝具体化方向引导。通过这种具体化，把本来比较抽象笼统的主题，与每个人都能切实接触到的现实生活里的思想材料联系起来，引导学生进入有话可说的状态，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一言概之，先有“自己的意见”，才可能有“不同意见”，而在不同意见的碰撞中，才会出现讨论争辩的空间，才能激起热情和主观积极性。同时，这一策略其实也是做学术研究的基本技巧：避免该把主题定得宏大泛泛而谈，而是要有自己主动细化宏大主题的意识 and 技巧，然后把一个个“小问题”讲透。

因此，在讨论主题布置完毕、学生着手准备讨论稿的阶段之前²，助教就可以开始主动帮助学生“破题”：

提出基本规范要求，告知讨论稿应当体现和避免的东西；

发散思维启发思路，帮助学生找到契合自身的细化主题；

更进一步，这些具体问题在最后又可以上升到哪些思想流派、理论主张，助教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知识储备，给

出一定指引和深入阅读建议，供感兴趣的学生参考。

如“启蒙精神”主题，在笔者组织的讨论课中分化为一系列子问题，包括启蒙运动背后西方社会文化与中国的差异、我们从小接受现代科学教育是否意味着已经经历过启蒙、经过启蒙的现代人为什么会有世界大战、启蒙精神的局限性，以及结合当时热点问题，崔永元与复旦生科教授的转基因论战事件，讨论怎样用启蒙态度理解和看待各方面的表现。又如“平等”主题，细化为：平等与自由何者优先？平等是因其自身有价值，还是作为提升社会总体利益的手段有价值？如果都有，那么当两者冲突时谁更重要？还有很多同学结合自身经历，讨论性别平等、教育平等、动物权利平等等内容，由此联系到当前社会爱狗人士与狗肉节冲突事件，在讨论课上产生了热烈争辩，涉及到事件双方的诉求在何种意义上能得到伦理学辩护，而这种辩护又是如何同我们平等理念的认识联系起来的。笔者借此机会又向参与讨论的同学推荐了彼得辛格等当代伦理学家和动物权利主义者的著作，感兴趣的同学纷纷要求查阅后重新修改提交自己的讨论稿。

因此，助教在讨论中对主题也并非是一味地下降、具体化，还要时刻注意引导学生，加以概括，在适当的时机从纷繁的经验现象中抽离出来，向他们展示怎么把具体的讨论升华到抽象层面，展示我们的案例究竟是如何同书本上宏观概念相联系的。在笔者看来，这种从具体向抽象的复归不仅仅是某种哲学理念，而是大多数人文学科都适用的思想进路。也只有这样，我们的讨论才能获得生命力。

在此，笔者总结了自己历次讨论课以及与学生的问答沟通经验，大致可以列出如下几条通用的讨论稿写作要求和建议：

讨论稿的格式，用核心课办公室下发的学校统一的表头，包括基本信息。（给出一个比较正式的形式要求，有助于促进学生认真对待课程任务的严肃感，也方便后期归档。）

讨论稿写作期望，不是在宏观笼统的层面泛泛而谈一个主题，而是细化到这个主题下某个具体问题，结合自己独特的经验背景，写出你自己独特的想法，来处理这个题目。

请使用如下写作方式：在讨论稿的第一段开宗明义，摆明自己的主题或论点，用清晰简洁扼要的方式呈现它。而整篇讨论稿其实是一步步为了达到这个论点做论证的过

² 在笔者过去一年的助教经历中，起初并没有清晰认识到这一点。有时通过回复学生邮件提问，或是组织讨论课时的开场白，会进行上述引导。总结经验，笔者认为可以形成一套惯例，在讨论主题布置之后、学生着手准备讨论稿之前，助教就以邮件形式给出一定引导，减轻学生对讨论稿形式和内容的无所适从感，效果可能较好。

程。先把自己的论点摆清楚，后面所有材料才有中心，这种写作才能训练一个人有条理的思考能力，避免下笔千言不知所云，做到言之有物。

在你立下自己的论点之后，有必要充分考虑可能存在的相反观点，考虑对方会用哪些理由、哪些具体例证来反驳你；充分考虑你应该如何提前封堵这些反驳，完善自己的论证。真正站得住脚的观点，一定是先经历过最严格的自我怀疑、在考虑了所有可能的反驳并成功回应后，才能得出。对于这样的观点，我们才认为它具有严谨周密的逻辑。

在讨论课上我们建议脱稿表达你准备的内容，所以建议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论证结构，这样你才抓得住自己的要点。

建议不要大段照搬书上网内容，这些东西谁都能找到，你只需引用对核心论点有帮助的内容。如果确实有必要引用，请用双引号注明引用内容，并通过注脚给出引用来源。引用规范可以参考“复旦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规范”<<http://www.gs.fudan.edu.cn/6b/9f/c2806a27551/page.htm>>。

查阅资料时，建议避免百度百科等缺乏审核、不具备引用权威的来源，虽然它很方便。从图书馆网站就能登录CNKI期刊方阵，用中文关键词能搜索到大量与主题相关的论文，关键词搜索技巧可以自行学习摸索。网络上的斯坦福百科全书<<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descartes/>>是很好的学术工具，不仅哲学，许多人文学科的重要概念都有专题论文性质的词条解释。关键是要行动起来，培养自己积极获取和筛选信息的意志和能力。如果学生这么去做，同时也是在培养做任何研究都能用到的基本技能，以后他们会发现这段课程研究的经历甚至超越了他们在课堂上获得的具体知识，终身受用。

此外对讨论内容的具体分析取决于每一次主题，本文不做赘述。

助教对讨论进程的控制

讨论课的具体组织形式各有考虑，笔者并无特别有价值的内容可供分享，但对发言形式有如下想法：应当尽量鼓励学生（在认真准备讨论稿的前提下）脱稿表达。

如上文所述，讨论课是很好的磨练每一个学生口头表达和论辩能力的机会，应避免把珍贵的讨论时间花费在照本宣科做文摘上。脱稿表达的形式可能还存在另一个优点，在这种形式下，表达者更容易抛开无关主题的套话、废话，抛开无关紧要的材料堆砌和语文修辞，抓住自己的核心观点和论证结构。因此在笔者看来，口头表达也是训练思考能力的途径。

助教在提出这种要求的时候，可能存在的担忧是：对于很多学生来说，一旦脱稿就什么也不敢说，积极性大受挫折，甚至可能导致冷场。这就需要循序渐进的引导，对讨论现场的掌控和权衡（包括放松讨论氛围，消解学生做公共表达时的羞怯感），因材施教对每组学生不同秉性的把握，以及最重要的是，讨论稿准备阶段的事先告知，让学生有所准备。

如何制定合理的评分规则

要提高讨论积极性还有很重要一点：让学生感到确实存在一个客观的衡量标准，如果积极按照这个标准努力，就可以预期获得较高的分数。因此首先，我们的标准应当在一开始就向学生公布清楚；其次，这个标准应当是与我们对核心课程价值的理解相匹配的，如此才能把学生对绩点的渴望与我们的教育目标统一起来。

如前所述，笔者认为核心课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用自己的语言进行表达能力，倾听和概括他人意见的能力，进行周密的逻辑论证的能力。因此讨论课上的现场表现会成为平时成绩很重要的一部分。树立这一标准也能强烈刺激学生的讨论课发言欲望。同时，对讨论稿的评价标准，上文已经以写作建议的形式给出，对这一标准的实践，不仅仅是“规则”所能解决的，而需要助教付出一定耐心，深入到每一份具体的文章中进行审查。■

青大学子的感想

——关于第七届通识教育暑期讲习班

2015年7月10日至7月15日，第七届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暑期讲习班，在阔别了三年之后，在北大如期举行。本届讲习班正值首届“中国文化论坛”（香山会议）十周年，十年来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所积累的经验教训值得交流和探讨，中国文化论坛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四校联合举办的本届讲习班，适逢其时。在六天时间中，281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以及一些慕名前来旁听的同学，跟随五位老师研读一系列经典作品。其中就有讲习班的第一届学员青岛大学浮山书院的卢文丽老师。今年卢老师还带着两位青岛大学的同学，冯欢和苗本伦，会同另外三

名去年从青岛大学毕业的同学，如今就读北大哲学系的杨啸尘，在北京工作的李航，以及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周宇鹏，身体力行，共同参与到“作为文化事业的通识教育”中来。

以下是上面几位学员对于本届讲习班的一些感想。冯欢同学对本届讲习班的课程做了极为细致的回顾，杨啸尘同学则立足于自己的专业来谈对本届讲习班课程的认识，李航同学所疑虑的是“通识教育”还是“人文教育”，周宇鹏则回顾了自己负笈求学和心路历程，谈了谈与通识教育的机缘。

第七届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暑期讲习班之行

冯欢 青岛大学

七月中旬的北京骄阳似火，最高温度四十摄氏度。走在北大的校园里，随处可见毕业生，穿着学士服合影留念。我不禁有些惊讶，本以为青大毕业时间已经够晚了。我们上课的地方在第二教学楼，从住所去这里，需要进北大西门，从西往东，经过百年讲坛、图书馆和理楼。和卢老师一同去二教，路上看见一条横幅，写着“我已毕业，您可放心——毕业，一个感恩的节日”。刚刚经历毕业，见过很多类似的话，却觉得这句是最温柔最暖心最贴己的一句。

第一天上午举行开幕式，主办方代表分别发言，回顾各学校通识教育的实践历程，交流对通识教育的思考和探索。北京大学高松副校长提出“专业学习也可以贯通通识教育理念”，这让我印象深刻。这意味着通识教育可以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方式，即“经典研读”和“小班讨论”，应用在除人

文学科以外的其他专业学习中。如管理学的学习，可以读古籍《孙子兵法》、《管子》、《资治通鉴》，也可以读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清华大学杨斌副校长认为通识教育实践中最重要的两点在于机制和老师。我非常认同他的观点。他还提出通识教育可以采取多条道路，并思考能否可以尝试一个专门教理科的班。通过这种追求“极值”，可以探索事物的最大可能性。这让我耳目一新。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想法，突破各种既有观念的限制。我很希望能有这样的尝试。

原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教授作了“关于大学通识教育的一些思考”的主题报告。黄教授访问了十几位国内部分一流大学的院长和几位对人才培养工作有深刻理解的大学校长，还专门就访谈的感受与甘阳老师进行交流，结合工作和访

谈的体会，作的这次讲演。黄教授慈祥谦逊，言语平实质朴，让我觉得非常亲切和蔼。尤其是这短短的讲演背后是他不辞辛劳、辗转千里，虚心听取多方声音和意见，持续思考着中国的教育。这让我心里更加尊敬这位老人。黄教授认为学校是否应该开展通识教育取决于该学校人才培养的定位和目标，并非所有学校都适合开展通识教育。比如综合性一流大学和地方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定位就大为不同。而且认为无论哪种人才培养的定位，都应该互相理解和尊重，不要因为别人的不同而相互批评。同时黄教授认为大学的本质在于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学生，“大学在人才培养定位时，应尊重学生的选择，给学生更多选择的机会”。在通识教育的实践上，黄教授认为“应该看到其本质，而不是纠结于名词之争”。要深化国内通识教育，应该重视课程质量，而非课程数量。

开幕式的最后，甘阳教授关于本届讲习班的目的与安排作了讲话。甘老师认为，十年来，通识教育在中国有了极大的发展，从最初一个比较敏感的词，到如今为大家所熟识。而且此次讲习班是由四所大学（北大、清华、复旦、中山大学）联合主办，并可能形成某种合作机制，而这种合作是基于彼此达成关于通识教育的共识。甘老师还提到开展通识教育一个很大的背景，是大学扩招及整个社会市场化以后，大学跟社会不再有区别，开始变得极端的浮躁和功利化。甘老师希望“通过经典阅读，培养一种能够超越急功近利的心态，能够逐渐克服浮躁的心态。”甘老师接着黄达人教授的讲话，认为某种意义上通识教育都有瓶颈，主要是整体本科教学改革并没有完全推动。中国大学本科课程数量太多，其中没有必要上的课程尤其多，耗费学生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且上了太多的专业课，学生容易受到太多的僵化的束缚。最后甘老师提到中西比较容易流于肤浅，只有对中西都有了充分的了解后，中西比较才有可能，而现在还不是时候。

开幕式上对通识教育的思考和探索让我对通识教育有了更多和更深刻的理解。通识教育就像一颗颗种子，在不同的地方生根发芽，不同水土也孕育出不同的样子。更为可贵的是有着像甘阳老师这样一群园丁呵护它、培育它，而且这个家园会越来越壮大。

接下来的几天都是紧张而充实的上课。课程都是基于经典阅读，而且此次讲习班的课程十分特别，每门课都是跨时期或者中西贯通。比如杨立华老师讲授的《郭象〈庄子注〉》，是郭象与庄子的比照；吴增定老师讲授的《修昔底德与霍布斯》；丁耘老师讲授的《〈论语〉与〈理想国〉》；李猛老师讲授的《柏拉图与海德格尔》；吴飞老师讲授的《〈政治学〉与〈大学〉》。

我本来就对庄子思想很感兴趣，所以很期待杨老师的

课。后来才发现杨老师重点是讲郭象的注，而非《庄子》原文。我以前读《庄子》，主要关注原文，只是将注疏作为理解原文的一种途径，并未想过将注单独研读，也未曾考虑过原文与注疏的关联，特别是出入之处。想来还是自己读书太浅，所以格外用心听课。杨老师分别从时代背景和思想史两个角度切入。首先介绍了东汉末年以来至魏晋时期的社会状况，主要为两大特点：一为东汉以降篡位频发；其二，魏晋时期独特的死亡观，认为死亡可以抹平一切差异，由此价值本身受到质疑，出现价值问题。在名士阶层，如阮籍嵇康等，出现深刻的虚无主义。而这个价值问题只能通过思想层面来解决。“哲学是每个时代最庄严的持守。”然后从思想史角度出发，论及郭象对王弼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接着，杨老师讲解了郭象对《庄子》一书的贡献，他编订的《庄子》为今用通行本，而且他的注解决了《庄子》文本统一的问题。随后杨老师以《庄子》中的《骈拇》、《知北游》为文本，中间串及《齐物论》、《秋水》、《逍遥游》、《胠箧》、《大宗师》等篇，分别讲解“性分”、“圣人之治”和“生死论”三个主题。

杨老师看起来很年轻，讲课风格幽默风趣，多用身边事例，还不时自嘲一下。讲到“以无为本”为一种根源性否定，比如雕塑是通过将多余的石料否定掉而成，他就顺口自问如果说我们都是根源性否定而来，怎么没把我否定成梁朝伟的样子呢？”其实杨老师还是有点帅的，他是我一个舍友的男神呢。讲课中，他也常引入儒家思想与之对照。在讲解“性分”时，郭象《庄子注》中万物各足其性，社会流动性断绝，有差异却没有高低。在儒家中，“教”是其核心思想，“学”与“教”使社会保持充分的流动性，而其实这样的社会才更为稳定。在讲解“圣人之治”时，道家推崇的“无为政治”，即君无为而臣有为，首次出现是在《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这也从一点说明了孔老同源。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杨老师提出的“适道之欲”。“适道之欲”即肯定合理恰当的欲求，也正是这“适道之欲”促成社会建立起稳定的秩序。另外还有杨老师认为所谓“自然”就是“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及“不得不然”。“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即万物无所凭借和依靠，自生而已。而“不得不然”为何为“自然”，我没有明白，还需要细读和思考。到课程的最后，由生死论，讲到“日新”，杨老师说“充分地认可自己，实现自己，承担自己，人生就会无比饱满、幸福”“没有在这一刻之外的其他时候”“能把此时此刻当成目的”，当时有些困意的我听到这样的话有觉惊雷，顿时清醒了许多，我不禁愧疚难当。心里反问，人生难得，我是否充分地度过每一分每一秒？讲课中，杨老师提出了一些问题。道家认为世界的本源是元气，万物的生死就是元气的聚与散。我们不禁问，这元

气是如何存在的？同样的气是怎样聚散为不同的事物？杨老师并没有解答。而且在讲性分时，郭象认为万物各适其性，得其逍遥。反之，不安其性，就会增添烦恼和痛苦。考虑其社会作用，郭象以此来劝告有逆天之心的人。我觉得这样逍遥的状态很美好，可是怎么知道自己的性分是什么？哪些是安其性？哪些又是反其性呢？杨老师的课程和《庄子》都没有给我答案。不过，一个很好的课堂大概就是如此，老师激发学生去思考，去探寻，去提问。

吴增定老师说话带点南方口音，但这反而增加了他语言的幽默感和趣味性。我一听他说话，就喜欢，觉得这个人一定很有意思。刚一上课，他就说“我和杨立华老师没有任何共同点。你看，杨老师是做中哲的，我是做西方的；杨老师长得那么帅，我长得这么……是吧。除了什么呢？除了我们都不会做PPT。这是我们唯一的共同点。”顿时课堂轻松活泼了不少。吴老师讲课语言平实，真诚直白，条理清晰，上课开始他就跟我们交代了他的讲课计划，主要围绕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把修昔底德和霍布斯联系起来；另一个是为什么讲修昔底德。这两个问题也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之前对这两个人只是略微知道而已，了解得并不多。读了文本，发现两者都谈及战争和国家。接着吴老师依次解答了这两个问题。首先他概括性地提出修昔底德和霍布斯在三个方面有联系，尤其是有着内在紧密的哲学关联：二人都在思考“人类世界为什么会有战争和冲突？”，并且都认为战争植根于人性之中 *eros of glory*，即荣誉感永无止境的追求。但二人又有根本分歧：修昔底德认为冲突是人的本性，无法在根本上消除；而霍布斯认为只要对人性有更科学的认识，并有科学的方法，冲突就可以消除。然后吴老师分别具体解读文本，先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解答第二个问题。再读《利维坦》及霍布斯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写的译序，从文本中详细分析修昔底德和霍布斯思想的异同，最后总结其联系，认为修昔底德对霍布斯的影响非常有限，且主要在霍布斯早年思想。而对霍布斯影响最大的是伽利略，以科学方法来证实经验，并思考能否在人文思想领域也以科学方法加以确定。霍布斯认为只要有足够多的知识就可以认识人性，甚至可以改变它。这种思想从某种程度来说霍布斯是个“现代人”。这正反映当时启蒙运动的特点，重视科学和理性。

丁耘老师上课首先和我们说：“我给你们上课总觉得很特别，在坐的各位很多以后都可能成为我的同事。我们这次上课是学教书。”接着交代了教学安排。关于读书，丁老师认为学习时不适合进行比较，更宜读一本书时只专心读这一本，如此更为纯粹。学到三十岁时，有些心得再进行比较。之前甘阳老师也有类似的想法，让我很受教。他没有急着开始讲文本，而是先讲读经典通法：四重证据法，

即内证、近证、外证和亲证。接着介绍读《论语》别法：理其伦；通其时；会其意；合其教。他提出，以往众人读《论语》，多重视“语”，即每章内容，却鲜有人关注“论”，即“纶”，编者的用意，孔子教学的顺序。而《论语》各篇章结构正是构成孔子的教学世界。这让我感到惊喜，竟然可以这样读《论语》。随后丁老师开始解读《论语·学而第一》中各章。丁老师讲课的PPT做得很好，他讲的《论语·学而第一》让我获得很多新知。丁老师首先重点解读了《学而》第一章，从结构上来看，此章与此篇末章、上半部《论语》末章、整书末章都相呼应，由此可见，整部《论语》以一字统之：“学”。而且还仔细对比了“说”和“乐”，是不是同一种意思？如果意思相同，为何还要重复说呢？丁老师旁征博引，引庞朴解“说”为“仁形于内”，内心知，而“乐”为发散在外。接着分别讲解有子的“孝悌”功夫路径与曾子的“三省吾身”功夫路径，并重点强调“忠信”，认为“信”即为《中庸》中的“诚”。丁老师解读每一章，甚至其中一字，都会前后文对照着读，即为“内证”，将一篇视为一个整体，细细考察章与章之间的联系。这也是读书的一种新法，不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第二堂课丁老师讲解《理想国》第六卷第七卷。《理想国》我捧起过许多次，却没有一次完整读过，总是很难理解这本书。因此听课的效果不是很好。丁老师首先介绍了《理想国》全书的缘起与结构，然后解读第六、七卷，依次讲解《理想国》中三个非常重要的比喻：日喻、线喻和洞喻，重点解读洞喻。洞喻中因为有情节，比较容易清楚这个过程。初次读到这个比喻时，有种恍惚的感觉，不知道我现在所处的世界是不是也是一种墙壁上的影像。当你怀疑你所处的世界是否为真实时，这种感觉有点可怕。可是丁老师的分析里，洞喻有着多种不同的解释，洞穴中所有事物也有着全新的象征意义。比如“火”在可见世界里可以相当于理念世界中的“日”，也可以把“洞穴”理解为理想国，而“火”则为律法，哲人王的回洞即是给城邦带来正义。这里丁老师提出一个很有趣的说法：“转身”。哲人王的教育即是其灵魂的转身出洞，而哲人王统治城邦即是其再转身回洞。生活中，我见过无数次转身，有舞蹈的优雅，有海阔天空的豁达，有别离的悲伤，还有鱼的短暂记忆，却从没想过哲学中的转身有着这样震撼人心的魅力。丁老师还详细说明了哲人王教育的具体内容，主要为六门：算术、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天文学、和声学 and 辩证法。我们听了，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丁老师说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就是柏拉图式的教育，而不是孔子式的教育。论及辩证法，丁老师认为它是对意见的摧毁，是知识的重建，并建议三十岁以后再学辩证法，因为三十岁之前学辩证法会像小狗一样撕碎一切东西。这不禁让我对辩证法有了同以往不一样

的看法，它是有一定破坏力的，在我们具有一定的辨别能力和成熟的价值观前，不能随便使用。

李猛老师很受同学们的喜爱，课间休息时很多同学拿着他的新书《自然社会》去签名，私下同学们称他为“猛大”，暗含着对老师的欣赏和敬仰。他将柏拉图与海德格尔联系起来，是因为他认为海德格尔为现代人可以怎样借鉴希腊哲学树立了一个榜样，他想探寻海德格尔对传统的看法在现代有着怎样的意义。他先阐明了海德格尔的两条解释原则，一为从自明的到被遗忘的、被忽略的；二为通过亚里士多德理解柏拉图。首先以海德格尔的“洞穴”解释为主题，细读《路标》文本。海德格尔将“洞穴喻”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人在洞穴中的处境、洞穴内失败的解放、人真正的解放、被解放的囚徒回到洞穴。李老师依次详细地解读了这四个阶段，每个阶段讨论的问题都不同。第一阶段阐明人的双重性：“无蔽”与“被遮蔽”；第二阶段讨论“真理”；第三阶段解释“理念”；第四阶段重新讨论“真理”。李老师认为真理问题是洞穴比喻的真正内容。李老师经常举例来说明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比如以“千足金”、“千足币”、“千足人”来说明真的概念与我们日常经验有着相当大的区别。无论真假，都以某种方式呈现为真的，他举例说“如果有人告诉我，和我交往这么多年的吴增定老师不是吴增定老师，是吴增定老师的孪生兄弟，是吴增定老师一撇，但我认识吴增定老师，全依据认识他之后的历史中他的行为。所以呢，他对我而言还是呈现为真。知觉没有错，而是从直觉迈向判断，出现了错误。之前我初次读到的能够简单理解的洞穴比喻，在海德格尔的解释下变得复杂深邃了许多。即使是在李老师很好的讲课中，我还是有许多难以理解的地方。虽然不能完全明白讲课内容，但还是受益匪浅，我为海德格尔式地解读经典而惊讶，也深深佩服柏拉图、海德格尔和李猛老师。

吴飞老师作为讲课的最后一位老师，他自己在授课之初就笑言：“前面的几位老师都非常精彩。用《中庸》里的几句话，杨立华老师是‘极高明’，吴增定老师是‘道中庸’，丁耘老师是‘致广大’，李猛老师是‘尽精微’。这几点我都做不到，但是我想通过对《政治学》和《大学》的一些解读，穿起他们所讲的古今中西的几个文本，争取能够有一个总结和诠释的效果。如果用前边吴增定老师的说法，他们四个都是耶稣基督，是《四福音书》里的耶稣基督，现在四个耶稣都已经上了十字架，应该是保罗来做诠释了。”吴老师的总结既精辟又带着些活泼，几位老师也不时地在课堂上互相开玩笑，爆料，这让课堂氛围轻松了不少。吴老师先以黄元同《示诸生书》引出《大学》，简要介绍了《大学》与《政治学》的地位，认为两书可以帮助我们最简便的理解中西学问的大纲。首先详细研读《政治学》，提出

政治学就是研究如何追求人类最大的善的学问。《政治学》的问题根本在研究人的美好生活，因此是基于对人性的基本理解。人的理性灵魂要充分实现，就要在城邦当中才能实现。因此城邦具有很强的目的论因素。接着依次讨论了家庭、夫妻关系、奴隶和女人、家庭的形成、从家庭到村落、村落与君主国、君主制与城邦等多种事物。

第二堂课主要讲《大学》，此书篇幅不长，且都为精要部分，吴老师逐字挨句地解读原文。首先重点解读第一句，也即《大学》的三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吴老师先介绍了古代的大学之制，大学是精英教育，主要针对将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然后就每句原文分别介绍郑注孔疏及朱子注，有时还介绍段玉裁的解释，并加以对照。《大学》年代久远，各朝历代皆有不同诠释，且易有出入，有时句读亦有不同。比如“明明德”，郑注孔疏都为“彰显其至德”，“明德”为一词；朱子解释为“去其人欲之蔽，具众理而应万物”；段玉裁的解释中，“明明，斤斤察也。”“明明德于天下”，谓大明极于天下，非重言明者，不足形容其积累之盛。”不同版本的诠释使《大学》的含义更为丰富深刻。我之前读《大学》都只读了朱子的注，不曾想还有这么多其他的注疏。当然面临多种诠释，便有辨别对错与选择难题。在有后人大改动的地方，明显古本更为可靠，更加接近原意。最后吴老师总结了中西文明的架构，并以两张饼图形象地表现出来。并指出郑君以《周礼》为文明架构，以《孝经》统摄群经，这是汉唐文明的主干，至王安石变法而终结。朱子后以《大学》确立了新的文明架构，以《四书》统摄群经。清代汉宋兼采，即由汉郑学以通经，由宋朱子立本。

每位老师的课程结束后，当天晚上都有一个半小时的小组讨论。小组讨论有一位助教，11人左右组员。考虑到讨论效果，组员全部为博士及以下学生。由于小组成员彼此不相熟悉，讨论氛围通常在开始时比较低落。随着讨论的进行，话题的展开，讨论效果越来越好。助教的作用非常重要，既担任主持人的角色，调控讨论进程，有时也要担任老师的角色，当小组讨论的问题无法得到解答时，大家通常会向助教寻求答案，有时也会向高年级同学寻求帮助。讨论的主题或范围由老师拟定，老师再与助教沟通。我报名参加了两次讨论，分别是杨立华老师和丁耘老师的课程。杨老师的课程讨论是这次讲习班中的第一次，助教和组员对于如何进行这个小组的讨论都不是太清楚。起初进程很慢，没有可提出的问题。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来自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李天新，她现在正念大一。她总是会提出一些问题，这种年轻、爱思考、敢发问的状态让我很欣赏。通过这次讨论，我重新梳理了一遍白天的课程，理出杨老师的讲课线索，对课程内容有了比较清晰的整体认识。

丁老师的课程讨论是第三天，这次看起来大家都比较熟悉讨论的方式了。于是当助教说明讨论《论语·学而》后，大家发言很踊跃，也不再拘谨和扭捏，而且直指问题。可能因为话题熟悉，可言甚多，我渐渐发现有几位同学很少耐心倾听别人，总是在想自己如何发言。而且谈及《论语》这种古籍经典，总有人不免急迫地谈及它的现实价值和可行性。讨论常因为一人言文本原意，一人言从现代视野观看如何地不合理而争论。多次陷入这种争论后，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胡燕明确地指出这种问题，认为阅读经典不应以今人之眼，也不应功利性地看待经典的价值，同时在谈及批判地看待经典时，批判之前首先应该深入地理解文本，这也正如丁耘老师前面所言。“独学则无友，孤陋则寡闻。”小组讨论的存在意义很显然。然而如何进行有效的讨论仍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最后，在讲习班学员座谈会上，十几位来自不同学校、地区的学员代表与大家交流自己的体会。卢文丽老师作为学员中的老师代表上台发言。卢老师特地着一身雅致的旗

袍，戴着两只珍珠耳环，显得既亲切可亲又光彩照人。我在座位上认真地给她拍照，生怕错过这重要而珍贵的一刻。她随着通识教育的脚步，从见证者、受益者和践行者三个角度述说自己与通识教育的不解之缘。她是第一届讲习班学员，而且七届讲习班中参加了五届，另两届也是因为非常原因而无法参加，这让我肃然起敬。如果不是从内心认同通识教育理念，不是心甘情愿地去践行，怎么会这样“死心塌地”、一路相随？卢老师说到她是通识教育的受益者，念及己身，我又何尝不是？从母校青岛大学浮山书院博雅班到中山大学博雅学院，从商学院国际商务专业到哲学，这四年的成长怎么离得开通识教育？正如一句歌词：“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我希望而且相信通识教育能成长得更为茁壮，惠及更多的学子和同道中人，甚而影响更广大的群体。

这期讲习班虽然结束了，但是通识教育的践行将更加坚实和有力。诚如甘阳老师所说，“回去重读文本，自己去阅读，去思考。”■

“通识教育，立足于自己的专业，超出自己的视野”

杨啸尘 北京大学哲学系

通识教育讲习班已经走过了七届的历程，我却第一次参与到其中。去年我三生有幸来到北大哲学系念书，今年近水楼台，虽然没有成为注册的讲习班学员，却旁听了大部分的课程。十年树木，也树了通识教育这块值得纪念与令人欢欣鼓舞的碑。作为一个与讲习班初次邂逅的学生，我只通过回顾谈两点粗浅的感想。

这次丁耘老师讲了论语，我也引句论语。先进第二十六章曾点有言：“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在这里他描述了理想生活、集体旨趣的一致，我常常觉得一个集体热情百倍的投入一个工作、事业的时候，要么是有物质的激励，要么是有精神上的追求，通识教育的事业是纯粹精神上的追求。在现今社会浮躁的大背景下，这件事情无疑给了读书人一个坚持下去的理由，也给予了他们一个确定的方向。我在这次讲习班中首先感受到的就是这种氛围，带头的人方向明确，老师们备课认真，学生们认真聆听，课下还不断进行讨论。氛围是被大家营造的，这种氛围同时也营造出了一种独特的小环境，也正是这种小环境慢慢地在改变

大学的大环境，改变社会的大环境，使得我们的大学渐渐地静下来，让更多的同学们愿意静静读书、静静地深入经典之中。

接下来我所体会到的是哲学或哲学系在通识教育中所担当的重要角色。这次讲课的五位老师都来自哲学系，其中有四位都来自北大哲学系，他们是出了名的“四君子”，不仅以他们的学养与知识，更以他们的人格魅力游弋于那三尺讲台。气质从来都是由内而外的、在不经意的言谈中展现出来的，几位老师的气质更是如此，他们的人格魅力迸发于他们的幽默，这种幽默是知识的流溢，是无损于自身的生成。从课后大家总结的一些金句上可以窥见一斑，从微言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老师们的睿智与他们给我们带来的关于文本的深刻思考。这次讲习班有人反映讲的几个题目都比较难，而且又是哲学系的老师，内容普遍挖的有些深，大家都觉得哲学性太强了，甚至专业性太强了。我的理解是这与讲习班的性质有关，毕竟时间有限，要在六个小时内讲出题目的要义供我们思考，密度便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些课程必然不会是当堂就能消化的，况且在课程开始之

前我们就已经对文本有了初步的了解，课后的讨论亦可以帮助我们探讨他们结合文本提出的问题。李猛老师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是十分精当的，他说文本可以带我们回到原始的问题，专业化的知识带给我们的只是碎片化的理解。通识教育之本色就在于它的博雅性质，而非专业化的理解，把哲学当成专业，那么哲学就成了关注问题的模式，这本来就是有失偏颇的。经典带我们回到了原始的问题，如由洞喻而来的真理问题，你不能只说它只是个哲学问题，它更是个人生议题，若硬要来个学科上的划分，那也是每个学科都要关注的根本问题，这些问题都是通识教育所要关注的问题，在这点上，哲学关注的很多问题都与通识教育不谋而合和了，所以说这也正是哲学本身的一个特点，更

是人文教育的一个特点，我们始终关注的都应该是切乎人性的问题。所以单单从关注问题的角度讲，哲学的反思对通识教育是大有裨益的，只是我们没有经受过哲学训练的同学无法一下子理解诸位老师某些细致的分析罢了。对于那些想更深理解这些问题的同学，这些分析便是必要的了。

通识教育的博雅性质告诉我们，我们的专业化培训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以有用处为导向的教育，而博雅便是要沉淀掉这些专业化的指向性，剩下的便是“无用”的人文教育的精华，这便是对于心性的陶冶，对于人性的反思，对于根本问题的审视。我想以上便是甘阳老师这句话的题中应有之意：“通识教育，立足于自己的专业，超出自己的视野”。■

“通识教育”还是“人文教育”？

李航 前青岛大学学生

第一次听到“通识教育讲习班”这个名词是大一那年甘阳老师来青大讲座提起的，也是在那课堂上我知道了甘阳、刘小枫、通识教育等等一系列名词。赶巧，第七届通识教育讲习班今年开课了。毕业一年，工作地点又离北大不远，也就蹭了几堂课。由于工作关系，几天的课程我也只是断断续续听了一点皮毛。虽感慨良多，但羞于自己见解颇浅，也就不拿出来卖弄了。在这里，仅通过这次讲习班谈谈我对通识教育的一点粗浅的看法。

通识教育在中国缘起于十年前的那次中国文化论坛，会议名字叫做“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按甘阳老师的说法，本来是应该叫做“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自那次会议开始，以甘阳老师等一批学者在中国大学里掀起了一场“通识教育”的改革，中大的博雅学院、清华的新雅书院、北大的元培学院包括我们青大的浮山书院等等，都是通识教育改革的果实。

这十年来的通识教育，以“暑期班”也就是通识教育讲习班为代表，大家都走在阅读原典的路上。用甘阳老师的话说，这些知识以当前的社会价值评判都是“无用的知识”，而我们的目的是通过阅读经典，克服大学里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

回过头来，我们重新思考“通识教育”，也就是 liberal education。Liberal 是自由的，开明，所以我们也常把它译作“自由教育”、“博雅教育”。也就是说，大学更应该提供给大家一个多元化的、自由的教育，“在现代多样化的社会中，

为受教育者提供通行于不同人群之间的知识和价值观”。

我很认可今天的“通识教育”，这给中国大学注入了一种新的价值观，给浮躁的大学教育降了降温，特别是对文科的教学方式产生了很大的推动。可通识教育应该是多方面的，不仅仅只是文史哲。这是“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而不仅仅是“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柏拉图有那么多传世著作，可他同样有“柏拉图立体”这样对几何问题的思考；墨子有“兼爱非攻”这样的政治哲学思考，同时在物理、几何学上也有很高的造诣。反观我们今天的“通识教育”，是不是走得有些狭隘了？文史哲是我们所要涉猎的，相对论、量子力学是不是也应该有所涉猎？我们是“通识教育”而不是“人文教育”，是针对于基础学科的常识教育而不仅仅是某几个学科。我们所提倡的是“无用的知识”，数学、物理等等也不都是产生经济效益的“无用的知识”吗？他们难道不应该是“通识教育”所要涉及的范围？中国学生对于“文科”、“理科”的争执由来已久，如若“通识教育”也还拿文理科来束缚自己，未免有些太不 liberal 了吧。

当然，诚如甘阳先生所说，通识教育是一个 10、20 年才能初见成效的过程。十年的中国通识教育能走到今天已经是前辈们穷其半生之力才有的成果，我们能坐在北大的教室里聆听老师们的教诲也来之不易。至于通识教育下一步究竟怎么走，那应该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同思考的问题。■

我与“作为文化事业的通识教育”

周宇鹏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

时隔三年，又一次来到北京，参加第七届通识教育暑期讲习班。同样是北大，同样是炎夏，但毕竟时隔三年，期间虽说不上饱经忧患，但心境终究也有了些许变化。旧地重游，对于此间风物的新鲜劲儿是难觅一二了，但对于通识教育，却是当年情，又添上新鲜。

本届讲习班有种特殊的意义，便是甘老师在开幕式上一开始便点明的，从第一届中国文化论坛年会开始，通识教育至今已走过了十年。我生也晚，未能幸如卢老师从其发轫便躬逢其盛，但我自从与之结缘，前后参加了两届讲习班，求学的足迹，也从甘老师多年来支持鼓励的浮山书院，到了甘老师心血所寄的博雅学院。去年学院的毕业典礼上，甘老师寄语师生，“创造中国大学教育的新传统”。今年则是再“再造中国崛起时代的文明”。这些都是大家之言，是一位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对于我来说，这些自有其意义所在。但我更愿意从一个普通的受教育者的立场出发，谈谈通识教育之于我的影响。因为回顾这四五年来的，我的整个负笈求学和心路历程，其中的重要转变，都与“作为文化事业的通识教育”有莫大关系。

初入大学不久，便察觉到课堂上满是怨气和段子。怨气源于过去半个多世纪中的血雨腥风，段子则是当下这个娱乐时代的特色符号。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渐渐对自己所受的高等教育心生失望。以一名受教育者的身份，开始思考大学之道、教育之本。然而不过是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的一通胡思乱想，抱怨之外，并无进取。所幸这种茫然状态没有持续太久，大一接近尾声的时候，因了浮山讲堂的机缘，聆听甘阳老师谈“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转眼四年多过去了，讲座内容是回想不起来多少了，但因为当时整理讲座录音时反复听的缘故，之后只要看到甘老师的文字，便像是亲口在讲一样，以至于后来真的坐在了甘老师的课堂，耳闻目睹，恍然如梦。也是从那次浮山讲堂开始，通识教育作为“文化事业”，成为了我生命中照亮幽暗洞穴的光。蓦地想起《桃花源记》的几句话，之前失望时犹如“林尽水源，便有一山”，刚开始的大学生活便有了种山穷水尽之感，而等到得闻甘师之言，虽未能豁然开朗，但终究如武陵人之发现：“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对于思想的人来说，这一丝光，便有如米开朗琪罗的画作《创造亚当》中的那

将要触及的指尖。但也是这一丝光，同时也意味着循光而去的人不仅要“不畏险远”，还要“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

通识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和实践，十年来已经取得了更广泛的共识，进行了更为可行的尝试，积累了很多的宝贵经验。通识教育所倡导的经典阅读，全然不是那些课堂上只顾自己痛快的满腹牢骚和取悦学生娱乐自己的段子可比拟，而经典本身自然闪耀着的人类智慧的光芒，也非简单的左右之争、雅俗之争可相提并论。通识教育虽然走过了十年的漫长历程，但正如甘老师所强调的，这一切只是个开始。我们时代最大的问题就是急功近利。十年前的大学就已经难以洁身自好，十年来这种情况即便没有更糟，但也并未变得更好。这源于整个社会风气。移风易俗，向来不是一朝一夕。前辈学人十年前力倡通识教育，今日回首当年，更觉其用心良苦、用力之巨。无论是创造传统，还是再造文明，都要凝聚共识、起于累土。改变只能从一点一滴做起。通识教育便是要自觉致力于这一点滴的培育，以期有朝一日，涓滴意念能汇流成河。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说：“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从这个角度讲，通识教育要培养精英还是面向大众——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大众学生——的争论，是要醉心于道问学还是致力于尊德性，是“通识教育”还是“人文教育”的疑问，都可以在教育发展的这个阶段缓一缓。《论语》有言：“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古时所谓“精英”与“大众”，“行有余力”之“行”是一致的，如是而“行”被认为是人之为人之所在，用于区别的“文”只是锦上的花罢了。而今人所谈“精英”与“大众”，却将顺序做了颠倒，以“文”为质，却不管在“行”上，是不是一样都是侏儒。以上这些是我对通识教育的一些小思考。

作为通识教育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我的处境，一如发现山上的小口之后“舍船而入”的武陵人。先贤告我，“复行数十步”，便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而我走了许久，依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刚进入这个“仿佛若有光”的小口，走在“初极狭，才通人”的路途。但心之所向，一步步走去，便是归途，而非流浪。■

大学国际化就是英文课和洋面孔吗？

秦春华 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

在评价一所大学的质量时，国际化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在各种各样的大学排名中，外籍教师和留学生的数量一直被视为一个关键性的影响因素。在招生宣传中，国际化也始终是各大学突出强调的重点。中外联合办学、联合培养、双语教学、国际实验班、交换学生项目，等等，形形色色的涉“外”项目成为各高校吸引学生报考的重要砝码。近年来香港地区的大学之所以备受内地学生青睐，一个重要原因据说是因为和内地大学相比，香港地区的大学更为“国际化”一些——事实上，它们就是这样宣传的。的确，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所大学里要是没有一些洋面孔和英文课，简直就不能被视为是一所现代化的大学。正因为此，许多大学都将国际化视为办学和人才培养的战略目标，并为之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但是，对于教育国际化的真正含义，我们还需要考量和深思。

一、我国教育国际化流于狭隘和片面

一个首要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教育国际化？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称一所大学为国际化的大学？是指校园里存在着一些来自欧美的洋面孔吗？在许多人的意识里，来自亚非拉的面孔似乎还不能算作国际化的体现，也不能被视为国际竞争力的体现；是指课程表里增加了一些双语教学——实际上是英语教学——的课程吗？许多大学现在都将双语教学视为国际化建设成就的重要体现；是指扩大交换学生的规模吗？许多大学都以能够为学生提供海外交流项目来吸引学生的眼球，有些大学甚至宣称将为所有学生提供一次在校期间出境交流的机会——当然指的是欧美发达国家，至少也是香港地区，这就是为什么说的是“出境”而不是“出国”的原因；是指和国外大学建立起合作交流关系吗？是指每年邀请国外大学教授来校发表演讲吗？甚至，是指“走出去”，到国外去开办分校吗？等等。你很难说上述这些方面不是国际化的体现，但如果说国际化就是指这些内容，似乎也难以令人信服，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紧随其后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大学要实施国际化战略？最简单的回答当然是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大学都不可能关起门来封闭发展，必须要“请进来，走出去”。但这种不言自明的“必要性”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说，国际化教育可以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使他们能够通晓国际规则，未来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也就是说，大学所培养的人才不仅要满足来自本国、本土

我们对国际化的上述理解实际上只不过是“西方中心论”在教育领域的另一种体现而已。

化的要求,而且要适应国际间产业分工、贸易互补等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新形势需要。这可能是大多数人比较认同的一个回答。当然,还有一些大学推行国际化纯粹是为了装点门面,增加对学生的吸引力。比如,有些大学宣称和美国某所大学建立了联合培养项目,可以为學生提供出国交流的机会,但实际上只需要美方同意可以在招生宣传中使用其校名即可。说的更直接一点,他们之间可以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教育合作,唯一需要做的是就如何分钱达成协议。

仔细分析上述现象,不难看出,目前我们所理解的国际化可能是狭隘和片面的。当我们在谈到国际化的时候,我们往往不自觉地指的是西方化、美国化、欧洲化和英语化;我们所热衷于推行的国际合作交流培养项目,往往下意识地集中在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大学;我们培养学生具有的国际视野,往往指的是了解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视野;我们教给学生掌握的国际通则,往往指的是由美国和欧洲国家所主导的那些国际组织的规则和惯例;我们认为一个学生所具有的国际竞争力,往往指的是其在大型跨国公司、金融机构、学术机构和国际组织中的竞争力,往往意味着他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谙熟美国人和欧洲人的各种习惯,懂得怎么样和他们打交道,能够完全无障碍地处理和他們之间的各种事务。

自鸦片战争以降的一百七十多年里,除了短暂的封闭阶段外,我们在文化心理上对西方一直处于一种事实上的弱势地位。即使在今天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有了空前发展的情况下,很多中国人仍然对美国 and 欧洲充满了神秘和向往,“出国”在许多普通中国人社群中仍然是一个令人艳羡的行为。我们对国际化的上述理解实际上只不过是“西方中心论”在教育领域的另一种体现而已。

二、国际化不能只是瞄准美国和欧洲

但国际并不等同于美国和欧洲。在这个广袤的星球上,除了美国和欧洲之外,还有俄罗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等。问题是目前在我們的本科教育中,学生的眼睛里可能只有美国和欧洲,甚至只有美国。俄罗斯现在正在发生什么?印度的竞争力在哪里?日本未来的走向是什么?巴西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中东和阿拉伯呢?关于这些问题,除了少数专业领域的研究生之外,据我的不完全的观察,许多本科生对此要么知之甚少,要么所知为误,甚至一无所知。至于像越南、菲律宾和缅甸这些国家,我们的学生可能从来想都没有想到过要去了解和它们有关的知识。但问题在于,它们可能就是未来二三十年内要和你直接发生密切联系的国家。在这一点上,也许现在的我们还不如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在小说《人生》中,高加林虽然连

饭都吃不饱,却仍然在和他人充满激情地辩论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的问题。在现在的学生看来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它们和你有一毛钱的关系吗?

我们可以不去想这些问题,但不等于别人也没有在想。我在MIT(麻省理工学院)访学期间,旁听了一门博士生的高级研修班。上课的形式是通常的小组报告加讨论,并无特别之处。吸引我的是小组报告的内容。有一个小组的三名学生刚从印度调研归来。在那里,他们用了大约三周的时间,详细考察了印度当地治疗儿童唇裂的情况,搜集了大量第一手的数据和资料。实际上,这只是其中一个小组的工作。选修这门课的学生——他们本身就来自好几个国家和地区——被分成了几个不同的小组,有的去巴西,有的去阿拉伯地区,也有的去中国。主持课程的教授告诉我,MIT的教育是要让学生通过亲身实践理解发生在真实世界中的事情。国际化的目的是要给学生提供机会,帮助他们了解那些和你不同面孔、不同肤色、不同服饰、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习俗和不同思维方式的人的真实想法以及与你之间的文化差异。

实际上,不仅MIT是这样,几乎所有的美国顶尖大学都极为重视对文化差异的研究和教学。他们认为,文化差异对于人的思想和行为影响巨大,它会导致对同一件事情的完全相反的看法。比如,芝加哥大学在某一堂课中讨论了美国在东亚的政策问题。教授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对于同样一个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中国、韩国和日本的态度会完全相反?在二战中遭受侵略的中国、韩国等国家坚决反对日本领导人的参拜,因为在靖国神社中供奉了许多二战中的甲级战犯,参拜意味着日本政府企图否认和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继而挑战二战结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但在日本人——而且是日本民众——看来,不管一个人生前做过多少十恶不赦的事情,死了之后都应当受到祭拜,以免成为孤魂野鬼,这和对于战争的态度无关。所以很多日本人一方面承认二战的侵略历史,另一方面又在公开参拜靖国神社,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中韩两国对于靖国神社参拜问题如此敏感,而中韩两国也无法理解日本人看起来如此相互矛盾的行为以及日本政府官员执意要参拜靖国神社居然还能得到民意的支持。这就是无法沟通、理解和认同的文化差异。为什么美国人对朝鲜非常头疼?因为信息封锁,它对这个国家几乎不了解,不清楚朝鲜人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也就难以判断朝鲜的下一步动向。

三、国际化的真正意义在于对世界的清晰把握

研究文化差异是美国本科教育,特别是通识教育的重要特点之一。在哈佛、耶鲁、芝加哥、哥伦比亚等顶尖大学的核心课程中,关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种族、

对文化差异的研究和关注不应当仅仅只是少数专业研究人员的工作，而应当是美国顶尖大学本科生必须具备的国际视野和基本素质，是通识教育而非专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同文化的课程占据了很大分量。这些小型的讨论课通过阅读文献和讨论的方式，帮助学生了解这些国家的历史、现状和人们的思维方式，并预测和判断它们的未来走向——学校还会提供多种机会，帮助学生进行实地体验。因此，和我们的国际化走向恰好相反，美国学生喜欢去的大多数是那些他们不了解和感到神秘的地方。这是美国本科教育的目的。美国顶尖大学认为，他们所培养的学生未来会成为美国和全球的领导者。他们必须要对美国之外的世界有清晰准确的把握，才能有效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如果学生能够在本科阶段就深入地了解和理解了各种各样令他们感兴趣的文化差异，这样，当他们未来可能和这些国家的人发生联系和接触的时候，就会降低交易成本，减少误判的可能性，增加成功的几率。也就是说，对文化差异的研究和关注不应当仅仅只是少数专业研究人员的工作，而应当是美国顶尖大学本科生必须具备的国际视野和基本素质，是通识教育而非专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学术界对此也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比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其实最初是奉美国政府之命，为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所作的调查分析报告，但却成为二战后美国学生了解日本的经典著作。而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在退休之后倾十年之力写作《邓小平时代》的直接原因，也只不过是“帮助美国人了解在亚洲发生的关键性发展——中国”而已。实际上，

美国全部汉学家的工作都是为了帮助美国人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的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顶尖大学的国际化从来都是实用主义的，既不搞花架子，也不装点门面，必须要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实际作用，产生实际效果。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我们常常自认为中国是美国最重视的国家。的确，美国重视中国，但不要以为美国只重视中国。在亚洲，它极为重视的另一个国家是印度。2014年3月，芝加哥大学印度中心在德里成立。而谷歌、苹果、微软等美国大公司早就在印度设立了大型研发中心。美国大学生去印度的也很多。相比之下，对于那些未来几乎肯定要和印度人打交道的现在的中国本科生而言，你对这个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的近邻又了解多少呢？你知道他们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吗？你懂得他们的宗教、文化和习俗吗？你能够准确预测他们下一步的行动吗？

不仅仅是印度，另外一个我们已经很陌生的国家是俄罗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习俄语的学生越来越少，原本数量有限的学生在毕业后也纷纷改行做了其他工作。当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合作关系越来越紧密的时候，俄罗斯的形象却在中国青年一代的心目中变得越来越模糊。这个问题现在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以免二三十年后我们可能不得不为今天的短视而付出代价。■

北京大学通识教育 核心课程简介

经济学原理 张维迎	圣经释读 高峰枫
化学与社会 卞江	西方美术史 丁宁
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 阎步克 叶炜	大学国文 漆永祥 姜涛等
中国古代史（上） 叶炜	西方政治思想（古代） 李猛
艺术史 朱青生	孔子与老子 王博
伊斯兰教与现代世界 管涛	文学人文经典（近现代） 张旭东
欧洲文学选读 Tom Rendall	

经济学原理

经济学是有关人的行动和社会合作的一种理论模型和思维方式。本课程将系统介绍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

张维迎

课程内容将特别关注以下问题：经济学如何分析人的有目的的行动；理性人如何做选择；市场如何协调个人的选择实现社会的合作共赢；如何衡量资源的有效配置；市场如何决定收入分配和实现社会公正；社会分工和市场竞争如何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企业家如何发现市场和推动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和全球化何以能改进全人类的幸福和和谐；什么是市场与政府之间的边界；政府干预如何影响个体行为和市场的有效运行；为什么发生经济危机；什么是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计划经济为什么失败；等等。

本课程内容包括传统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但与流行的经济学原理课程不同，本课程试图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本思想融入经济学的基本课程，并对主流经济学进行批判性反思。

化学与社会

这是一门面向人文社科类本科生的理科通选课。课程的重点放在化学（有时候是科学）与人类社会紧密相关的领域，着重讲述化学与社会的交互促进。课程引入大量实例，使学生了解科学领域的进展以及这些进展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课程分为“化学与社会”、“化学与可持续发展”和“化学与生命”三个单元共9章，详细介绍和讨论化学（个别地方是科学）与社会的紧密联系，将人文、社会与自然科学有机地联系起来，促使学生更好地理解科技时代下的社会面貌。

卞江

中国传统 官僚政治制度

集权官僚体制的早熟与发达，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最大特点。在历史早期就发展出了发达的政治行政体制，并在数千年中不断完善。这个体制构成了各种政治活动的基本框架，也是塑造社会形态的强大因素。本课程以古代官僚政治行政制度为内容，主要是皇帝制、中央行政和地方官制、法制、学制、文档制、选官制、监察、俸禄、礼制等等，具体讲述各类制度的形式、特点及变迁等，提示规律性现象、重大问题和发展线索，以此使学生对帝国体制的基本架构、各个侧面与政治意义，建立基本认识。

阎步克 叶炜

本课面向非历史专业本科生，以中国古代政治史、制度史演变的大势为主要线索，使同学对中国古代史的发展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框架，引导同学加强课下阅读，希望增强同学们对中国古代史的兴趣并引发同学们的思考。

中国古代史
(上)

叶炜

艺术史连续讲授十次，每次 14-15 讲，对世界艺术进行一次全面的梳理和呈现，揭示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中的艺术和艺术史的差异。此课程不设先修课程，每年在秋季学期开设一次，首讲导论说明艺术史的基本概念并说明本次内容在整个课程中的结构关系，末讲总结本次内容的问题指向。

艺术史

朱青生

本课程是为本科同学开设的选修课，教学过程中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与政治学等多学科视角透视伊斯兰文明。伊斯兰教是当代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了解伊斯兰世界的历史与现状，是我们认识二十一世纪世界发展状况的一个重要条件。本课程将从历史的角度讲述伊斯兰教与现代政治的关系

伊斯兰教与
现代世界

同时，本课程也将就与现代社会 / 政治有关的重要专题展开讨论，如土耳其模式问题、世俗主义问题等。本课程主要包括如下内容：伊斯兰教的基本知识、伊斯兰文明史、中东现代史、世俗化问题、当代伊斯兰复兴。另外，在本课程中还将涉及中国的伊斯兰教问题。

咎涛

The purpose of this class is twofold: in terms of literary studies, the class will help students achieve a greater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of two of the most beautiful and influential European narratives. In terms of cultural studies, the class will give students an introduction to some of the central ideas and attitudes of the Western world. Two works will be examined: Virgil's Aeneid and Dante's Divine Comedy. The Aeneid presents the story of a journey with a lofty goal—the foundation of a stable and civilized society; with a hero who embodies the code of reason, duty, and courage, the poem epitomizes the ideals of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The Divine Comedy presents another journey with a lofty goal—a vision of God; with a hero who seeks spiritual enlightenment, this poem epitomizes Judeo-Christian attitudes. The classical and Christian value systems illustrated in these works are the two most important roots of modern 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n culture.

欧洲文学
选读

Tom Rendall

本课旨在让学生对于圣经中的重要篇章有深入了解。课堂选读的内容包括：《创世记》、《出埃及记》、《士师记》、《撒母耳上》、《约伯记》、《路德记》、《约拿书》、以及《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的全部内容，最后介绍英文钦定本圣经的翻译和特点。讲课过程中，将介绍近现代圣经研究的主要方法和研究结果。课堂使用的圣经英文译注本为 The New Oxford Annotated Bible，授课语言为英语，书面作业和期末考试一律用英文。

圣经释读

高峰枫

- 西方美术史
丁宁
- 艺术的世界有着“特别的光芒”，透过这一独特的世界，我们不仅可以亲历逝去的“风景”，并将潜移默化地获得一种艺术地看待大千万物的角度。而这一路上，引领我们的正是那些擅长标新立异的艺术大师，他们的灵魂之作可以升扬我们内心中潜伏着的想象能量和创造悸动。
- 因而，如果我们会在伟大的杰作面前变得有所感触，甚或心潮澎湃，那么我们距离那种迷人境界就已然不远了。
- 大学国文
漆永祥 姜涛等
- “大学国文”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最基本课程，是培养学生人文素养与汉语写作能力与表达能力的最基本途径。本课程将围绕培养目标，对学生在中外文学作品赏读，汉语言表达能力与写作能力，以及口才表达能力等方面进行系统培养与训练。
- 西方政治思想
(古代)
李猛
- 本课程是几位教师合作开设的西方政治社会思想系列课程的第一部分（后续课程：吴飞，中世纪西方政治思想；吴增定，现代西方政治思想；渠敬东，现代西方社会思想）。本课程通过选择阅读古代文学、历史与哲学作品，结合当代学者的研究，理解西方古代城邦世界的政治形态，思考作为西方政治思想源头的古典政治思想传统。
- 孔子与老子
王博
- 老子和孔子是中国哲学和思想的奠基者，影响深远。本课程拟以问题为中心，在思想对话中介绍老子和孔子的思想，以呈现中国哲学传统内部不同的理论体系，以及解决问题的不同思路。
- 本课程将通过对老子和孔子基本思想的系统讲授，使学生了解中国最重要的两个思想传统，以及传统内部的丰富性和张力，了解以思想对话形式展开的中国哲学问题。增加学生有关中国哲学的知识，增强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
- 文学人文经典
(近现代)
张旭东
- 本课为元培学院通识核心课程，分“文学人文经典”与“社会思想经典”两个系列，每系列又分别包含“古代”与“近现代”两个学期（单元），每单元3学分，共十二学分，其中六学分为必修。内容上打通中西，意在通过经典阅读，奠定人文与社会思想基本眼界与价值判断力，培养学生文本细读、批判性思考、深入持久的自由讨论以及立论-论辩式写作能力。教学形式为教授讲解与小班讨论相结合，注重培养和发挥学生自主学习和积极讨论的习惯和能力。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走过一年历程

曹莉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
王丽萍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

杨媚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
黄翟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通识教育改革实验区）自2014年9月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一年历程。2014年9月29日，经由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批准，新雅书院宣布成立，聘甘阳教授为书院总监，曹莉教授为书院项目主任。书院依托教务处、学生处和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并先后联合建筑学院、生命医学学院、法学院、钱学森力学班、电子系、汽车系等院系共同建设，由社会科学学院、人文学院、外文系、法学院、美术学院、建筑学院、理学院、工业工程系等院系提供文理通识课程，设跨部门领导/协调工作组（教务处长郑力教授担任组长）和导师委员会协同工作，吸纳学生工作助理和辅导员参与管理。

书院推行住宿学院制度，所有入选学生打破院系和专业界限按学科交叉和大类融合的原则混合入住“住宿学院”。通过共同通识核心课程的学习和以学术为导向的书院活动，形成跨学科、跨专业学习和交流的教学和学术共同体。目前新雅书院的学生拥有双重身份，即书院身份和专业院系身份。

首届(2014)新雅书院通识教育实验区开放给建筑学院、生命学院、法学院和钱学森力学班，共102名学生由院系推荐加入。2015年，采取自愿报名和院系推荐的原则，新雅书院从建筑学院、生命学院、法学院、电子系和汽车系共录取96名学生。经过一年多的探索，书院进一步明确了发展方向和办学目标：以通专融合、学科交叉为导向，探索世界一流、中国特色、清华风格的本科人才培养新模式，为不满足单一学科培养并具有较大综合发展潜力的学生提供优质的文理通识教育和富有弹性的、跨学科的专业教育，努力实现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课程教育与养成教育相结合的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文理基础扎实、专业成绩优异、跨学科学习和创新实践能力突出、在各行各业能够发挥先锋

导向作用的优秀人才。

一、新雅课程

新雅书院（通识教育改革实验区）以建设高质量的文理通识课程、探索跨学科培养的可能性为主要任务。通识课程以古今、中西、文理的交汇与融合为基本出发点，以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文化传统与当代精神、人文与科学为主线，不仅注重知识传授，更注重方法论指导，通过打开一扇扇认知和思考的窗口，激发和引导学生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多方位、多视角、跨学科地审视和对待自己所学的专业，了解其发展过程及其与其他知识领域的联系；培养视野开阔、触类旁通、开拓创新、全面发展和具有高度文化自觉和社会担当的新一代高素质人才。

为了坚持最高质量标准，新雅通识课程定位为“专业水准、通识目的”。在教学内容上强调学术含量和认知挑战度，在教学方法、课程环节和学业要求上重视文本阅读、小班讨论和跨学科思考。鼓励同学们加强主动求知和怀疑反思的能力，在探索偶然性和关联性、培养阅读和写作能力、有效参与讨论和主动表达等方面取得跨越性进步。与此同时，书院总监甘阳教授向全体同学发出了阅读中西经典的倡议，要求新雅学生至少通读一遍司马迁的《史记》和一本西方思想经典。

2014年秋——2016年春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见下页表1:

通过这些课程及其对教学过程的创新性组织和学业强度要求培养新雅能力，包括书面和口头交流能力、批判思维和创新能力和中外古今和文理会通能力，跨学科想象和审美能力。

课程	教师	开课院系
《史记》研读	谢思伟教授	人文学院中文系
早期中国文明	侯旭东教授	人文学院历史系
隋唐五代史	张国刚教授	人文学院历史系
经典与想象：中国古代传说新读	李平讲师	法学院
孟子研读	唐文明教授	人文学院哲学系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	王中忱教授	人文学院中文系
文学名作与写作训练	刘勇（格非）教授	人文学院中文系
法律与文学	赵晓力副教授	法学院
十九世纪英国文学与艺术	高瑾讲师	人文学院外文系
英文写作	Dr. Lisa Maria Burgess Noudehou	人文学院外文系
器物与生活：中国古代工艺文化	陈彦姝副教授	美术学院
艺术的启示	李睦教授	美术学院
建筑与城市文化	王毅教授	建筑学院
科学发展与人类文明	刘兵教授	科技与社会研究所
超越学科的认知基础	顾学雍副教授	工业工程系
西方思想经典与现代社会	黄裕生教授	人文学院哲学系
主权与人权	刘晗讲师	法学院
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Tony Carty 教授	法学院
政治学的视野	欧树军副教授	人大大学政治学系

表 1：2014 年秋——2016 年春通识教育核心课程

二、新雅课堂

为了营造书院教学和学习共同体环境，形成必要的书院气象和环境，书院学生除集中住宿之外，通识课程的教学在清华早期建筑清华学堂内进行，采取小班授课、深度学习、有效研讨、学科交叉、师生互动的教育教学方式，培养学生对人类知识及其价值的综合理解与有效表达，使其在认知、思维、表达和运用方面达到融会贯通、厚积薄发的新高度。

同学们普遍反映，新雅通识课的压力一点不比专业课少，需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课前和课后的阅读和发言准备。但是经过几门“通识硬课”的学习，不仅学到了新知识，接触到本专业以外知识领域的辽阔和深远，而且开阔了视野，培养了多角度观察世界和思考问题以及价值判断的能力。这样的通识教育无论是对于价值塑造、能力培养，还是对批判思维、创新性学习和跨学科思考都起到了不可多得的启蒙和促进作用。

除集中教学外，相当一部分课程根据教学需要将课堂延伸到故宫博物院、鲁迅纪念馆、专业画室、实验室举行，如：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王中忱教授）、艺术的启示（李睦教授）、器物与生活（陈彦姝副教授）、建筑与城市文化（王毅教授）；超越学科的认知基础（顾学雍副教授）等都曾努力开拓教学空间，积极引导同学们仰望天空，开阔视野、了解历史、关照现实，还有的课程如十九世纪英国文学与艺术（高瑾讲师）、科学发展与人类文明（刘兵教授）则采取主题串讲和讨论的方式进行课程与课程之间的对话和探讨，培养学生跨学科、跨专业学习和思考的能力。

为了落实通识课程的辅修和讨论环节，书院为每门课配备了 2 名助教，助教的任务是听课，跟课，组织讨论，收集学生对课程的意见和建议，协助整理课件、批改作业，并撰写课程和讨论日志等。从 2015 年秋季学期起，校学生处选派“唐仲英计划”的 4 名博士生参与新雅书院的助教和学

生工作，在接受通识教育的同时，参与通识教育。

以下是新雅书院二年级部分学生的学习心得：

何雪梅（法学专业）：早在听老师第一次介绍书院的时候就被告知，新雅的课程与全校其他通选课相比而言的最大特点，一言以蔽之，即“绝对不水”；事实证明，在新雅学习是一次甜蜜的修行”。在这里，我们乘兴而思考、而交流。学堂的午后，春有微风，夏有雨，秋有簌簌树叶声，而四季常有夕阳。在院系混杂的小班课堂上，参与度意想不到地高。师生之间，同学之间，时常问答交互，异议与辩论也常常出现。艺术班的同学曾与老师围坐在教室地上彼此吐露对艺术的理解，——老师之于学生不仅仅是单向的传道授业解惑者，更像是引路人、像是同行的伴侣。犹记五月里的一天，西方思想课上的同学们一任性，将讨论课的地点“搬到”牡丹园的草坪上，那次交流酣畅痛快，下课后大家都久久不愿离开，事后还笑称这是“打开哲学讨论课的正确方式”。

张园（建筑学专业）：经历新雅书院一年，现在又在牛津大学交流近两周之后，我觉得所谓“通识”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思考方式或一种观念。高中到大学的改变，如果仅仅是学习科目的减少与某学科相应地专注程度提高，那么大学就没有起到它对思想的教育作用。尤其是当进入到这一中国的“精英”群体，在“职业”训练之外，更应当对历史文化艺术、科学发展和中国的社会等等有更多思考。这种学习仅仅通过听课还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深入的“微观”探寻，与细致的思索与争辩，才能使得我们有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点上去看待这些问题。即使退一步，对新知识新领域的好奇心是作为一个学生最珍贵的部分，“大学”之“大”，也正在于没有限制的探索与没有止境的思辨。

刘子赫（法学专业）：新雅一年，改变了我之前对通识教育的一些看法。新雅的通识不意味着广识。要对各种信息都具有了解，在专门化的现代社会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新雅的更像是一条通幽曲径，它的目的不仅在出于兴趣的了解，而且要求一种主动研究的问题意识，要求最终获取一种相对独立解答的能力。

记得法学院副教授赵晓力老师在面试时对我说：“这里不止需要激情与兴趣，而且主要需要努力。”因为基于目的与要求不同，努力之下，这里所获得的，我想大概是虽在另一学科下但又有普遍意义的思辨能力。而这种能力无疑是需要不断在多元环境中思考才能取得的。现在的我可能会更加乐意去

细致地思考问题而不是简单评判了吧。

陈垚宜(生命科学专业):在大学的一年,即是在新雅的一年。多样而有趣的宿舍组成、发人深思的精彩课程自然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主要方面。但更重要的,我想大概是:这里是,在目前的环境中,仍然让我们无须为跨越狭义的专业藩篱感到尴尬、不会感到忙碌中停下来思考是在浪费时间的一方天地。在新雅,探索大学的本真。

周凌锋(建筑学专业):《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我认为,新雅书院通识教育的核心首在一个“化”字。通过高强度、专业化的通识课程与混宿制下的跨学科思维碰撞,书院的同学们将会收获崭新的人文视角与学养,收获另一个家。

黄馨仪(钱学森力学班):在新雅上课是一种独特的体验,感觉自己永远读不尽书,感觉自己永远无法探索完真理。这是超越技术与科学的人文体验。思维的每一点细微变化都是认知的全新改变,而且思维广度的挖掘与认知领域的拓展都是一种奇妙而令人欢喜的体验,非此中人不得知之。

2015年暑期,在教务处的支持下,书院选送张园、陈垚宜、陆景菲等三位同学赴牛津大学交换学习,通过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切身体验,同学们开阔了视野,发现了更多的未知世界,感到“有读不尽的书,思考不完的问题。”

三、新雅讲座

新雅书院希望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位一体“育人”理念延伸至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之中。自2014年秋季学期,新雅书院启动“新雅讲座”。通过邀请知名学者和各界人士来校作主题演讲,创造新雅学子与名人面对面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培养学生对文明和价值的综合理解,提升学生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为了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激发创造性和独立工作的能力,讲座均有大一新生担任主持,辅以教师指导。2014年11月6日“新雅讲座”首场以“通识十年——文明视野下的人才培养”为主题开讲。此次讲座由新雅书院与校学生会时代论坛联合主办,新雅书院总监甘阳、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钱学森力学班首席教授郑泉水作为演讲嘉宾发表演讲,新雅书院项目主任曹莉点评,新雅书院大一新生(钱学森班)李奇钟主持。谢维和副校长、史宗恺副书记、教务处郑力处长、原党委副书记兼人文学院院长,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基地主任胡显章、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等亲临讲座现场并先后发言。

继新雅首场讲座以后,新雅分别举办“老清华国学院的精神光彩”、“大道之行——青年学者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道路”、“一带一路:历史视野与现实关照”系列讲座。分别邀请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鄢一龙助理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章永乐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欧树军副教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何建宇副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张国刚教授做主题演讲,这些主题演讲都从现实关照出发,从历史、

当下和未来的角度深入探讨中国和世界的重大关切与核心问题,受到同学们的欢迎。

四、新雅展览

2015年9月15日新雅书院成立一周年之际,新雅书院在逸夫图书馆举办了“新雅书院成立一周年学生绘画作品展”活动。本次画展的51幅作品全部由2014级新雅书院《艺术的启示》课程的同学独立创作,由任课教师李睦教授指导完成,他称“新雅书院学生绘画作品展”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画展,创作者们几乎全是不曾受过专门绘画训练的大一新生,其中很多人甚至是平生第一次拿起画笔画画,但他们经过一学期《艺术的启示》课程的熏陶,不但了解了审美对于人类文明进程的价值和与日常生活的联系,还能够在拿起画笔的时候做到“无所畏惧”、“得意忘形”,因为艺术和绘画与生俱来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是在“感受”绘画,而只有真正“感受”,才是真正学习。书院之所以举办这样的作品展,既是为了纪念新雅书院走过的一年历程,更是为了鼓励同学们在通专融合和跨界探索方面持续前行;艺术和审美作为新雅书院通识教育的一部分,正在悄然走进同学们的日常学习生活和精神世界。

展览结束后,同学们的部分作品将被新雅书院所收藏,用以装点书院和大学的公共空间。“新雅书院学生绘画作品展”将在每年的9月份常年举办。

五、新雅学生组织和活动

新雅学生活动均由新雅学社组织和发起,由新雅书院、校学生处、书院学生工作助理和各相关院系辅导员共同指导。新雅学社是由新雅书院学生自发成立的学生组织,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宗旨,负责组织书院日常学生活动,增进师生交流,提升同学综合能力。学社设社长一名,副社长两名。

新雅学社下设生活部、学习部、宣传部、兴趣部、活动部共五个职能部门。每部均设部长1名、副部长2名。部长团会议为新雅学社决策机构,成员由学社社长、副社长以及各职能部门部长、副部长共18名学生组成,负责统筹协调学社日常工作。各部门部长原则上由新雅书院2014级学生担任,副部长由一名2014级学生与一名2015级学生共同担任;各部门下设大一组、大二组两个工作组,各组由若干名干事成员组成,负责开展本年级学生活动;原则上大一工作组干事由新雅书院2015级学生担任,大二工作组干事由书院2014级学生担任;此外,各职能部门副部长兼任本部门本年级工作组组长职务,指导本年级工作组开展工作。各部具体职能如下:

生活部:生活部承担书院“师生之桥”的功能。部内设4

名 Common Room 管理员,分别负责紫荆公寓 1 号楼、8 号楼、11 号楼 Common Room 的管理工作,其中紫荆公寓 8 号楼 Common Room 管理员由新雅书院 2014 级、2015 级学生各一名共同担任;生活部承担新雅书院感情建设活动的筹备工作,通过活动增进师生间、同学间交流,创造书院温暖和谐的整体氛围。

学习部:负责新雅书院图书和学习资料的保管、出借以及购置;负责每学期书院选课表的发放与收集;负责组织书院读书会等学习相关的活动。

宣传部:负责书院学生活动的宣传;打造属于新雅学生自己的微信宣传平台,分享同学学习收获,推送各兴趣小组精品文章及活动宣传,定期对书院同学的学习生活状况做跟踪调查和调研,设计发放调查问卷,收集同学情况和需求,协同生活部向书院办公室反馈。

兴趣部:负责制定书院兴趣小组管理制度,管理、服务、指导各兴趣小组开展工作。新雅兴趣小组分为科创类、文化、文艺、体育、公益五大类,各兴趣小组可由同学自发成立,在书院兴趣小组相关管理制度下开展活动,接受新雅学社兴趣部的指导。兴趣小组发起人自动成为兴趣部成员。兴趣部下设新雅学生乐团,乐团设团长一名负责乐团的日常训练安排与表演活动组织。

活动部:协同书院办公室组织筹备开学典礼、新雅讲座、烛光晚宴等新雅大型活动,负责活动主持人、表演者以及工作人员的遴选工作。此外,活动部也将指导“我与导师面对面”等活动。

2014 年书院成立以来新雅学社组织的活动有:

“我与导师面对面”活动

“我与导师面对面”活动是新雅书院 2014 年秋季学期开展的第一个大型课外学习活动。书院希望通过该活动引导同学思考大学和书院的目的,思考人为为学的原则以及师生关系和生生关系。该活动由学生以寝室为单位制定采访方案——约请书院导师、通识课程教师、学校相关领导等进行独家采访,话题不限,鼓励同学自主创新采访内容、途径和方法。同学们将通过一个学期的调研、构思和交流,将此次活动变成一个学习和提升的过程,并最终形成《我与导师面对面访谈报告》。

烛光晚宴

烛光晚宴是新雅书院定于每年元旦举办的书院年度聚餐。学社邀请新雅书院导师委员会的导师和全体书院同学参加,参与人数逾百人,在晚宴上,同学们将会总结一年来新雅书院的学生工作,共享学习生活中的不同感受和问题。同时同学们也会近距离与新雅书院的各位导师进行较为深入、细致的交流,从深度层面上感受通识教育的内涵和书院共同仪式感、归宿感和荣誉感。

兴趣小组相关活动

作为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社按照同学意愿,帮助同学在书院

内逐步设立各类兴趣小组,拟涵盖科学、人文、艺术、体育、公益等多个领域。目前,新雅学社已初步建立体育类兴趣小组,期中新雅射箭爱好者小组通过射箭运动培养顽强、坚韧、果断、勇于克服困难的意志品质;新雅夜跑兴趣小组组织体质较弱的同学和身体素质较好的同学共同参与夜跑,在夜跑的过程中增进同学之间的情感,并且帮助同学增强体质,目前累计参与人次已逾百人。艺术类兴趣小组包括美术小组和新雅乐团,其中美术小组组织对美术有兴趣的同学通过欣赏美术作品,了解美术创作理论和美术史,以及共同创作美术作品逐渐提升自己的艺术修养;新雅乐团包括阿卡贝拉(无伴奏人声合唱)声乐部和器乐部,以此培养书院同学的音乐素养。学社也已逐步组织科学、人文、公益类的兴趣活动,以期使同学们能在兴趣的指引下完成通识教育中的自我教育。目前,兴趣小组参加人数已超过书院总人数的一半。

中秋放映

学社在每年的中秋节将组织同学集体观看以中国经典文学作品为背景的影视作品,在电影之后还将组织同学在中秋佳节共同鉴赏中国经典文学,交流在新雅书院的通识教育中感受到的中国传统思想和精神,同时对电影这门艺术有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2015 年中秋节,数十名同学在建筑馆王泽生厅共同观看了经典电影《倩女幽魂》,并对其中人物形象和王祖贤张国荣等演员形象作了自由讨论。

新雅书品

新雅书品是新雅学社学习部在学生发展指导中心的指导和引领下举办的重要的学生活动。新雅书品的主要活动形式包括读书会和前沿文学作品导读等,旨在培养同学们对文学的自我感知能力和学习能力,所选择的文学作品也涵盖了多层次,多方面的书籍。其中读书会以每周一次的频率引领同学阅读现代经典文学著作和短篇文学作品,在领读人的陪同下,同学们对文学著作的原著或节选进行深度鉴赏,并将感悟与参与的其他同学分享,还将定期以通讯稿的形式与全员同学分享。

“启明星”早起活动

为提倡积极健康的作息安排,让新雅的大一新生们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新雅学社学习部发起“启明星”活动,新雅学生可在每天早 7:00 前通过微信群进行早起签到,相互监督、鼓励。每一学期学社统计签到天数累计最多的同学,前三名可获得相应奖励。活动自举办以来,获得了新雅师生们的热烈好评,绝大多数的新雅同学们都能够积极参与其中,通过“启明星”活动的举办,新雅新生之间的也建立了更加亲密的关系,为之后的书院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与 Common Room 设计

学生始终是书院建设和书院活动的主体。新雅书院公共活动空间 Common Room 的设计及管理均由新雅书院学生承担。在设计过程中,建筑学院同学发起“国外高校宿舍案例研究”项目,对国内外八所著名高校的通识教育学院学生宿舍进行了调研,通过运用专业知识对新雅书院公共空间及未来学生宿舍的设计安排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科学与人文”通识名师大讲堂

——诗情画意的物理学

金晓峰 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

科学，点燃梦想；人文，提升品性。通识教育的核心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自然也就离不开科学与人文的交融滋养。从2015年秋季学期开始，复旦大学复旦学院将陆续邀请校内院士、知名教授为学生带来系列演讲，从科学的角度探究人文，从人文的角度理解科学，相信学生会获得更加灵动的收获。

引言：在很多人眼中，科学和艺术似乎处于人类文明的两个极点，相距甚远。不仅我们的人文类的学者会这么认为，很多科学家也如此认为。这与我们教育中长期文理分隔，乃至到了大学以后，学科越分越细相关。但是一个接受过完整教育的人不应该有这样的看法。

自古以来科学与人文就是密不可分的。长期以来科学与人文的割裂不仅使我们的教育不可能完整，更会使得我们的社会走入歧途。大学里的通识教育实施已有10年，但通识教育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给文科学生灌输一点“简陋”的或者说是“精简”的科学知识，给理科学生培养他们一点文学爱好就算是通识教育了呢？复旦大学今年开设了“科学与人文”通识教育名师讲堂。这是物理系金晓峰为全校学生做的通识报告《诗情画意的物理学》的很小一部分，从中可以窥得一点滋味，科学为什么与人文艺术是相通的。

一、诗情画意的物理学

蓝天下纵贯天际的彩虹、茫茫沙漠中若影若现的海市蜃楼、自然界鬼斧神工的山水风光，用“诗情画意”来描述它们大概不会有太大的争议，但若说“诗情画意的物理学”，恐怕大多数人会觉得莫名其妙，难以苟同。

早在一个多世纪之前，美国的心理学之父、哲学家、教育家 William James (1842-1910) 就曾清楚地指出：“只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你就可以赋予任何学科以人文价值，如果从天才们取得的一个又一个成就来讲授地质学、经济学、力学，那么这些学科就都是人文主义的。相反，若不这样讲授，那么文学就只是一些语法，艺术就是一些目录，历史就是一些年代，自然科学也就只是满纸的公式、重量和测量。人类创造物的精选，我们所说的人文学科就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著名美学家朱光潜也曾经说过：“哲学和科学穷到极境，都是要满足求知的欲望。每个哲学家和科学家对于他自己所见到的一点真理（无论它是不是真理）都觉得有趣味，都用一股热忱去欣赏它。真理在离开实用而成为情趣中心时就已经是美感的对象了。“地球绕日运行”，“勾方加股方等于弦方”一类的科学事实，和《密罗斯爱神》或《第九交响曲》一样可以摄魂震魄。科学家去寻求这一类的事实，穷到究竟，也正因为它们也可以摄魂震魄。所以科学的活动也还是一种艺术的活动，不但善与美是一体，真与美也并没有隔阂。”

显然，科学也是人类创造物的精选，理应构成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同时还是一门艺术，就像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科学，是一门揭示自然奥秘的艺术，艺术具有的特点在科学的创造中都有表现。要培养有文化的人，科学的素养和对科学之美鉴赏力的培养就是不可或缺的一课。

科学光有理性和逻辑还不够，在伟大的科学创造中，常常是凭着非常主观的信念去探索和追求的。这就是为什

么它是一门艺术。而在长达两千多年的科学发展过程中，呈涌现过多少英雄豪杰，写下多少诗情画意的篇章，这也早已构成了一部宏大叙事、摄魂震魄的史诗。

科学是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揭示自然界奥秘的一门艺术。物理学作为科学的一部分，它是人文的、艺术的、诗情画意的，它可以是波澜壮阔的“史诗”、可歌可泣的“悲剧”、亦真亦幻的“小说”、啼笑皆非的“喜剧”，也可以是美妙绝伦的“画卷”。

我们都曾经看过各种星轨的照片，在天空中的显示都是圆周。但是其实古人早就已经发现了这一点。曾经有史诗描述我们远古的先人们，世代相继地仰望着神秘莫测的星空，记录着星星周而复始地围绕人类居住的地球运行的天象。而且古人发现，我们把东西向上抛后，它总是落在原地。这一切都显示，我们的地球是“不动”的，星星乃至太阳都是围绕着地球转的，这就是地心说的起始。

但是，在这满天天空中却有很少数的几颗星星并不依循柏拉图构造的圆周轨道规整运动，它们就是后来知道的行星。根据目前的发现，至少在 3600 多年前，巴比伦国王阿米萨杜卡统治时期的泥板上就用楔形文字确凿地记录着对金星运动的观察。金星的运行轨迹就不是圆周形，而是不时逆行后继续前行。

于是，从柏拉图时期就有很多人试图通过各种数学模型来解释那些“不按照规矩走”的行星的轨迹。有所谓的同心圆模型、偏心圆-本轮-均轮模型。虽然这些模型使得行星的运行变得非常复杂，但总算是使得地球中心说心安理得地在世间坐守 1000 多年，直到哥白尼登场。

1000 多年后，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他的这一想法并没有新的实验事实，也没有任何清晰的逻辑，只是他产生了一个不同的想法——假设行星都是绕着太阳转，那么解释行星逆行会显得比较简单直观，而且非常完美。也就是说，以太阳为中心来解释行星的运行轨迹，这一理论会显得非常简洁、完美。

这里要强调的是，科学光有理性和逻辑还不够，在伟大的科学创造中，常常是凭着非常主观的信念去探索和追求的。这就是为什么它是一门艺术。

随后的重要进展是开普勒的贡献，他根据他的老师留下的详细实验数据，发现行星绕着太阳的运动并不是圆周运动，而是椭圆形的。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偏离柏拉图

的圆周说来解释行星的运行。然后他从实验观测数据提出了开普勒第一定律、第二定律，但是却凭着主观的信念“凑”出了第三定律，那是一个解释行星相互之间关系的公式，来自直觉和创造。

每一个行星绕太阳运转一圈的时间为 T ，相应的椭圆轨道的半长轴为 a ，他有一个很主观的看法，认为 T 和 a 应该有关系，他执著于找到这一关系。

他进行了很多次计算。最初，他认为不同行星的这两组参数之间应该有直接关系，但是经过计算后，发现它们没有直接的关系，随后，他将每个行星的这两个参数进行平方，发现还是无法找到关系。一般人做到这里就放弃了，但是开普勒很主观地认为，他的想法是对的。于是，他又继续做到了三次方，发现了 T 平方和 a 的三次方的比例确实是一个常数，而这个数与哪颗行星并没有关系。

这再一次表明科学的创造并非如大家所想像，通过一个逻辑可以马上推理出来。科学家的“创作”其实非常主观。开普勒做第三定律时的逻辑在哪里？也许有他的逻辑推理，但更多的是凑，是猜。

真正让“日心说”一锤定音的人物是伽利略。在听说荷兰人发明了望远镜之后，他很快自己动手也做了一个达到 20 倍的望远镜。凭借这 20 倍的望远镜，他不仅发现，月球并不像人们长期以来认为的那样“完美”，而且清楚地看到行星不是点而是球，银河的乳液状色泽只是因为其中布满了星星，他还惊异地发现木星竟然有四颗卫星，如同地球有月亮一样，这是对日心说的有力支持。最重要的是，他观察到金星有各种盈亏位相，如同月亮的阴晴圆缺，这才第一次清楚地证明了“地心说”确实是错的，而“日心说”是对的。

对于当年的人类，伽利略的这一系列发现带来的是地动山摇的震撼，想象一下，脚下的地球既然是漂浮在漫无边际的星空！而开明激进的诗人们却高唱着赞歌：“折服吧，维斯普奇*，让位吧，哥伦布，的确，他们曾向着未知的海洋，但是伽利略啊，只有你给了人类璀璨的星列，那是新的天界。”

所以科学具有艺术的所有特征，但也有自己的特点。就是在创造的时候是非常主观的，但这个主观必须成为他人之客观，因为科学是求真的，它最后必须通过客观验证，这是对的。

用爱因斯坦的话说“纯粹的逻辑思维是不能够给我们以关于客观事件的知识，所有关于真实的知识都是开始于经

验，结束于经验。而从纯的逻辑方式得到的这种理论是根本完全空洞的，对于这个真实性来讲是完全空洞的。”

二、科学更是历史的产物，而非逻辑之必然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科学史诗中，最华丽的篇章是牛顿的降临，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主体就是讨论万有引力定律，这是牛顿一生在物理学上最大的贡献。通过万有引力的发现，他使得天上和地下的事物联成一体，也就是说，同一个规律决定了整个宇宙的运行，后可预计未来，前可反演过去。

牛顿如何发现万有引力？并不是因为他看见了苹果落地，而是因为他问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月亮为什么不掉下来？

他推测月亮没有掉下来，很可能是因为有一个力既没有让它掉下来，也没有让它飞离地球，而是让它在环绕着地球的轨道上运行。牛顿从数学上证明了这一点后，立刻又推广到太阳跟它的行星之间，包括太阳跟地球之间的关系，这样一切就很自然了，这些行星运动以及和恒星之间的关系，全是因为万有引力。如同 Alexander Pope 一首非常著名的诗中所写：“自然和自然律隐没在黑暗中，神说让牛顿去吧，万物遂成光明”。这是对牛顿极高的评价。

根据牛顿的发现，人们第一次意识到有一些特殊的星星，即那些彗星或“扫帚星”，很可能就来过地球一次，从此一去不复返了，但有些却会在许多年之后重新回来，最著名的故事就是哈雷预言了哈雷彗星将在间隔 75 年后重返地球视野，哈雷 1742 年去世，他曾幽默地说：“如果彗星最终根据我们的预言，大约在 1758 年再现，公正的后代大概不会忘记，首先是由一个英国人发现的。”

这颗彗星果然于 1759 年如约而至。

拉朗德在 1759 年写下这样一段充满人文和艺术味道的记录：“今年宇宙里发生一件最令人满意的现象，是天文学

从来没有向我们表现过的。这是空前的胜利，它把我们的猜测变成了真实，使我们的假设得到证明。虽然聪明的物理学家一向就希望彗星能如期归来，虽然牛顿加以证明，哈雷确定了时间，请求后代人类为他作证，可是他的情况和我们是两样的，他的幸运的猜测和我们亲眼看见的快乐，自然也是两样的！综合历史的事迹得出结论，这是哈雷最大的成就。在 50 多年以后看见他的结论得到完全的证实，这快乐是我们的享受，也是自古以来的哲学家所羡慕的。克来罗先生为了维护理论，要求彗星的归期有 1 个月的误差，彗星恰好差一个月出现了，比前次迟了 186 日，比预定期早了 32 日，但是在 150 年间人们只观测了它的轨迹的 1/200，其余的部分我们完全没有看见，这 32 日之差算得了什么呢？”

爱因斯坦如是评价牛顿“幸运的牛顿，科学的快乐童年，他一个人集实验学家、理论学家以及机械师于一身，而且还是一个阐释的艺术家，他屹立在我们面前，强大、自信、独一无二。

朱光潜在谈艺术时曾经说过：“艺术都是主观的，都是作者情感的流露，但是它要经过几分客观化。艺术都要有情感，但是只有情感不一定是艺术，艺术所用的情感并不是生糙的而是经过反省的。”如果把科学替代这里的艺术，这段话仍然完全成立：“伟大的科学创作都是主观的，都是作者情感的流露，但是它需要几分客观化。科学都要有情感，但是有情感不一定是科学，科学所用的情感并不是生糙而是经过反省的”。■



大学通识教育联盟
FEDERATION FOR GENERAL EDUCATION